
一，在美国写下的部分文字

自由天空下的第一行眼泪

一，TO BE OR NOT BE

飞机，腾空而起，下面，是我生长的故土和日夜陪伴我的长江。我将脸紧紧地贴在玻璃窗上，俯视这一片让人魂牵梦萦的土地。

这是我生活了大半生的土地，我人生的根，已经深深扎在了他的岩石和泥土之中；这也是我苦苦坚守了多年的土地，强烈的爱恨情仇抵御了一次次绝望中想转身离去的冲动。

2003年，我在《长寿湖》后记中写道：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感召——苦难的感召，仿佛苦难催生了一种深沉悲壮的情怀，唤起了内心金戈铁马般的冲动，这种情怀和冲动，无法在新西兰田园牧歌的风情中得到释放，无法在澳大利亚洋房别墅的华美中获得满足，正如江南桃红柳绿的沉醉，不能取代大漠孤烟的苍凉、长河落日的悲壮所唤起的那种深层感动和震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个荒唐人的梦》中说：“正是由于这里出现了不幸，我才更加热爱这片土地。”茨威格在《昨天的世界》里说：“如果我们能以自己的见证为下一代留下我们那个时代分崩离析的真实情况，哪怕只是一点半星，也算我们没有完全枉度一生。”



写下这段文字到现在，14年过去了。

坚守？还是放弃？到最后一刻我都在犹豫。

从讲台上被赶下来之后，我曾打算用这种不上班的空闲，再干一番我所渴望的事业。我的经验、意识、能力、勇气，甚至身体素质，都能保障我在这块土地上大干一番，而这又是一块极其“肥沃”、遍地“题材”的土地！可是，我迅速发现，眼下已经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保障——安全。一旦被他们盯上了，行动的自由便丧失了。身份证、手机、银行卡，这几样现代人生活最重要的随身必需品，成了监控你一举一动的得力武器。

书，不能教了；号，被封了，采访，难以进行了，连与朋友聚会都要“传染”对方。怎么办？坐在家里读书写作吧，这原本是我的本行。

可是，有多少人会体会过“砰砰砰”敲门声所引起的那种心惊肉跳？有多少人经历过把自己的文字和作品像赃款一样东藏西躲的紧张和慌乱？

其实，我不是觉得很累了，想放弃了，要逃离了。不是！最无奈、最痛苦的是发现自己“武功”被全废，成了一个不能讲课，不能写作，不能采访，甚至不能安心读书，没有基本安全感的僵尸！

我曾自以为自己是个不怕大牢的勇士。我曾在《长寿湖》的后记中写道，如果判我几年大牢，我不会白坐这个牢，出来后，我会写出一部像《长寿湖》一样难看的书。现

在我看来，我是太 naive 了。今年刘晓波、彭明、杨天水等相继在大牢中的重病不治，让人彻底明白了：不要以为手中的笔是锐利的武器，有人会让你的肉体连同你的“锐笔”一块“病亡”。

明白了这个道理，绝望，从地底升起，消解了我苦苦坚守的最后决心。

二，爱国

我常常受到爱党爱国人士（其中还有个别我的学生）的责骂：“美狗”、“卖国贼”、“汉奸”。现在他们更有理由了，你果然投奔美帝了。

什么是爱国呢？好像标准只有一个：赞美加歌颂。

同现在的学生和年轻人一样，从小我也饱受“爱国主义”教育：邱少云、刘胡兰；白公馆、渣滓洞；义和团杀洋人、太平天国闹革命；冷月英妈妈坐水牢，高玉宝叔叔讲鸡叫；……

当然更有爱党教育。爱党爱国被搅拌为一体，煮成一锅红色浆糊，灌满了千千万万稚嫩的大脑和成长的心灵。

爱国，一旦成了一种“主义”，它可能就是一种“主义”，而不是那种透彻心灵溶于血液的天然。

奔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触摸中华悲壮的沉淀，无需谁来“教育”，自然生出那份沉甸甸的情感——

它是穿越千里长江，手抚纤夫遗痕的生命喟叹，
它是伫立黄河岸边，面迎西风夕照的历史感怀；
它是大巴山老农一杯苦涩水酒映照的苍凉泪光，
它是窑洞里大娘一碗高粮米饭唤起的身心温暖；
它是传统消失人亡艺绝时仰天长啸的心痛，
它是山川残破江河色变时慷慨悲歌的忧愤；
它是面对贫穷和苦难时不离不弃的坚守，
它是目睹丑陋和罪恶时热血裂岸的悲狂；
它是冷泪长歌飘荡在旷野冤魂中的母性悲悯，
它是横刀跃马驰骋在暴政王宫上的壮士豪情；
它是高原的寒风吹来辽阔河山的千古惆怅，
它是诗人“祖国啊，你用伤痕累累的乳房哺育了我”所触动的深层柔软；
……

2017年10月7号，我采访完秀山县一位老人胡祖暖之后，独自前往湖北，寻找他当年同他恋人最后分别的地方——咸丰县看守所。

从秀山到黔江，从黔江到咸丰，一路上云雾缭绕，峰峦叠嶂。当年，1963年，胡祖暖就是同他19岁的恋人杨秀萍姑娘，沿着这条山路徒步走向他们悲壮的永别。我注视着沿途的群峰山峦田野村庄，想到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一种由苦难催生的深沉和山川唤起的热爱，交织奔涌，排山倒海涌上心头。

中华民族百年的血泪沧桑啊，我不幸看到了你喧嚣下面沉默的真实，我有幸读到了你遗忘后面苦难的记忆。

一路上我都在犹豫挣扎：我真的要离开这片土地和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吗？

最后一次采访是11月5号，川东奉节县。野夫兄热心地为我找到了土改时被烧烤

的彭吉征的家人，我当即前往。

采访完彭吉征的儿子后，我独自下到长江边，注视着早已不再奔流的三峡江水。

深秋的阳光暖暖地洒下，峡江的红叶静静地摇曳。我在江边久久徘徊，这时，我已经决定要离开了，要离开这陪伴了我一生的长江。

只有我自己知道，为什么我在江边久久徘徊。

离开前的最后一夜，我又翻开郑念的《生死在上海》。二十多年前读到这本书时，她告别故土的描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透过蒙蒙的雨帘，我看见壳牌公司的大楼和我原来办公室的窗口。那过去的岁月，竟然如梦幻一般。船渐渐加速，黄浦江渐渐远去……我将永远离开生我养我的故土，我的心碎了，完全碎了，只有苍天知道我曾千百倍地努力，要忠贞于我的祖国。可是最终还是完全失败了。”

郑念 1949 年回到了她热爱的祖国，几十年后，她从大牢中出来，家破人亡，她唯一的女儿梅平惨遭毒手，尸骨无存。

郑念孤独而绝望地走了，那是 1980 年 9 月 20 日，距今已经 37 年。

三，母亲

2017 年 11 月 20 日，我离别的前一天。这天，重庆气温陡降，风雨交加。

这时我才去告诉母亲，我要走了。我不敢看她，怕她受不了。这些年来，母亲独自住在养老院，一直是我去看望她关照她，是她的最大的安慰和依托。当我告诉她第二天我要走了时，母亲并未露出我所担心的那种反应。她沉默片刻，很理解地说：“走了好。”看来，我虽然是她最大的安慰和依托，但也是她长期的“心病”和“负担”。

“这些日子我电话都不敢给你打，怕他们追踪到你的行踪。”母亲说。

同去世的父亲一样。母亲在很年轻（18 岁）时，受中共《新华日报》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宪政的新中国”的感召，在重庆女子师范学校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开始了提心吊胆的地下工作。“新中国”到来后，母亲仍然提心吊胆，批胡风、反右派……尤其是文革期间，批斗、逃亡……我亲眼目睹了那些年她的提心吊胆。

这些年来，晚年的她又为我提心吊胆。十余年前，我从狱中出来后她对我说：“我没法阻止你，因为你做的是对的，当年我同你爸也是这样在做，这样在追求。但是，作为一个母亲，多么担心……”

母亲掏出钥匙，打开抽屉，拿出她的全部积蓄——十余张存折。存折零零碎碎，五千、一万、两万。“你出去后花费大，要尽量多备点钱。”

我不要，说这些钱换成美元也没多少，而且我第二天一早就走也来不及换了。母亲坚持要给我，仿佛不这样我就会流落街头，她就更加不安。

什么是一颗母亲的心！

我没带身份证，只有她亲自去取。于是我扶着 90 高龄的母亲在风雨中走进一家又一家银行，取出她一点一点存下的五千、一万、两万。

近黄昏时，我同她告别，她站在养老院大门的外面。初冬的冷雨悄无声息，飘洒在她花白的鬓发和苍老的脸上。

我一再叫她进去，她不肯，怔怔地望着我。我不敢看她，怕看到一行苍凉的老泪，从此成为我心灵上凝固的悲伤。

到西雅图的当天晚上，对朋友谈起同母亲的告别。

突然，泪水夺眶而出！

多年来，我在这块沉冤浩浩的大地上奔走采访，心灵早已被种种悲情和苦难打磨成钢，炼就了一种超强的耐压能力。可是，分别时，母亲冷雨中无言的凝视，竟让人肝肠寸断！

我双手捂脸，失声痛哭。在刚踏上据说是自由的国土时，不是一声自由的欢呼，而是一行悲痛的眼泪——既为生我养我的苍老母亲，也为我爱恨交织的苍茫大地——祖国母亲。

2017年11月23日于美国西雅图

2019，三十年感怀

黄昏的风，吹过拉斯维加斯寂静的旷野，红色岩石的后面，乌黑的云，布满天空。我独自一步步前行，踩着我生命的黄昏。

—



三十年前，枪声之后，他（我右手边的同学）离校远走新疆

同学，分别三十年了，你在哪儿？

那一个枪声沉寂后的半夜，你来向我道别，黑暗的过道里，我看见你眼中悲绝的光。“我不要这个文凭了，他们让我厌恶！”

我无法劝阻你，因为，绝望和悲愤填满了你青春的生命。

你转身走了。你说，你要走远点，新疆，那遥远的地方。

三十年过去了，我已经记不得你的名字，只有歌乐山下你离去的背影，依依伴我三十个春秋！

如今，我也走得很远，远到难以踏上回归的路。三十年过去了，望断天涯，那一杆

浸满了腥红血污的大旗，仍然在傲慢而暴戾的王宫上招展。

太平洋的波涛，拍打着旧金山秀美的海湾。海风吹来，那位在坦克的冲锋中失去双腿的朋友，坐在轮椅上艰难前行。“三十年了，每当天气变化，腿还是要痛。”他说。

我曾努力想忘掉，让自由天空下的风，吹去心中堆积的块垒。可是，那轮椅上永恒的痛，又带我梦回万里，三十年前火光中奔涌的那一股热血，又汹涌澎湃，激荡在我日渐衰老的男儿身躯。

同学，三十年过去了，你还会感到那一年的悲与痛吗？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风，是否会吹去你的记忆——那一个枪声后的夜半，我们分别在校园……

还有，那位甘愿跟随你一起亡命天涯的女孩，还跟随在你身旁吗？

二



三十年前的那一个5月31日，我站在重庆沙区作为路障的电车顶上

朋友，离开了讲台，你将走向何方？

我知道你三十年前的奔走呼号，也知道你三十年来的苦苦坚守。真的很难，特别是，血泊的上方，又垂下诱人的金苹果。

一边，是铁窗、是死亡；一边，是安稳、是荣华。你如何选择？

趋利避害的人性自然，被那洞悉人性而毫无人性的政客们利用到极至，你如何抵御？

孤独的坚守，是广场之后漫漫的三十个春秋；艰难的抗争，是面对一个个被“从娃娃抓起”后双眼雾霭的学生。在坦克和机枪的轰鸣中奋身呐喊、在摄像机和“信息员”的监控里直抒心声，中国最后的一点脊梁，你需要怎样的坚韧？

今天，一阵新的咒语召唤出旧的幽灵，“1957”和“1966”死而复生，鬼影憧憧，阴风阵阵，重新又降临2019的天空和大地。

广场之后三十年来没有灭绝的最后一点火种、华夏民族传承千年仅存的那根脊梁，劈面又撞见那道熟悉的刀光。

我知道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博弈，我清楚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对抗。朋友，你手无

寸铁，势单力薄，“岁月静好”的乐音早已取代了怒涛汹涌的广场，而隆隆驶来的，仍然是坦克轰鸣的国家机器。

在孤独和恐惧中后退吗？低下头，割掉舌头，或者改造声带，发出柔美的颂音？

我不愿去想他们又一次“从胜利走向胜利”之后的寂静长夜，再一个三十年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担忧的，是你怀抱的那一腔道义，成为你最后的支撑、唯一的安慰和无奈的殉葬。

焦虑而又期待，期待而又焦虑……

朋友，你将走向何方？

三



1947年父亲在重庆南开中学选择了跟共产党走

父亲，你在地下还在期盼吗？

你生前曾告诉我，你年轻时面前有三条路：科学救国；跟随国民党；跟共产党走。你选择了第三条，因为它许诺“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于是，组织学生运动，游行、抗议、反专制、争自由……

你以为，出生入死，终于迎来了那一个“新中国”。

崭新的时代风云，燃烧的革命激情……

1957年，一场来自北京的六月寒雪、一封发自同事的告密信件，点金为土，终结了虚幻的明朗天空和真实的青年梦想。

几十年风雨后，那一个春夏之交，呐喊声唤回你青春的岁月，你同我，一块热血奔涌。

枪声，打碎了你最后一丝幻想，我记得你声嘶力竭的声音：“他们……坦克机枪！……当年我追求的是什么？！”

长江，浪起浪落；王宫，岿然不动。你无奈地一步步走向黄昏日暮。

病榻上的你又谈到你年轻时的选择，你说，那也是你一生的渴望和追求。

在你告别这个世界的前一周，我走进病房，永远记得你拔掉氧气时的第一句话：“网上有什么消息？”

我知道你在渴盼什么，在我采访的数百人中，也留下了你的声音：

“我坚信中国一定要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我年轻时的追求一定会实现。只是，我可能看不到了。”

我选择那儿作为你长眠之地，墓地山头的后面，是那著名的黄山。抗战八年，陪都重庆，从领袖到民众，铁血壮志，浩气凌云！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足踏长江嘉陵，出生入死，慷慨悲歌！

墓碑上有你凝固的容颜，你面对长江，目光，深沉而忧郁，含蕴着的，是你一生的期盼……

我独自走在拉斯维加斯寂静的旷野，一步步走向我生命的黄昏。自由的风啊，在红色的岩石前久久回旋。

我能穿过冷冷黑夜，看到朝霞的颜色吗？

或者，在垂危的病榻上，重复父亲的留言……



2019年5月于拉斯维加斯

手

双手，随着生命黄昏的降临，也日愈呈现出昏黄和灰暗。注视手背上隐隐的斑块，脑海里浮现出一些深深的记忆。

1969年深秋的一天，班主任老师激动地宣布，明天停课，到礼堂听报告。那些日子，三天两头停课，不是参加革命大批判，就是聆听忆苦思甜报告，等等。没什么值得激动的。但这次不一样，班主任说，作报告的人是从北京开会回来的劳动模范，他见到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更重要的是，”班主任两眼发光，“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同他握了手！”

“哇——”教室里响起一片惊赞和惊叹。

“同学们，我知道你们都无比热爱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明天，这位握过毛主席手的劳模来给我们作报告，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大喜事，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班主任顿了顿，目光扫过全班。“希望同学们在报告结束后去同劳模握手——那是一双被英明领袖握过的手！”

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全校几十个班的学生汇聚一堂。文革时，全国所有学校停课闹革命，在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下，从1966年7月到1968年9月，两年多时间，校门关闭，学生绝迹。复课后，小学三届学生（66级、67级、68级）同时涌入初中，一时人声鼎沸。

劳模在台上讲些什么我完全忘了，印象深刻的是报告结束后的波涛汹涌。

看来，各个班的学生都知道那儿有一双被“红太阳”光辉亲抚过的手。整个礼堂里你推我涌，一个个奋不顾身，头冒热汗，眼放金光。尖叫声、“唉哟”声（被踩或挤痛了）此起彼伏。多年后我看到那狂热的追星场面和北韩军民涌向“宇宙大元帅金太阳”的癫狂，便会想起那礼堂里的情景。

说来惭愧，我也试图“杀开一条血路”，可惜力不从心，前面众志成城，连望一眼的机会都没有。

事后清点，我们班竟然只有一个男同学触碰到了那双神圣（没能握住）。这位同学是一个杀猪匠的儿子，生得五大三粗孔武有力，因此他能力克群雄，为班上挣得一份荣誉。

于是，不少同学便上前与他握手，分享间接又间接的幸福。

痛苦的是那些女同学。文革期间，“男女授受不亲”的千年古训在这片被“革命”烧红的大地上大放异彩。男女同学不要说有肌肤触碰，连眼神和语言交流都禁绝。

终于，有位女同学——我们学校小有名气的“辣子妹”——置千年古训和革命戒律于不顾，奋身向前，匆匆握了一下那只沾了间接“圣灵”的胖手。



进初中时的我

“胖手”一怔，原本已满面红光的脸上更加红光满面。他达到了幸福的巅峰。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班主任振臂高呼。

“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我两年的初中，都是在这“癫狂的幸福”中度过。

二

乡间田埂路上，走着一排青年男女，那是我们公社在农闲时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位列其中，背着道具前往生产大队演出。走在我前面的一位姑娘，背着一块幕布，离我很近。她双手后背，扶着幕布。第一次，一位姑娘的玉指如此近距离也如此长时间地在眼前展示，我可以细细观赏而不会被她和他人发现。

姑娘正值华美青春，那双手也饱含青春华美：圆润、光洁、细嫩、白里透红（那时还没有“性感”的说法）。我觉得呼吸有些急促，尤其是上坡时，那双手几乎触到我有意无意凑近的眼鼻。异性强烈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体内有热乎乎的涌动，目光变得迷乱。

我第一次体会到，原来手，异性的手，具有让人沉醉的魔力。我费了移山心力，才压下了触摸一下的邪恶冲动。

宣传队由知青和一些青年农民组成。单身男女，青春热烈，同台排练，幕

后交流，干柴近烈火，很容易引起“道德败坏”的火灾。

那是一个革命烈火烧毁了“男欢女爱”的年代，整个社会把男女私情视为洪水猛兽。有一次我一不小心说出“爱情”两个字，竟引得一片注目，让我狼狈不堪，像做了贼。

可是，那双手从此挥之不去，不仅幽灵般地出现在眼前，还引诱我往纵深堕落：由双手深入到手臂、由手臂上升到颈脖，再升华到那大大的眼睛、红红的嘴唇……

领导宣传队的是公社的武装部长，他深知一堆青春的火热有引发“火灾”的危险，因此他一再强调，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崇高而光荣，不能有任何玷污宣传队的行为。否则，后果严重！

宣传队里，有一对在小话剧里扮演夫妻的男女，是来自同一个大队的青年农民。他们不幸真的入戏了。不过，在台下他们“演”得比台上还好：保持距离、目不邪视，外出演出，也不走在一起，自始至终都很“崇高”，一心一意在剧里宣传毛泽东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半年之后，我得知，这对“夫妇”被关进了公社的小黑屋！罪名是“未婚发生性关系”。

惊叹之余，我长舒一口气，幸亏我“崇高”地用革命意志抵御了华美玉指的诱惑！



当知青时的我

（我曾两次在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同那位“玉指”姑娘同台演出。在舞蹈《喜送粮》中，她扮演喜送公粮的少先队员，我扮演拉船的青年农民。朝夕相处，可我一直没触碰玉指。）

三

“手伸出来！”一位面色阴沉的狱警一声断喝。
我伸出双手，等待上铐。

“先伸右手！”
原来是按手印留指纹。每一个手指都按，然后是整个手掌。
这一幕发生在2002年7月19日下午，地点是重庆市看守所。
留完双手的指纹，我被押进一个叫“下四房”的牢房。

第二天，铁门隆隆打开，我被押到一间小屋。
“手，拿着！”狱警递过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几个数字编号。

“举到胸前，抬头！”

我双手捏着牌子的两端，照犯人标准像。

这一幕我很熟悉，电视上、电影里都见过，只是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主角。

“左手放低点！”

手微微有些颤抖，因为心中充满了屈辱和悲愤。由于过于“情绪化”，我拒绝看那个牌子，以至于没能记住我的犯人编号。

再过一天，铁门又隆隆打开，我被押到一个窗口前。

“手伸出来！”

“咔嚓”一声，坚硬的手铐干净利落。

接着，我被押到审讯室，坐在一个非常低矮的小凳上。上面，高高地坐着两位办案人员。

我低头望着双手，想起一位作家的话：“手中的笔，挣来一付冰冷手铐。”

这是一只握着笔，写下了许多文字的手。其中，关于重庆长寿湖右派调查的文字，导致了这次牢狱之灾。

长寿湖，是我父亲当年的劳改地，1958年初，627名被打成右派和历史反革命的知识分子被解押到那儿，开始了长达22年的劳改之路。（其中一百余名死在了那儿。）

说到父亲，多年后我才知道，他同当年给我们作报告的那位劳模一样，也去过北京，也见过伟大领袖毛主席，还同他合过影（1957年参加共青团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听妈妈说，他从北京回来后，提到毛主席，满脸的激动和幸福。

不知他是否同毛主席握过手，如果握过，就大大弥补了我初中时的遗憾，因为父亲的手嘛，太容易握，也握过多次。

遗憾的是，父亲见过“红太阳”后仅仅三个月，就被他老人家“引蛇出洞”的“阳谋”打翻在地，踏上了前往长寿湖的劳改之路。

几十年后，2001年，我开始记录长寿湖的那一段血泪史，第二年，便出现了本节开头的那一幕。

“你为什么反D？为什么攻击M主席？”审讯人员责问。

……

望着被铐的双手，我明白了：他们，需要的是一双歌功颂德的手、一双颠倒黑白的手、一双奴颜媚骨的手；一双麻木冷漠的手、一双巧取豪夺的手、一双残酷无情的手……

2021年1月，在异域他乡冷寂的旷野，我向着彤云密布的苍穹高举双手：此生，定要为一双没被扭曲、有正常颜色和健全骨骼的手奋斗！

2021年1月29日

我的姐姐，我的好友，我的“恋人”

在那个“枯荒的年代”，我侥幸多读了几年书，有了一点写作的能力，此时，在岁月的暮色里，我想用这一点能力，为那些在枯荒年代失去了“能力”的远逝青春，写下一点文字。

一，我的姐姐

“妈，糟了！糟了！”姐姐飞奔而入，一头热汗，满面通红。

“怎么了？”妈倏地站起来。

“学校不要我参加升学考试！”姐姐快哭出来。

妈妈的脸也一下通红：“是不是——因——因为，因为家庭——”妈妈慌忙带着姐姐夺门而去。

当天晚上，家里欢声笑语，爸爸尤其显得轻松快乐，几杯烧酒下肚，瘦削的脸上容光焕发：“当年我就是读的三中，那时叫南开中学，是重庆市第一流的中学，校长张伯苓，是个优秀的教育家。南开中学非常难考，只有最优秀的学生才能考上。”爸爸一仰脖子，又吞下一大口酒。“大女不容易呀——”

姐姐又一次满面通红——她因为品学兼优，尤其是“学优”——全年级第一，被保送重庆市第三（南开）中学！

那是1966年6月。

两年后，1968年9月，我与大我一岁半的姐姐同时进校读初一。学校位于一条山沟里，全校只有一幢教学楼，三层。操场是泥土地，下雨时泥水飞溅，天晴时尘土飞扬。但学校名字很响亮——《重庆东方红一中》。

此时，姐姐“子承父业”的“南开梦”早被“文化大革命”击碎。接下来的两年里，她，同我，同全国千千万万的青少年，“停课闹革命”。年龄太小的如我和姐姐等，便“停课看革命”，直到1968年“复课闹革命”。

在那两年里，父母逃亡，我们三姊妹同老奶奶又一次在饥饿中挣扎（上一次是三年大饥饿时）。我同姐姐曾到江边背鹅卵石，挣几个零散铜板补贴家用。

干得最长的是择猪毛。择猪毛就是在一大堆猪毛里把杂色的毛挑选出来，让白色的毛纯净。这是一个非常费眼力和手力的细工活，不仅要有极好的耐心，还要能长时间忍受那臭哄哄的“毛气”。

我干了没两天就觉得到了极限，自古以来，这种绣花般的活就不是爷们干的。

只好劳驾姐姐了。好在她遗传了我外婆那种古典贤惠和我奶奶那种农妇勤劳。于是，在重庆夏日的火热和长江冬风的寒凉里，姐姐一天又一天，埋头于那一堆让人绝望的毛，以她在小学里刻苦学习的勤奋和认真精神，为这个贫穷的家挣得每斤两毛多钱的收入。

待终于“复课闹革命”时，姐姐说，她的视力下降了很多。

几十年后，我看到报道说，很多学生天天做大量的作业，导致视力下降戴上了眼镜。我觉得他们真幸福。

在“东方红一中”，我同姐姐的教材完全一样，政治类的就不用说了，“科学类”的如《工业基础》、《农业基础》也都一个版本。

姐姐读完了整个小学六年，我们这个年级（记得当时按军队“编制”叫“三连”，我们班叫“四排”）只读完了小学四年。我实际上只读了三年，那是因为我跳了一级，直接从二年级升到了四年级。

所以，我们“连”比姐姐的“连”在实力上是有差距的。

更不幸的是，我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同学欺辱和殴打，不得不逃学（相关经历我写在了《长寿湖》一书中），这导致我的成绩大幅下降，尤其是数学。

好在姐姐与我的课本一模一样，于是我就抄她的作业。

没抄多久，我便荣获“三连四排”的“战斗标兵”！记得在期末的一次家访中，班主任老师对我妈说：“谭松是我们班的尖子，语文和数学都是第一名。”

我脸通红，语文勉强说得过去，因为我写过一篇《为人民服务最幸福》的作文，胡编了一些情节让看惯了“假大空”的老师觉得很生动。但数学却完全是盗窃姐姐的知识产权！

（后来我上了高中后，丑媳妇终见公婆，一学期下来，数学考了48分，父亲在成绩单上签字时，问我是不是老师把84写成了48。）

姐姐没能读到高中，两年的初中就成了她花季年华的最高学历。其实这两年也名不副实，如果除去大量的学工学农劳动，三天两头的革命大批判、好几门不务正业的政治课程，真正学点知识的时间只有大半年。

姐姐后来的人生多年都是“择猪毛”的翻版：带小孩、折纸袋、纺纱厂打工……

去年，2020年9月，我在洛杉矶对留学的侄女说，你不要觉得你妈像家庭妇女，她如果不遇到那个时代，而像你一样受到这样的教育——

二，我的好友

他叫杨星，个子比我还矮，胳膊比我还细，在文革那打打杀杀的“要武”年代，他显然不引人关注，也没人愿意主动与他交友。他引起我的注意并让我主动“投怀送抱”是因为班主任的一声责骂。

那天，课间时他在过道上同几位同学打闹。班主任冲着他叫了几声，不知是他没听见还是正闹得欢不想理睬，班主任的喝令没有回应。

班主任突然提高声音：“杨星，你还不听话！你那个家庭（出身）还没让你吸取教训？！”

像当头一棒，他骤然僵硬，面色发白，呆若木鸡。

接着，泪水涌出来。

接着，他转身走到一个角落，默默抹眼泪。

我见状心中大喜：班上还有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

自从我被当众揭露父亲是“坏人”之后，自卑感让我根本不敢在班上交朋友。

现在好了，还有一个同类！孤独中的我怎能放过这天赐良机。

遭受重创的他正独自舔着伤口，一道安慰的目光、几句友好的话语简直是雪中送炭。我们很快走到一起，彼此成了初中时期最好的朋友。

我父亲是 1957 年中了“阳谋”，成了“阶级敌人”。他的家庭呢？我一次次想问他，但想到班主任那一声断喝对他的打击，便不想在他伤口上挖掘。

我提出到他家去玩，这十分正常。可他十分犹豫。我说：“去看看你住在哪儿总可以吧？”

他不好再拒绝，勉强同意了。

前往他家的路上，他说，他家很小，尤其是他妈妈身体不好。“她，她精神有些不正常。”他吞吞吐吐。

那个年代，中国人的居住条件都很差，我早已习惯。但是，看到杨星的家时我明白了他为什么不愿我来。

房间阴暗破旧窄小，里面只有一张床、一张小桌和一张旧衣柜。杨星的床是放在床脚的一张竹凉板。没有厨房，只有一个小小的煤炭灶立在门外屋檐下。他母亲蜷缩在门后一张木凳上，头发散乱，面色苍白，见到我，嘿嘿地傻笑。

没有坐的地方，我们便站在外面闲聊。这时，一个挑着担子的中年男人走来。杨星叫了声“爸爸”，然后把我介绍给他。他冲着我笑了一下，很热情地说：“就在这儿吃个便饭。”

杨星的父亲仪表堂堂，言谈举止隐约透出一种儒雅高贵之气，与那沾满黄泥的挑担和这个陋室反差很大。他母亲见丈夫回来了，从门后迎出来，脸上露出一种柔和的神情。这时我才看清她，五官很清秀，尤其是那双眼睛，很漂亮。年轻时，她一定是个美人。

我没有吃饭就走了，心里，杨星的家庭出身究竟是什么呢？

随着同杨星的交往加深，我慢慢对他有了些妒忌，原因是我发现他的聪明才智远在我之上。比如，我常常是靠抄姐姐的作业才得到数学满分，而他，只要马马虎虎听几节课，做出来的作业便与我的抄袭不相上下。还有，我一向自认为（老师也认为）我的语文作文是班上最优秀的，我也看过杨星的作文，的确不如我。不料，有一天，他交给我一篇他写的长达一万多字的记述文。记述文是关于我们中学生活的。里面有对话、人物描写、场景描写、情感抒发等等。其构思、其生动、其幽默、其深刻，甚至其文笔，都远在我之上！我永远记得我读完那篇万字长文时的复杂心情：敬佩、感叹、感动、妒忌……

“写得很好，杨星。”我由衷赞扬说。“可是你的作文为什么写得那么差呢？”

“那些一半必需是毛主席语录的作文值得花时间去认真写吗？”

那一刻，我既感到羞愧，更感到他比我成熟。

好在他有比我更强的自卑感（包括个子矮小），因此，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恃才自傲。

两年的初中很快结束了，我们这批主要学了一大堆毛主席语录和阶级斗争观念的、没有知识的十五、六岁少年，一夜间成了“知识青年”。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接下来要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毕业前，学校宣布，根据上级指示，每个班有大约百分之五的同学可以升高中，我们班有 50 多人，因此，应当有三个名额。

记得主要有三个推荐条件：政治合格、成绩优秀、年龄小。这三者中我占后两项。小学时因为跳了级，因此我在班上年龄几乎算最小的。可是，最重要的政治条件我不合格（因为出身问题我连红卫兵都没能加入）。

杨星知道，高中的校门对他像天堂的大门，他根本不奢望。他期待的，是不下乡，

能找个工。按照中共的政策，独子可以不下乡，况且他母亲还是残疾人。

几位任教的老师一致推荐了我，尤其是那位“神通广大”的语文老师，为我上下奔波，解释我父亲的问题，抬出我还有一个共产党员的母亲……

我升高中之路很坎坷，报上去，打下来，又报上去……最后，高中校长苏波看在我母亲份上（她当时在区教育局工作），在最后一刻为我敞开了校门。

能读高中是我人生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这所位于偏荒山上的学校（叫涂山高中），聚集了不少有真才实学的老教师，他们大多是民国时的知识分子，因为“出身不好”或自身问题（如右派）被贬到这儿教书。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我比较系统地学到了一些知识，更重要的是，心智得到了开启。

杨星没下乡，也没有工作，他常常爬几个小时山路，来校找我。我也经常讲给他高中的学习和生活，有时，不经意地流露出兴奋和沾沾自喜。

他默默无语。

有一次，我瞥见教室窗外有个人影，定睛一看，是他。

他悄悄在窗外听课！

事后我问他，他说，他每次来都这样。

小学时读高玉宝的《我要读书》，我曾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把一本多余的代数书给他，简单给他讲了一下叫他回去自己看。

没多久他又上山来，把解的习题给我看。我又一次感叹和妒忌：他如果与我同窗，我一定屈居他之下。

大半年后，他最后一次上山来，告诉我，他要下农村了。

“不是说独子不下乡吗？”

“政策是这样规定的，但他们说，我出身反革命家庭，不能享受这条政策。”

这时，我已经知道他的出身了。他父亲在一所医学院毕业后，曾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过军医。1949年共产党来后，他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长年干挑泥巴、抬石头的苦力活。他还说，他一生下来，家里就很艰难，他个子矮小就是因为从小营养不良。（但他母亲是怎么精神失常的我一直不知。不过，后来接触历史多了，可以想象。）

“下乡也好，”他见我难过，说：“在城里呆着也痛苦，他们不会给我工作的。”

十多年后，1984年，我从外地调回重庆，在一所大专院校教书。他听说后专门找到学校，我们又一次相见。这时，他已从农村回来好几年了，在街道上打工。

这次相见，我发现他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那种睿智、机敏、幽默。虽然还不是鲁迅笔下的闰土，但思绪和语言远没了当年的那种活跃和流畅。

他感到了我们的差距，交谈时隐隐流露出自卑和落寞。

饭后我送他到车站，告别时我说：“找个时间我去你家。”

他十分犹豫，就像当年。

“今后再说吧。我结婚了，她完全没有文化。”

今后就是几十年后的现在了，我早已同他失去了联系。

三，我的“恋人”

她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我最初注意到她正是因为她的这个职务。

在那个火热的革命年代，男女交往堪比敌区的地下活动，不仅有无数群众“雪亮的眼睛”，更有“大人和教师爷”的严控与惩罚。班上男女同学互不说话，我也从没同任何女同学说过一句话。

但是，朦朦胧胧有一种磁性的牵引，让目光总想转向那长发飘动的地方。可是，我不敢正眼相看，游离的目光眼神从来没有分辨出美丑的细节。

那一天，她下发作业本，发到我桌前时似乎多停留了几秒。我借举手拿本子，抬头盯着她看了几眼。

时间虽短，却是近距离审美，从此，她的容貌，尤其是那双大大的眼睛，深深印在我脑海中。从此，仿佛有一种无形的牵引，让我神游在她的周围，悄悄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尤其是学习成绩。如果她考得很好，甚至回答问题受到老师的表扬，我便暗暗吃醋，觉得更加高不可攀。

可恼的是，作为学习委员的她，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这让我在那段“单恋”的日子里，初尝了吃醋的滋味。

每次下发作业本，我都希望她能递到我手中。可惜，她往往无视我多情的手，“啪”地把作业本往桌上一扔，就像对其他同学一样。

我知道自己毫无吸引力，个头矮小，面色因营养欠缺长期呈现苍白加菜色。更要命的是，我的家庭出身班上人人皆知，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这简直就是贱民的标志。

可是，我仍然暗暗地单恋，这自作多情的神游让我在那压抑禁锢的年代里感到一种朦胧的美好。

学校举办演出，其中一个节目是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片段。我对那听腻了的腔调毫无兴趣。可突然，“铁梅”出场了，居然是她，我的“恋人”！

没想到她还有这种才华，能在校宣传队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

我抑制心跳，目不转睛——这是合法的。

她唱得怎样我已经记不得了，印象最深的是她的美，那苗条的身材，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还有那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一点不逊于电影上那个明星“铁梅”。

那次饱餐秀色之后，我更加自惭形愧。她太优秀了，而且出生也好（否则不会让她扮演铁梅）。

我决定斩断这段门户不当的“恋情”。

好在只有朦胧的精神爱恋，陷入不深，好在我正巧迷上了钓鱼，便成功地移情于山水之间。

不久，两年的初中结束了，同学们各奔东西，绝大部分去了不同地区的农村，从此再也没能相见。

一年多后的一个周末，我从山上的学校回家。快到家时，迎面而来一位年轻姑娘。

我一眼认出，是她！

我心中一慌，惯性地低下头，不敢面对。

“哟，不认识了呀？”

没料到她会主动招呼，这在以前是绝不可能的。

我停下来，第一次近距离面对面地交谈。我有些手足无措，她显得落落大方。她告诉我，她到大巴山农村劳动一年了，这次回来探亲。

她变了，不仅脸晒黑了，那根又粗又长的辫子消失了，更主要的是，她言谈举止有了一股山乡的“粗犷”。

仅仅一年，“广阔天地”便让人脱胎换骨。

不过，那双眼睛仍然那么晶莹，那么诱人。

她问起我在高中的学习和生活，我来了精神，侃侃而谈。

好一会，我才发现她的神色越来越黯然，目光越来越迷离。当我提到周日下午就要返校，晚上要上晚自习时，她仿佛从心底无限深远的地方，发出轻轻的一声赞叹：“太好了。”

十多分钟的交谈，留给我终身难忘的，就是这一声轻叹。她说这话时的神情，那么动人，那么凄美，那么深沉！

有羡慕、渴望、感叹、无奈、落寞、忧伤、苦涩……

五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写下这段经历时，那一声轻叹仍然沉重撞击我身心：那里面饱含了整整一代人无可奈何的泣血长叹，那里面回响着千万学子“失血”青春的悠长悲鸣……

我同“恋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谈结束了。道别后各自东西。到拐角处我回头望去，夕阳金色的光辉洒向她渐渐远去的身影……

从此，我再没有见到她。

后记

有人说，我算“有出息”，干了一番事业，出了几本“大作”。

我一点没有“自得”，更没有“洋洋自得”。

随着年岁的增加，暮色的逼近，内心的忧伤和苦痛与日俱增。我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幸运儿，初中班上50多个同学中，只有三个有幸读了高中，在三个有幸者中，又只有我有幸读了大学。

如果我也像我姐姐、我的好友、我的“恋人”，我会有什么“出息”？如果他们，和他们背后千千万万的同代人，有我这样的幸运，中华大地上，会有多少比我有“出息”的杰出人物！

文革后，曾有一个动人的口号：“向‘四人帮’讨还青春！”这自欺欺人的口号能给千千万万荒废了的青春一点安慰吗？

青春，一旦逝去，便永远逝去。

我曾在《长寿湖》一书中说，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祭献在了“阳谋”的祭坛上；在《血红的土地》一书中说，千千万万地富们，祭献在了“土改”的祭坛上。

那么，有多少鲜活的青春，祭献在那个“枯荒”的祭坛上？

2020年2月20日于拉斯维加斯

2018，你还好吗？

我能听见新年的钟声吗，在异域他乡这间低矮的小屋里？
漫天的飞雪，在新旧交替的夜空里挥洒着寒冷的迷乱。
心中那一团期盼的炉火又在熊熊燃烧，它炽烈的焰光照见我泪光迷蒙的双眼。
期盼，刻骨铭心的期盼，飞越太平洋万里波涛，奔腾回荡在我那魂牵梦萦的苍凉大地。

2018，你还好吗？

讲台上的诵读，此时已是遥远的回忆，但那华光四射的诗句仍让我热泪盈眶：

“给我吧，你疲惫而贫穷的大众
你蜷缩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人们
那些在你拥挤的岸边被遗弃的不幸者
那无家可归、饱受磨难的人们，都给我吧
我在金色的大门，高举自由的明灯！”

如今，我跨越万里波涛，来到你的身旁自由地呼吸。可是，你高举的火炬为什么没有化解我眼中绵长的忧伤？“哪儿有自由，哪儿就是祖国”的千古名句，为什么没有拂去我心中刻骨的乡愁？

逃离了故土的恐惧，又拥抱流亡的寒凉。2018，你将怎样帮我翻过我生命中这沉重的一页？

都说“寒冷的冬天来了，希望的春天还会远吗？”我在这动人诗句的抚慰下，年复一年，从希望走向失望，从寒冷走向更加寒冷。

2018，我将如何迎候你，期盼你？

在这我听不见钟声、望不见故土的雪白大地上，我别无选择，唯有把这陈旧的美丽期盼，作为抚慰我、拯救我的圣殿烛光！

2018，你还好吗？

你能否作一次正确的选择，在万古不变的沉闷里，在红歌颠狂的绝望中，在“岁月静好”的死寂下，奋身而起，面向自由的火炬，开辟出华夏全新的文明走向？！

还会有多少中华的优秀儿女，祭献在奔赴自由火炬的路上？我不愿做铁窗下又一个病亡的殉道；心中燃烧的，是金戈铁马、仰卧疆场的壮烈！

2018，在你365个日夜里，无论是寒风凛冽的清晨，还是血色厚重的黄昏，你一声战斗的号角，将是我生命中神圣的召唤！

2018，我向你虔诚地跪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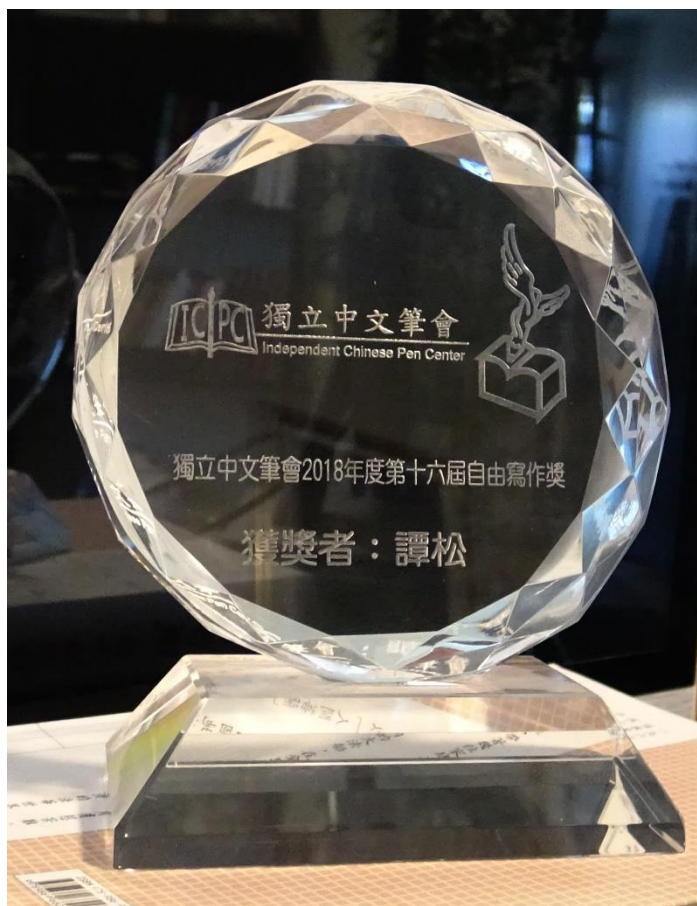
归来，归来！不要让我等到满头白发，步履踉跄；

归来，归来！不要让父兄前辈的啼血期盼，又化作子孙后代的无奈哀叹；

归来，归来！让我在生养我的辽阔大地上，燃尽我生命的最后焰光！2018，你还好吗？

2017年12月30日于美国

获奖感言



在不自由的环境中写作了多年，获得了独立中文笔会的“自由写作奖”，心中感慨。

什么是“自由写作”呢？我想，就是本着自己的良知和认知，真实地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这在民主自由的国家里，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当然也是十分安全的事。可是，在不自由的专制国家里，“自由写作”却是一件高风险的行为，轻则被警告处罚，重则可能丢了生家性命。纵观中共统治中国 70 年的历史，这类案例实在太多了，比如林昭、比如遇罗克，等等。

在不自由的环境里要本着自己的良知真实地写作，我觉得首先就是要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我在《长寿湖——1957 年右派调查》一书的后记中写道：“共产党在这 50 多年来最‘伟大’的治国韬略之一就是：它成功地把一张铺天盖地的恐怖大网严严实实地笼罩在神州大地上，让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中。久而久之，外在的恐惧幽灵内化为奴性的行为自觉。”

这些年，我做了一些采写中共统治下的历史真相工作，我本着调查如实地记录，也可说是“自由写作”吧。这项工作始于 2001 年初，可是，第二年，当采写还没完成时，我就被抓捕入狱，这时我才知道，你敢采写中共统治下的历史真相，你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在不自由环境下，“自由写作”要承受的风险和付出的代价。

要坚持这条道路，首先要有克服内心恐惧的勇气。

在专制的威压下我也曾想过退缩、放弃。比如，在看守所听见那阴深的禁闭室发出囚犯痛苦的叫声时，我害怕了，甚至后悔，不该作这种“自由写作”。至于恐惧，那更是伴随我多年，比如，当抓捕我的国家安全局叫我去“喝茶”时；比如，听到突然的敲门声时。有记得有一天，咚咚门声之后，进来几条汉子，其中两人身着制服，我顿时脸色发白，手中的笔，索索直抖。虽然是一场虚惊，但那恐惧，却是实实在在刻骨铭心。

2013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第一次披露我十年前开始做的中共土改真相调查时，曾有一位听众提问：你做这种调查害不害怕？我回答，害怕。

在得知获奖前两天，我采写的《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调查》终于在台湾出版。这本书从最初采访到出版整整十六年。我永远记得着手这项采写时的经历和情景。当时我还处在取保候审时期，国安局明确对我宣布，在这个时期，如有新的犯罪，将马上抓捕收监，不需要报批手续了。如果我再做这种调查采访，将新帐旧帐一起算……

那么，我如何来克服内心的这种恐惧呢？

很遗憾，我还不是一个“信徒”，远没有古罗马基督徒唱着圣歌走向刑场的坚定和勇气，支撑我坚持下来的一大原因就是我所调查采写的苦难本身。我在回答那位听众的提问时说：每当我感到害怕想放弃时，我所了解到的那一幕幕悲剧就涌上心头，尤其是那一个个惨死在暴政下的无辜生命，我总是觉得他们沾满泪水和鲜血的脸在我眼前晃动，我总是感到他们的在天之灵在注视着我，这让我很痛苦，也让我更坚定。我觉得，如果我不知道就算了，我知道了，无法沉默。

促使我着手土改调查的就是无意中得知一位地主老婆被一根铁条从下身穿进去，导致她子宫破裂而死。我觉得，我知道了，我无法沉默。

在我所做的调查采写中（如右派调查、刘文彩《收租院》真相调查、重庆大轰炸调查等），最艰难的就是土改调查，但我最坚定要完成的，也是这项调查。

我在《血红的土地》前言中说：“遗忘，让被扼杀的生命又遭受一次不幸——一种比肉体生命消亡更深刻的幸。然而，面对地主的苦难，岂只是生命的虐杀和虐杀之后的遗忘？地富们在付出了财产和生命之后，还要背负着‘罪该万死’的骂名，被贴上‘遗臭万年’的标记，这才是更深刻的幸，最大的幸。人世间的大不公，莫过于此！”正是在调查中，我刻骨铭心地看到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冤屈、残暴和不公。一件件真实的案例，一个个悲痛的讲述，让我心中充满了悲愤。

2006年，我在又一次失业且又遭遇一次挫折时，觉得很累，想放弃了。但又一个土改悲剧让我坚持下来。那是一个不幸小女孩的遭遇，她的父母都死于土改，她同她八岁的哥哥只得流浪讨饭。她害怕失去唯一的亲人，讨到饭后先让给哥哥吃。最后，在面临饿死的危险时，她被一个农民抱走。分别时她紧紧抓住哥哥，很远很远了她还扭头望着哥哥。这位年仅四岁的小女孩从此消失了。几十年后，当她哥哥老泪纵横讲起那分别的一幕时，我又涌起那种压抑不住的情感——悲愤——对人类的不幸的悲悯之心和对暴政恶行的无比愤怒！

这种极其强烈的悲愤就是让我产生勇气，克服内心恐惧的主要原因。

另外，我也看到，造成种种悲剧和苦难的土壤还在，不仅在，而且还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大量制造悲剧和苦难。比如，土改时所使用过的种种残酷手段就不断地反复出现。历史的真相被层层叠叠的谎言所掩盖，暴行和恶果还远远没有被揭露和清算。这既愧对那些死在暴政屠刀下的冤魂，也愧对我们民族的后代子孙。为了天空不再黑暗，必须先揭露黑暗。杨继绳先生2015年在他的获奖感言中说：“保卫民族记忆，是当代知识份子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赴汤蹈火，也应在所不惜！”

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也是我勇气的又一来源。

自由写作，本是天赋人权，但在不自由的国家里，却像一个罪犯的地下活动。我永远难忘这些年来偷偷摸摸采写时的那种紧张和恐惧，永远记得把手稿和录音像脏款一样四处藏匿的狼狈和慌乱。

多年的这种经历，也让我心中充满了愤怒——制造层层苦难浩浩沉冤的作恶者们，你们凭什么？！同时，累积的苦难记忆，更让我内心坚定不移——手中吸满鲜血的笔，一定要书写出民族的不幸、暴政的血腥！当然，我也产生强烈的愿望：一定要争取自由写作的权利，要争取免除恐惧的自由，让人人都能自由地言说自由地写作，这是天赋人权，也是揭露邪恶防止暴政的一个重要利器。

希望有更多的人为这一人权去抗争、去付出，我们不付出就只有让下一代或者下一代去付出。我坚信，人人都能自由写作的明朗天空一定会在我们不懈的抗争和顽强的奋斗中出现！

到那一天，我们就不再需要“自由写作奖”了。

那时，自由的阳光艳光四射，照耀着这片古老的东方大地！

2019年1月29日于美国拉斯维加斯

1967年，那个炎热的夏天

太阳缓缓沉向对岸起伏的山岭，水面上闪动着一条长长的金色波光，江风起处，飘来几丝清凉。泥鳅一样成天在岸边和水中活蹦乱跳的光屁股们，穿上那条叫做“火腰裤”的短裤，三三两两向坡上走去。

我赤条条从浑黄江水中钻出来，望了一眼我的“火腰裤”，该回家了。

泊靠在江边那艘巨大登陆艇，在礁石上投下长长的阴影，我望着它，玩兴又起——爬上去再来一次高台“冰棍跳”（也叫“跳冰棍”）。

“跳冰棍”是指赤身裸体从高处垂直跳入江中，越高越刺激，越高越能展示男儿勇气并获得其他光屁股们的喝彩。登陆艇宽长的甲板，尤其是它那高耸的、像巨大圆型烟囱的驾驶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跳冰棍”平台。

十分钟后，我又爬上乳白色的驾驶台，下面，浊浪滔滔，发出呜呜哗哗的声音。经过十多天从低级（低层甲板）到中级（高层甲板）到高级（驾驶台）的实练，我已经能面不改色地站在高高的驾驶台，俯视滔滔江水，从容不迫地从天而降。

我一手捏住鼻孔，一手捂住睾丸——这是“跳冰棍”的防护姿势。

突然，山坡上出现一个女人，一个头发散乱的女人，她站在一棵黄桷树下，面对长江，面对夕阳。

她一动不动，像夕阳血红光影下的一尊塑像，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登陆艇，也就是说，也正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一惊，下意识地捂紧下体。

好大胆的女人！

这一年多来（1966年夏停课以来），从弹子石到铜元局这一长条河岸，已经是我们光屁股男孩专属领地，大白天，没有任何女人敢闯入。偶尔，一两个“迷途的羔羊”误入领地，那场景，就像一滴冷水滚入一锅沸油，炸了锅的“光屁股”们冲着“羔羊”山呼海啸，吓得她（她们）花容失色，落荒而逃。这是在那个无书可读、无学可上的枯荒年代里，光屁股们的变态发泄和精神欢宴。

可此时，光屁股大都回家了，我势单力薄。

我怔住了，一时手足无措。可她却毫无羞耻，仍旧直勾勾地盯着船，和我。

“砰”地一声，我一个“跳冰棍”，逃离了她的射线。

二

这艘登陆艇，是文革武斗赐给我们光屁股们的一个“大玩具”，我有幸目睹了它变为“大玩具”的悲壮过程，虽然当时心惊肉跳。

那是又一个酷热的日子，远处传来零星枪声，我们已经习惯，不再惊慌。突然，江面上回响起高音喇叭的吼叫，内容听不清，但分明感到那种急迫和紧张，几艘轮船拉响了汽笛，仿佛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院坝上，已经有好几个大人在缩头缩脑地观望，斜对面，就是重庆著名的朝天门（当时改名为“红港”）。红港扼守在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面向汇流后的滚滚大江。

江两岸高音喇叭吵成一片，家邻近的龙门浩也加入了吼叫，那个喇叭就在渡船码头正上方的一个仓库顶上。

奶奶想把我拉进屋，我虽然害怕，但更好奇——到底会发生什么？父母在几个月前先后逃走了，奶奶管不住我。



很快，在弹子石下方的江中，出现了几艘船，其中最大的就是一艘登陆艇，它的造型与其他船不同，又粗又长的筒子一样的船身和耸立在船中央右侧的圆筒驾驶台。我常常看见它在江中气势磅礴破浪而行，船头激起高高水浪。

几艘船从嘉陵江驶出，其中也有两艘登陆艇！冲在最前面的是一艘拖轮（后来得知它叫“长江207”）。时此，江面上和江两岸，枪声大作。我想，那几艘从下游开来的船可能经不住两岸的夹击和江上的攻击。

炮声！炮声！

转眼间，冲在最前面的“长江207”冒烟起火，软弱无力地往长江下游飘走，两艘小火轮赶去救援，也被击中，只得慌忙逃走（注一）。

同时，登陆艇对战登陆艇！

枪声，对炮声！

从嘉陵江中冲出的登陆艇（人民28号）中弹，又是冒烟起火。它歪歪斜斜，挣扎着飘到南岸江边，沉没在一个叫野猫溪的地方（我曾在那儿游泳）。

另一艘登陆艇（人民30号）也在转眼间身中数弹，它见势不妙，趁还能动

弹，赶紧退入嘉陵江。

不可一世的红港大楼也被炮击，喇叭声和枪声很快消停。



“8·8 海战”的水域——重庆两江交汇处

朝天门水域的海战不一会就结束了，三艘从下游开来的战艇似乎完好无损，它们继续上行，转眼就到了我家的下面。这时，看见那艘登陆艇（人民 5 号）上飘扬着“反到底一号”的旗帜。我以为炮火马上要在我身边炸开，吓得赶紧跑进家后面一个只能容几个人的小防空洞。

没有炮响，只有龙门浩渡口处传来单调的“哒哒哒”机枪声。这时，听见“人民 5 号”上高音喇叭叫道：“你龟儿那破枪就不要打了，你要为你周围的老百姓着想。”

登陆艇没有开炮，它的高音喇叭让“哒哒哒”戛然而止。（注二）

我又跑到院坝上，人民 5 号登陆艇和它的随行战艇不慌不忙缓缓上行，印象很深的是那艘叫“望江 101”的炮艇，它鞍前马后，上上下下，如入无人之境。刚过我家门前，它便掉头独自向下游驶去，完全不把刚才激战过的那片水域放在眼里。



当年我观“海战”的地方，现在修起一幢大楼

下一场战斗发生在我家上方约两公里的铜元局长江电工厂前的水面，听见密集的枪声和沉闷的炮声，远远看见滚滚硝烟和冲天的火光，血红的夕阳映照着一片血红的天空……

这一天，是 1967 年 8 月 8 日，文革武斗中全国唯一的一次海战。（注三）

三

它静静地躺在江水中，身躯被水淹没，只有那高高的圆筒驾驶台，还歪斜着挣出水面，心有不甘地仰头向天。



“人民 28 号” 沉没处（左下角）

八月的长江波涛滚滚，“死不瞑目”的圆筒睁着两排黑洞洞的“眼睛”，同激流和一股股涌来的波浪抗争，十多天过去了，它居然没被激流冲走。邻居中有一位属于“八一五”派（即在海战中被打败的一派）的大哥说，登陆艇中弹燃烧，倾斜下沉，驾驶登陆艇的革命战友临危不惧，拼死将船移到了南岸江边，避免了葬身江底。我站在地坝上，望着歪斜在水面上的驾驶台，心想，它肚子裡的革命战友们都逃出来、或者说救出来了吗？

那天，我仍像上学一样准时来到江边，突然发现，一艘巨大的登陆艇停泊在我们游泳的领地内，距岸边不到 20 米。

是它，“人民 28 号”！

是怎么把它打捞起来，又为什么拖到这儿？不过，这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天降一个“大玩具”，给光屁股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首先，也是最让人高兴的，是“大玩具”没人管理，任人攀爬玩耍；其次，它的“大肚子”（货舱）宽敞通透，又遮阴避阳；第三，它的船头、过道甲板、船仓甲板、驾驶台，都是绝佳的跳水平台，众多光屁股在这儿比试高低，“跳冰棍”、“展飞燕”，此起彼伏，一片欢声笑语。



“人民 28 号”停泊处（左下角）

初次进入“大玩具”时我心咚咚直跳，害怕突然看到或者触碰到死尸或者断肢残臂。我轻手轻脚，双眼圆睁，好奇而又紧张，一步步从前到后，又从下到上。

“大玩具”内部的具体结构已经记不清了，记得有一些大小不一的舱房，有探照灯、绞滩用的绞缆钩、救生艇支架、楼梯等等。印象深的是轮机房里那些粗壮的管道和巨大的机器。由于水的浸泡，一些铁器生出暗红色锈斑，让人一下想起那天的硝烟火光，想起斑斑血迹，不由生出恐惧。

整个“大玩具”被江水浸洗得干干净净，除了几个大大的弹洞和一些弹痕，难以让人想起那场海战。瓦厂湾（登陆艇泊靠的地方）有几个长江航运的老船工，一天，我听见他们在岸边议论。一个皮肤黑黢的老人边吧嗒着叶子烟边说，“人民 28 号”是二战时美军建造的，战后我国把它和其他几艘登陆艇买了下来。1949 年之后改了几次名，最初叫“华”字 XX 号，后来才改为“人民”XX 号。他说，美军建造的这批登陆艇性能不错，马力大，结实，废了很可惜。



华字号登陆艇在长江航行（网络图片）

“人民 28”虽已残废，但其体内众多零部件仍然价值不菲，尤其是由黄铜

制作的部件，那可是来自老美的上等原料。此时，“人民 28”既然已经成为人人可以玩弄的无主“大玩具”，那么，那些贵重的黄铜不翼而飞也就十分正常。很快，我就发现“大玩具”缺胳膊少腿，那坑坑洼洼的遗洞，与它周身的累累弹痕相映成辉。

四

我从水中出来，穿上“火腰裤”，夕阳最后一抹余辉，从一团灰黑而狰狞的云层中射出，浑黄江面上暗红波动。岸上安静下来，坡上房舍，飘出袅袅炊烟。

我抬头朝那棵黄桷树望去，不知是角度太低还是人已离去，张望半晌，不见动静。我起身往坡上走去。

有火光从黄桷树下窜出，一股黑烟冲天而起，江风吹来，空中飞飞扬扬飘起细碎的灰黑纸片。

好奇心驱使我赶紧朝树下走去。

看见她了，那个盯着登陆艇和我的女人！

她大约四十来岁，个头瘦小，身着蓝色土布汗衫，脚穿一双黑布白底布鞋，地上，躺着一个灰布包袱，包袱旁边，立着一个酒瓶。她正前方，对着长江的地方，几个石块叠成一个小小祭台，上面摆着几个瓜果和一个酒杯。祭台前的泥地上，几柱香袅袅吐出细长的烟。香前面，一小堆灰烬还星星点点闪烁着火星。一个烧去大半的袖章紧靠着灰烬，发出一红一暗的火光，一股黑烟升起，在空中弥漫。

女人盘腿坐在地上，目光越过祭台烟火，呆若泥像般地盯着残光余照下的“人民 28”。

喧嚣一整天的世界暂时静下来。下面，江水在回水沱里回旋翻涌，水波一浪接一浪，永不停息地拍打着横卧水面、像一口巨大棺材的、死气沉沉的铁甲船，“啪嗒”、“啪嗒”，发出单调而冷寂的声音。

暮色苍茫，远处，一声汽笛，沉郁而凄长。

突然，女人身子向前一倾，“啪”地一声扑到在地。她双手痉挛，十指死死抓入地上的泥土。祭台前那堆灰烬，“轰”地一声，灰烟四起。

“大嫂！”我惊得叫出声。

她没有一点反应，只有那十个指头，狂暴地抓捏地上的泥土，好像全身的力量都灌注在十个手指中。

半晌，她抬起头，纸灰抹黑了整个脸颊。暮色中，一双眼睛，红肿的眼睛。

泪水流下来，灰黑的脸上呈现出两道细长的白沟。

突然，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叫—— 一声仿佛从绝望深谷里发出的呼叫——

“洪——儿——啊——”

写于 2022 年 8 月，距重庆“8·8 海战”55 周年

注一：“长江 207”被炮弹击中后，迅速起火燃烧，侥幸未死的人跳水逃命，又遭到舰载机枪的疯狂扫射，不少人脑浆迸裂，葬身鱼腹。（《龙门阵》2012 年第 3 期）

注二：这位独自以一挺机枪对抗几艘战舰的斗士姓潘，是重庆南岸大庆民中战斗队的司令，“8·8海战”中，他因及时退出未遭炮击，但在接下来的22日南岸上新街武斗中，他被反到底派杀害，终年18岁。他最后的呼喊是：“毛主席万岁！”（那一战打死22人）

潘是家中独子，我曾见过他父母（潘的未婚妻是我同学的姐姐）。潘父母看上去像是儒雅的知识分子，他们郁郁的眼神至今留在我记忆里。

注三：这场以枪对炮的“8·8海战”，打死24人，打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打坏12艘。长江交通为之中断。（《重庆市志·第一卷·大事记》）

“妈妈”

一

妈妈去世一个多月了，这些日子，她天天出现在我眼前，可是，我一直没有写出纪念她的文字。不仅没有写，而且，她一出现，我便强迫自己“扭过头，不看她”。

4月14日，是妈妈的“头七”。“头七”据说是亡灵回归故里的日子。重庆朋友发来信息，说那天重庆有雨。我于是赶紧拿起笔，想在“头七”前写下纪念她的文字。不料，没写几行，强忍的悲情又排山倒海，压抑的泪水又滚滚而出，写不下去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品尝了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那种抑郁，可怕的抑郁。我用了全部身心力量同它抗争，形销骨立，累累伤痕，不敢再去想妈妈。

“头七”时我没写下去，“母亲节”时写不下去。可明天，5月30日，是妈妈的生日了。想到再也无法为她过生，悲风又起……

必须一吐心中淤积了。

二

我同妈妈分别在深秋一个有雨的日子，2017年11月20日。这时，离我登机已不到20个小时。

我临行前才告诉她这个重大决定，主要是怕她难过，我不敢面对她痛苦的眼神。那几年，姐姐弟弟在外地，主要是我照看她。每个周末，我从学校归来，便是她兴奋快乐的时刻；每次分别，她都依依不舍，久久望着我离去的背影，又企盼下一个周末。我是她最大的安慰和依托。现在，我突然远走他乡，归期难测，她怎么承受！

可是，妈妈并未露出我所担心的那种反应。她沉默片刻，喃喃地说：“走了好，走了好。”看来，我虽然是她最大的安慰和依托，但也是她长期的“心病”和“负担”。

“这些日子我电话都不敢给你打，怕他们追踪到你的行踪。”妈妈说。
妈妈一生，历经艰辛，练就了她的沉稳和坚强。

三

妈妈在很年轻时，受中共《新华日报》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宪政的新中国”的感召（这同父亲一样），在重庆女子师范学校加入了中共的地下组织。她对我说：“那时，国民党没有呼喊民主自由，只有共产党天天在呼喊，呼喊得声声入耳、声声入心。我以为中国只有共产党追求民主自由，所以就跟共产党走了。”

那是1946年，妈妈18岁。

同父亲一样，她开始了提心吊胆的地下工作。

“新中国”到来后，妈妈担任了重庆市南岸区团区委少先部部长，不久，她同担任团区委书记的父亲结了婚。

燃烧的革命激情，甜美的青春情爱……



父母年轻时

然而，1957年，一场来自北京的六月寒雪、一封发自南岸区委的告密信件，点金为土，终结了虚幻的明朗天空和真实的青年梦想。

1996年母亲节时我写了一篇文章《没有她们，便没有世界》。我写道：母亲已经老了，眼角的皱纹，头上的白发。从尘封的影集里，发现母亲曾经那样年轻、那样秀美。可惜，当她非常年轻非常秀美时，那一个“引蛇出洞”的“阳谋”就把同样年轻的父亲送去了一个偏荒的地方。



1952年，父母在南岸区

不知母亲是怎样挺过那场突来的灾变。一夜间，丈夫兼革命战友成了“阶级敌人”，这个“界线”如何划清？还有，独自拖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幼儿，如何面对每日的油盐柴米？很多家庭因此而玉殒香消，但是，妈妈宁愿被贬谪坚决不离婚。

只是，听说她抱着刚出世的弟弟，喂给他的奶汁中有点点泪水。

在三年大饥荒最困难的日子里，母亲的小女夭折了，紧接着外婆也衰弱到了尽头。“我，我想吃一片扣肉”，外婆吃力地说，母亲发疯般地奔出门去，四处觅求。但是，外婆未能吃到肉便悄然去了另一个世界（后来我写下了《1962，我的外婆》一文纪念她）。

没有人安慰她一声“化悲痛为力量”，母亲只有独自用瘦弱的肩膀，拼命支撑起破碎的家。差一点，已全身水肿的母亲，就步了外婆的后尘。

接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汹涌而来。

记得那一天，母亲带着我们姊妹三人来到她单位（南岸区区工会）吃早饭，劈面一张大字报：“专看裴秀娟的立场！”母亲一下子怔住了，一动不动。我们三姊妹也一动不动，同母亲像受审一样一起盯着那些杀气腾腾的文字。

上面的字有些我不认得，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句话：“裴秀娟坚持同老虎（指我父亲）睡在一起！事实证明，不是共产党员的裴秀娟去改造反党分子的谭显殷，而是反党分子的谭显殷改造了身为共产党员的裴秀娟！”

这是母亲单位第一张大字报，它点燃了区工会的文革烈火。



文革前的母亲

大字报前，人来人往，那目光咬得人恨无地洞可钻。我不敢看妈妈，她

一定非常难堪，仿佛在饱受了党红色教育的儿女面前被人脱光了抽打。

很快，刚回城几年的父亲又被押去了那个“惩罚其肉体以拯救其灵魂”的地方。住家的四壁上，浓黑的墨汁写满了“打倒”。那天半夜，一群天兵天将破门而入，吼叫声惊天动地……

第二天早上，鲜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灼目的阳光照耀着墙上的黑墨。母亲坐在窗前，呆若木鸡。我偷偷瞥了她一眼，心中骤然一紧，从此难忘什么叫绝望的苍白、苍白的绝望！

但她坚定地站起来，平静地对我们说：“到学校去，不要担心家里。”



前几年，我写了一篇文章《1967年，我，和奶奶》，其中我写道：

几个月后的一天半夜，一个男人幽灵般溜进家门。我从睡梦中惊醒，定睛一看，哇，是他，父亲！

父亲满脸疲惫，一身肮脏。

……

（见后面该文）

妈妈与读小学时的我

我18岁时下乡落户，离家的前一夜，妈妈在灯下久久守候，朦胧泪光中依稀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千古诗情。

“你出身不好，今后恐怕很艰难，一切靠你自己努力奋斗了。”妈妈忧伤地说。

四

多年后我重返故乡时母亲已离休，父亲也已回到“党的怀抱”。从18岁投身那个党，到后来“新中国”坎坷岁月，母亲一路走得提心吊胆。庆幸的是，她终于在晚年迎来了平安日子。

可惜，没多久，“平安”又被我搅乱，是我，让她又天天提心吊胆！

记得2002年底那个寒冷的日子，她把“取保候审”的我叫回家，满面忧愁地说：“这些日子我内心很矛盾，想阻止你又说不出口，因为你做的是对的，当年我同你爸也正是这样在做，这样在追求。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母亲，看到儿子这样，多么担心……”

我没有顾及母亲的心，仅仅两个半月之后，我就开始了那后来导致我跌落讲台，被迫流亡的土改调查……

2017年11月22日，我在《自由天空下的第一行眼泪》中写道：

……

近黄昏时，我同她告别，她站在养老院大门的外面。深秋的冷雨悄无声

息，飘洒在她花白的鬓发和苍老的脸上。

我一再叫她进去，她不肯，怔怔地望着我。我不敢看她，怕看到一行苍凉的老泪，从此成为我心灵上凝固的悲伤。

.....

我没有想到，这，就是我同母亲的最后一面。

五

在我流亡他乡的这几年里，每当有人去看她，尤其是我的朋友，她一定会谈起我，同时，她也一再向他们问起我的情况。“他那些年做的事好多我都不知道，他是怕我担心，一直不告诉我。”她去世前一个月，同为右二代的徐姐和蜀玲姐去看她，事后徐姐对我说，“你妈妈问到你的情况时，那双眼睛眼巴巴地直望着我。你妈妈的那种心情呐——”

可是，妈妈一听说我想回去就紧张万分！

是什么，让一个日夜思念儿子的母亲坚决阻止儿子归来？！

姐姐说：“现在有个说法：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家中没有病人，牢中没有亲人’。”

“儿子，我们可能见不到了，不过，只要你平安就好。”妈妈多次在视频中对我说。

三年前，被坦克压断双腿的方政先生被拒回国为父奔丧，我向他表示问候时他说：“这是我们这种流亡者必须付出的代价。”

可是，我一直认为我不会付出这种代价，我同妈妈只是暂时分别，因为我一定要回去，而妈妈虽然年事已高，但身体还好，尤其是她清晰的思绪和流畅的语言让人很惊叹。去世那天（4月7号）上午，南岸区老干局的领导去看她，她还接待了客人。他们说：“裴老，你百岁时，我们给你一个大红包。”

六

妈妈去世前几天，卷缩在床上，喃喃读数，从一到一百，又从一百到一。姐姐说，她双眼紧闭，读得非常清晰和准确，一点不错乱。只是，不知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什么。

我看到姐姐发来的妈妈读数的视频，泪水陡然夺眶而出，我仿佛从她喃喃读数里，读到了她啼血而又绝望的期盼！

父亲去世前一周，在病床上问我：“网上有什么信息？”我知道他的期盼。他曾对我说，他一辈子渴盼中国走上民主自由宪政之路。但是他也说，他可能看不到了。

妈妈最后的日子，在期盼什么呢？是不是她也知道，她盼不到了。

“头七”那天夜里，我彻夜未眠，我想，妈妈魂归故乡，目光会飞越万里，寻找她不能归家的爱子吗？

4月7号晚上六点，姐姐叫她吃饭，她起床后说：“我还想睡一会。”她又躺下了。

十多分钟后，姐姐走进屋，发现她已经永远睡去。

多年前我曾在课堂上讲丁尼生的《渡过沙洲》和史蒂文森的《安魂曲》，这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吟唱。

史蒂文森说：“（死亡）好像海洋的水手上了岸边，好像山间的猎人回到了家。”丁尼生说：“该没有诀别的哀痛悲伤吧，当我登船远航。跨越时空的疆界，潮水载我驶向远方，但愿能面晤我的舵手（上帝），当我渡过沙洲向海洋。”

此时，能用这些诗句来获得宽慰吗？还有，有人说，不用悲伤，这是“喜丧”——高寿，又没有痛苦。

没有痛苦？妈妈，还是我？



七

天宇浩淼，夜风冷寂。

我在距长江万里之遥的内华达旷野遥望夜空。

生前不能相聚，离世不能送行，“代价”，像夜黑，压碎重负的心。

妈妈的魂灵飘向了哪儿？

在4月14日夜祷时，我泪流满面：“主啊，她是去了您那儿吗？恳请您接纳她，因为她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明天，是你的生日了，妈妈，先你而去的爸爸会在另一个世界迎候你吧？

他会在低回的圣歌里，为与他风雨同舟的发妻点燃烛光！

而我，也将前来，在我所采写的那许多冤魂们在天之灵的夜歌里，抹去你脸上思念的泪珠……

2022年5月29日

泛着柔和蓝光的原野

觉得有些迷迷糊糊、朦朦胧胧，但很清晰的是，我要回家，奶奶正等着我。一想到她，心里便觉得很温暖，纷纷乱乱的迷糊中，一种牵引，一种渴盼，飞越迢迢的朦胧山水。

我是骑自行车出发的，后架上，系上一个文件袋，里面是我的一些身份证件，左边扶手上，悬吊着一个装在塑料袋里的、去了皮的大菠萝。出大院门时，有一个保安模样的人盘问了我，问的什么想不起了，印象很深的是骑行的路上。

城市破败杂乱，一条肮脏的水沟，两边的建筑破烂不堪，街道上横七竖八躺着很多人，仿佛是一具具死尸，又好像还在喘息动弹。我提心吊胆，觉得难以穿越无处不在的横七竖八。但是，朦胧中，头顶上方，似乎有一种力量在指引我，让我一次次有惊无险地从横七竖八的窄缝中穿过。

不知不觉中就骑到了郊外，双腿蹬车十分轻松，感觉像有一种外力在助我。可不一会我就迷糊了，昏昏沉沉要睡去，双眼完全看不清道路。我挣扎着在一片混沌中摸索到路旁。

片刻间，没有了意识。

突然，我睁开了眼睛，眼前呈现出一片泛着柔和蓝光的原野。四周郁郁葱葱，天地宁静安祥，不见喧声人迹，只有微风拂面。心，顿时感到了久违的舒展与宁静。身心沉浸在柔和的蓝光中，涌出一种感动——一种美好的感动！

郁郁葱葱的中央，有一大丛苍翠的植物，似树非树，我凝望着它，从那里，仿佛透射出一种神迷而又神奇的召唤，我倏地觉得全身被圣灵充满，不禁举目向天喃喃自语：天父、耶稣基督……

我从梦中醒来，这是 2022 年 8 月 19 日清晨 7 点。

我好久没有这样美好的梦、这样美好的感觉了。这一年多，尤其是今年以来，焦虑、失眠、孤独、思念、渴盼、绝望、疾病等等，像幽灵一样缠绕着我，让我痛苦不堪。就连做梦，也是旷野中孤寂的游走、相思里无奈的眼泪，或者对抗时紧张的打斗……

这美好的梦是神给我的安慰和启示吗，在这些牙痛折腾不已、抑郁如影相随的日子里？

我会在神的引领下走出破败肮脏的街市、似死非死的横七竖八，来到那宁静安祥天地？

它在哪儿呢？奶奶早已去了另一个世界，她现在的家是在那柔和蓝光的原野？

2022 年 8 月 19 日

二，在大陆时写下的部分文字

我终于被扫地出门

我匆匆写下这篇小文，是担心哪一天（明天？后天？）突然连写这种小文的自由都没有了。



被开除前几天同事李光老师给我拍的玉照

黄昏时分，突然接到一个辅导员的电话，说我被学校解聘了，让我明天去办手续。我的合同尚未到期（还有两年），也就是说，我被开除了。

校方的时间选得很妙：学生刚刚放假离校，我则刚刚改完最后一门课的考卷并登上成绩。

几乎“分秒不差”——既不会影响工作，也不会引起学生议论。这种闪电式的精准设计显示出一种独到的管理水平。

其实，我不应对学校有丝毫怨言，相反，我应当感谢学校——直到现在才开除我。他们忍受了多久！

我知道，按照现行的标准，我远不是一个合格的教师。首先，上面一再要求教师的言行要“符合标准”，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一定要把握好（尤其是在课堂上）。领导专门开会强调过：意识形态出了问题，一票否决！

可惜，我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一直没有把握好，课堂上往往讲着讲着就偏离了“正确路线”。所以，“一票否决”落到我头上，一点不冤枉。

其次，我又老是给学校带来负面影响。比如，前几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川东土改，给学校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后果。（那次，学校找我谈话时，我就很内疚地表示：“如果……我就马上走人。”但学校却大度地包容了我。）又如，上月初（6月2号），校领导已经给我打了招呼：“不要惹事。”我也表态要老老实实做人。不料，一遇到有人打上门来，我又没忍住，加入了因小说《软埋》而引起的论战。这一下又惹得鸡飞狗跳，一大群爱党爱国人士不仅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而且又连带影响了我任教的学校。

我要是校方，为了保障意识形态不出问题 and 经济效益不受影响，也要开除像我这样的害群之马。

记得前些日子那些骂我的爱党爱国人士曾怒气冲冲地说：大学里居然容忍这样的教授存在！

现在，他们可以消气了。我早就知道他们一定会赢。

离别前，有什么感想呢？记得当年北京大学焦国标副教授（他也在文学和新闻学院）因写了《讨伐中宣部》一文被校方解职。好些天，焦教授心情苦闷，郁郁地围着北大未名湖游走。

我们学校没有湖，只有一个荷花池，但我不想围着它游走，因为我这辈子曾经历七次下岗，一颗破碎的心已经体会不到苦闷了。



学校的荷花池，对面就是我上了七年课的第三教学楼

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下岗了！

从23岁登上大学讲台到今天（2017年7月3日），我前后总共在讲台上站了22个春秋，是我这辈子干得最长的职业。

22年，有多少爱恨情愁！

三年前，预感到随时会被赶下讲台的我觉得应当留下点痕迹（也算是纪念），因此，

我一口气写下了十多万字的“心路历程”——《爱恨交织——一个高校教师的手记》。也许，有一天，人们会读到这些文字。

唯一让我感到不舍的是我教过的那些学生，尤其是汉语国际教育15级的学生（本期我教了他们三门课）。难忘他们上课时那全神贯注的面孔、那充满了求知欲望的眼神和师生台上台下的美妙呼应。期末时他们急切地问我下期是否还教他们，他们表示（包括传来的文字），盼望我能继续给他们上课。本来，学院下期已经给他们排了我的两门课——《西方文化概论》和《西方现代派文学》。但现在，永远不可能了。



她曾是我教过的文新学院的学生，今年六月川大研究生毕业后专程来看我

前几天，在给大三学生（14级）的最后一节课（当时不知道那也是我教师生涯的最后一节课）时，我向他们道别的语言是拜伦的一首诗：

爱我的，我致以叹惜，
恨我的，我抱以微笑，
任凭天空乌云翻滚，
我准备接受任何风暴。

这是拜伦告别故土时的最后一首诗。后来，他长眠在希腊的崇山峻岭中。

2017年7月3日夜

到越南“练摊”

被学校开除后，朋友说，你去找有关部门好好认个错，否则，没有任何学校敢聘用你。

我不知道该认什么错，虽然没错（没罪）也要认错（认罪）是我们的悠久传统和惯例，但我决定还是放弃这一条阳光大道。

那么，走哪条路呢？不挣钱呆在家里过休闲生活好像还早了点，况且我精力还充沛，况且有人还说我看上去只有四十多岁。

一位朋友给我指了条路，到越南去看看，那儿一千人民币值三百多万越南盾，转眼我就会有百万富翁的感觉。

正走投无路的我病急乱投医，于是匆匆来到越南西贡（现在叫胡志明市）。

考查了几天后，初步感觉是来对了地方。首先，街上到处都是我从小就熟习的标着镰刀斧头的红旗，还有那鲜艳的五星红旗（虽然只有一个星），这样，虽身在异国他乡，但有一种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还有，流经胡志明市的湄公河，是发源于我们伟大的祖国，于是，我日日夜夜喝着的是来自祖国故土的滋润。（这两点对于从小饱受爱党爱国教育的我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越南紧邻中国，要往返破费不大，家中尚有老母，一声招唤可以随时回去。至于语言问题我发现不是一个大问题，胡志明市的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会说点英语，我碰巧在大学教过几年英语，虽然忘得差不多了，但做点小买卖、问个路、住个旅店、回答个“YES”或“NO”还是没问题的。

接下来就得考虑做点什么，否则坐吃山空，况且我还没有“山”。（在学校干了七年，出门时，学校出于人道主义，补发了一个月的工资。）

我先打听了一下门面，租个门面坐在里面当老板比较上档次，可惜，那个租金让我望而却步。于是，不得不转向街头。

首先在街头同一个挑椰子卖的小贩沟通（先高价买了他两个椰子），询问进货渠道、日销售量，毛利润、净利润等等。对了，我还把他的挑子上肩走了一段路。我惊喜地发现，没问题，可以走十几里路不换肩！



接下来连续几晚上考查一个街头卖小吃的游摊。在买了她一份热辣辣的小吃再同她热辣辣沟通后，她同意我在她的小摊上练一下摊。



于是我坐在她的摊上找一下感觉。

人来人往，华灯如织……

倏地有些迷糊，仿佛梦回唐朝，恍然看到一个多月前还站在大学讲台上的我……

那天，一位马上就要离校的学生最后一次来傍听我的课，给我留下了这张“最后的风景”

一声听不懂的越语把我拉回到人间。

我释然一笑：官场上的官员都能“能上能下”，大学里的教授为什么不可以“能上能下”？从灯光明亮的讲台到华灯如织的街头，面对人生的如此转换关键是心态——且从功利得失的天平座上挣脱，看到沧海桑田的精彩舞台。

况且，如此转换也有家传——当年（1957年）父亲不就是一跟斗从官椅上栽下来，在长江边上的一个破烂菜摊上卖了十七年的菜？如今我一跟斗从讲台上栽下来，街头摆摊也算是子传父业。

对了，也许有人会问：要练摊、摆摊为什么不在我们伟大的祖国，而要跑到异国他乡？

说来有点不好意思，我毕竟上了点年龄，手脚不是很麻利，如果生龙活虎的城管来了，我收摊不及肯定会损失很大，跑得不快可能会挨一顿拳脚。

而在西贡，我发现，没有城管，小摊小贩占道经营，从没鸡飞狗跳！



告别教师和教师节

第 32 个教师节马上就要过去了，我整天都在挣扎：写不写点什么。

写吗，昨天、前天的文章都只存活了十几个小时，尤其是昨天的文章，我既没惹事生非，又谦卑地殷情陪笑，可是，仍然夭折，寿命甚至比前天的还要短。想起以前读过的诗句：“漏船载酒泛中流”，“未敢翻身已碰头”。还有，现在自己已经不是教师了，再写是不是有些自作多情？

可是，不写吗，它又伴随了我几十年，每年，我都心花怒放地享受着青春学子们一声声让人返老还童的问候和祝福。还有，我曾经当选过第一个教师节时（1985 年）全校十大优秀教师之一，记得学生们兴高采烈地说：“哇，教我们的是一个全校的优秀教师！”那曾经是我这辈子所享受过的最大荣誉。（可惜后来我江河日下，再也没有达到那种荣耀的高峰。）因此，作为我人生一个少有的闪光点，教师节理应值得我永久的纪念。

正在写与不写之间彷徨犹豫时，突然在微信上看到一张如董存瑞高举炸药包的图片，上面配的文字刹那间让我血涌泪奔——正如当年我在电影院看到董存瑞振臂高呼：“为了新中国——”

是什么文字呢？

“衡量一名教师是否称职的两条基本标准是：一，有没有发现和找出教科书背后真相的意识和能力；二，有没有把这种真相告诉给学生的智慧和行动。”



第一个教师节，我当选优秀教师

我的天，我这些年来就是按照这个标准在做一名“称职的教师”呀！
结果呢？

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我彻底告别了教师和教师节！

2017 年 9 月 10 日晚 11 时

怀念您，张学远教授



右一为张学远教授、左一为谭松（1978年）

获悉张学远教授去世的消息时，我远在外地，一算时间，追悼会都开过一周了，我顿时被巨大的悲哀所笼罩，我伫立窗前，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久久一动不动。

在他众多的学生中，也许我是最渴望赶去最后见他一面，也是最渴望在他追悼会上为其亡灵说几句话的人。

我一生中，遇到和结识过不少教授、专家、学者、作家，然而，真正让我带着宗教般的崇敬，抬起眼虔诚凝视的，只有极少几位。张学远教授是其中之一。

那一年，我在达县师专英语系读书。一天，上课铃响后，一位年近60的“老农”走上讲台。他身着大巴山农民走亲戚时穿的新蓝布衫，脚蹬一双农村妇女纳的土布鞋，握着教材的双手粗糙而苍老，瘦削的脸上布满皱纹。一眼望去，活脱脱一副大巴山老农进了城的形象。不过，细细打量，发现那老光眼镜后闪闪发亮的双眸，射出的绝对是睿智之光！你一旦与那双眼睛对视，便会感到，此翁绝非大巴山里寻常老农。

他略显局促地给我们上了课，然后默然退出了教室。随后，有关领导给我们打招呼：因为英语教师奇缺，临时找这位还戴着“右派”与“特嫌”（特务嫌疑）帽子的人来代课，大家不要同他谈英语学习之外的问题。

我很快了解了他的身世。张教授1949年前留学美国，曾获经济学硕士和新闻学硕士。“新中国”成立时他不顾一切返回祖国，先任上海复旦大学副教授，后任辽宁省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共产党1957年发动“反右”运动，张教授被打成“右派”兼“特嫌”（因为从“美帝国主义”那儿回来）。张教授全家因此被下放到大巴山农村劳动改造。在那儿，张教授从事养猪和务农整整二十年。他的妻子——一位大学研究生，因此精神失常，他的女儿，从此被剥夺了上初中的权利……

我被一种激情所推动，不顾一切地去找他。

他栖身在一间土平房，全部行李是放在一个土布袋里的一副碗筷和几件衣服。当他掏出碗筷去打饭时，我依稀联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

我向他表示我的关心和问候，他默不做声地看着我，眼含戒备。我径自滔滔不绝地大谈“英语学习之外”的东西，从我的家世谈到他的不幸。也许是我年青真挚的面孔里

毫无“阶级斗争”的阴险，也许是我“右派”父亲与他同属“一个战壕的战友”，谈到深处，情至心底，我突然看见那镜片后有泪光晶晶闪烁，接着，一串泪水夺眶而出。

那一瞬间，两颗心碰撞在一起，从此我与张教授的情感超越了师生，也跨越了年龄的差异。

随着交往的增多和交谈的深入，我惊叹地发现，那皱纹密布的额头后面，是一座巨大的知识宝藏——政治、经济、文学、历史、英文，层层叠叠蕴含无穷！我常常一边痴痴地倾听那闪耀着智慧和思想之光的声音，一边扼腕长叹——在大巴山贫瘠的黄土之中，竟埋藏着如此光彩夺目的明珠！

当然，这只是我“自作多情”的认为。当时，在大大小小的官员和昏昏庸庸的众生眼中，张学远教授远不如一个巴山老农。因为他是一个“右派”、一个“坏人”、一个“阶级异己份子”。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农村几十年的遭遇，远比一个文盲、半文盲的贫穷山民更为凄苦。

我不想赘述那太多的真实而惨烈的故事，因为这类故事在“共和国”的土地上发生得太多。我赞叹的是张学远教授居然支撑过来了。那被工作队一恶棍打得头昏了半年的大脑也还没有报废，使其能在英语教师奇缺时给国家作点贡献。

然而，那充盈着智慧之光的双眸总使我痛苦不堪！

是我们“共和国”太缺乏喂猪的农民了，以至要将一位经济学专家送去喂二十年猪，还是我们大大小小的权贵(哦，不，应当叫“公仆”)太容不得“主人”具有一点主人的意识与思想，非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当时，达县地区拥有十余个县，数百万民众，大大小小的书记、局长、处长、主任等不计其数，但该地区却只有一个教授，一个获有两个硕士学位，在经济上颇有研究和造诣的专家学者。

贫穷愚昧盛行这么多年，原因何在？

将一个思想独立、才学超群的教授打翻在地，发配养猪二十年，是不是其中一个“很小、很小”的原因？

一年后，我去川外读书，张教授送我去车站。刚下了雨，土路上泥泞不堪，张教授的土布鞋被泥水浸湿，一步步咯吱咯吱作响。他不时弯下身子，去提起被泥粘掉的布鞋。我蓦地一阵心酸——一个在政治上被剥夺了权利，经济上贫困如此的学者，他还能保持多少人的尊严？当如张学远这样的知识分子被那愚昧而凶残的“专政者”一巴掌打在脸上，一闷棍敲在头上时，他受伤的只是肉体，流淌的只是鲜血？

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又受了什么伤？

老舍“自绝于人民”前，独自在太平湖边整整坐了一天。多年来，我一直想知道，那一天中他想了些什么？他若将他投湖前的思想和痛苦写下来，会不会让我们在读了屈原的《离骚》之后又读到一篇千古流传的文字？

到川外后的大半年里，那“咯吱咯吱”的声音一直在我耳际回响。但二十出头的我，无法去想透那造成“咯吱咯吱”的社会难题，我仅将自己的一点节余，给张教授买了一双解放牌胶鞋，并渴望他能早日获得“解放”。

从川外毕业回到达师专时，张教授的“右派”冤案终于平反，“特嫌”问题虽然又拖一年，但终于证明是子虚乌有。学校也正式将他从农村调入了外语系。

花甲之年的张教授青春焕发，每天挑灯伏案，教书、写作、翻译，急不可待地想将失去的光阴补回来，也热切地渴望将多年所学奉献于世。不久，一部几十万字的经济管理理论著作被他翻译出来，并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紧接着。他又译了好几部著作并撰写了大量论文和文章。不过，此时我感受最深的，还不是他渊博的学识，而是他伟岸的人品和崇高的人格。

我未能参加他的追悼会，不知悼词上如何致词。如果未有“正直”、“无私”、“高尚”的赞颂，那定是不公；若有，则我坚信那绝非一般悼词中的溢美之词。

我在高校里呆了多年，同无数知识分子打过交道，发现眼下能在学品与人品上两全的知识分子寥若晨星。而张教授，则是让我“带着宗教般的崇敬，抬眼虔诚凝视”的学者。相处多年，我从未见他在权势面前低头奉迎，更没有为自己的私利上下奔走。他本是学经济的，但他似乎并不懂得“互惠互利”的功利原则。在他剩下不多的有效工作时间内，他不求回报地为别人作了多少“嫁衣裳”。譬如，为了扶持新人，培养新秀，他可以将自己辛苦积累的资料、多年的学习笔记、甚至研究成果奉献出来，任他人去撰写发表。在知识分子中，能做到这一点的，恕我孤陋寡闻，我仅见张教授一人。

在张教授无私的帮助和鼓励下，达县师专出现了全川最年青的英语副教授，涌出了一大批考上不同重点院校的研究生。

晚年的张教授还渴望再出几部著作，多培养一些人，可惜，他的健康状况屡屡将他击倒在病榻。张教授最美好的年华，最健壮的身体，已在大巴山的养猪业中耗磨尽了。此刻，纵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也只能长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

我调离达师专时去向他告辞，他送我到门外，晶亮的镜片后面，倏地又见泪光闪烁！那一刻，我体验到一种浸透心灵的情感——仿佛大巴山中苍老慈父，在秋风中黯然挥手，不舍他的儿子负囊远行。

最后一次见面是1995年9月在重庆大学文军教授处(文军也是张教授在达师专一手培养起来的学生)。张教授正要乘车回达县，我赶去匆匆见了一面。我因来不及给他买东西，便在车启动握手道别时，塞给他一些钱。他十分不安地望了我一眼，车便开了。

没料到那一次握别竟成了永诀，那不安的一眼成了最后的凝望。

我为未能在他临终前见他一面而感伤万分；为未能在他那饱受屈辱和创伤的心脏停止跳动前给予一点真情的抚慰而懊悔不已。我匆忙发去一封唁电，又寄上一笔钱。后来，他大女儿来信说，这笔钱将用来为父亲修一个坟墓，墓址就在他喂了二十年猪的地方。

想到我终于为亡灵做了一点事，心里得到一点宽慰。不料，那“坟墓”一词转眼又将我拖入绝望的深渊。

张教授永远不会再目光烁烁地在我面前娓娓讲述了——悲凉的坟墓掩埋了一切！

虽然人一生下来，便要一步步走向坟墓，但为什么一个民族的精英走得这样屈辱，这样悲凉？！古往今来，有多少悲凉学人的坟墓，透射出历史和社会的悲凉？从嵇康到李贽，从关汉卿到老舍……

在张教授去世后，每一个了解其身世的人都唏嘘他的不幸。唏嘘之后便是遗忘，挣钱的继续拼命挣钱，追求功名官位的继续上下求索。干嘛要把悲哀沉甸甸地挂在心头，让活人受累？

然而，历史的悲剧如嗜血的猛兽蛰伏在各个角落，随时准备扑向善于遗忘的大众和酷爱“乐感文化”的民族。在张学远教授悲凉的坟墓之后，还会出现李学远、王学远、赵学远教授的悲凉。因为产生这种悲凉的土壤远未消除，现在它仍然被人牢牢地坚持着，不准触动。哪一天，又一个“英明领袖”步入龙庭，一阵神圣的咒语，扇起歇斯底里的疯狂，刀光闪闪，红旗猎猎，千万个民族精英又变作“牛鬼蛇神”，被打入“猪场”、“牛棚”和屠场。

否则，为什么不允许建立“文革”博物馆、“反右”纪念堂？为什么新一代对刚刚过去的一幕幕惨烈悲剧浑然不知？

面对那一座座悲凉的，还将继续叠垒的冤屈坟墓，我感到个体的无力和深深的绝望……

渺小如我，能做点什么呢？我知道我将远赴大巴山，伫立在张教授的墓前，默默捧一掬黄土，洒一杯老酒，沉寂中灵魂借呼啸的山风与我的师长对话……

香烟袅袅升起，经幡徐徐招魂，他那饱蕴着智慧的大脑已化作青烟升腾，不复存在；他那伟岸的人格在天地间行走，与山川永存。

——怀念您，张学远教授！

曾关在劳教所的一男一女

马上就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了，在这纪念亡灵的节日，总是想起那些我所调查的，死于暴政的冤魂。有的知道名字，大量的不知姓名，但他们实实在在曾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也的确确消亡在专制暴政的铁蹄下。下面一男一女，都被万恶的劳教制度吞噬了青春。一个有名有姓有照片，另一个没有记下姓名，也没有照片。我写下关于他们的故事，是为不能忘却的纪念。

一，“请把我再关进劳教所”

1979年，全国开始平反冤假错案，为此，政府的一些部门成立了相关的办公室，专门负责接待上门申诉的人。我母亲是重庆市南岸区统战部的一名干部，她被调去做接待工作。这个工作让她了解了大量的人间悲剧，很多个案触目惊心。母亲厚厚的笔记本上记满了一个个冤屈，一笔笔血泪。例如，右派丈夫去劳改后，没有工作的妻子靠卖血哺育幼子和老人，最后倒毙街头；例如，一个曾英气才华的校长，二十余年劳改后，走进办公室时已近痴呆，一声响动就浑身发抖……每到周末我从学校回到家，母亲都要给我讲本周又有什么让人感叹和悲伤的故事。可惜，那时我年轻，没有收集资料、采访当事人的意识，只把那一个个真实的血泪史，当作了悲伤的故事听。几十年后，当我问起母亲，那个笔记本早已不知去向。下面，就是当年母亲讲给我的一个真实故事，多年过去了，虽然早已记不得她的名字，但故事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

一天，一位看上去已经五十多岁的女人走进接待室，她满面菜色，瘦弱不堪。尚未登记姓名、年龄等，她就对我母亲说，听说现在正平反冤假错案，她因此来问一下，能不能重新把她送进劳教所。

母亲很惊讶，忙问她是怎么一回事。女人讲了她的经历。

大约是在1953年，她在南岸区一所小学教书，二十来岁的她年轻漂亮，被一个年轻男子看上了。两人相处后，相互爱慕，很快陷入热恋之中。热恋一段时间后，接下来自然就是谈婚论嫁了。那时男女结婚，要单位领导批准，男方的单位是公安部门，这个部门不仅对本单位人员要严加审查，对其配偶、恋爱对象也要严加审查。这一查，查出女方（称她为女教师）出身于富农家庭。富农，是中共打击的对象。因此，他们要结合，可能比平民女子嫁皇室贵族还难。这样，他们相恋的结局可想而知。如果女教师认命，心平气静地重新过自己的日子，也许是另一种命运。可惜，失恋后的她失魂落魄，更不幸的是，她把这种失魂落魄带到了课堂上——讲着讲着就不由自主地一阵发呆。没多久，学校通知她，给她换一所学校。她想也好，离那曾经的恋人远一点，也避免天天目睹他们热恋的地方。

她按学校给她的地址，背着行李到了重庆市市中区（现在叫渝中区）的一个地方报道。进门时，她觉得很奇怪，这儿怎么戒备森严？接下来的一幕让她目瞪口呆，一位干警向她宣布：她作为“坏分子”被收监关押！

原来，她来报道的这个“学校”是看守所。

从此，女教师“人间蒸发”，在高墙内一年又一年劳动改造，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大约十年后，1963年，突然有人来找她，这个时候，她已经转到了一所劳教所。来的这个人是她唯一的亲人，十年前才十来岁的弟弟。十年后，已经长大成人的弟弟到处找她，最后找到了这个劳教所（他寻找的过程不清楚）。劳教所一直以为女教师无家无亲人，现在有人找来，那就放她走吧。（当年的这种抓抓放放比小孩上学放学还随意，现代人、西方人可能很难读懂。）

于是女教师结束了十年劳动改造，同弟弟回到了农村。

最初一年，她同弟弟住在一起，她不会农活，体力也差，挣的工分不够吃，全靠弟弟帮她。可惜，第二年弟弟娶了一个媳妇，偏偏这个女人又十分嫌弃她，认为她拖累家庭。弟弟作为富农子女，娶个媳妇不容易，因此他非常珍惜这个“下嫁”给他的女人。

女教师只好出走。她没有房子，也没有钱，只得独自一人住在一个烂草棚里。

女教师的另一种苦难开始了，那些年，在挣工分吃饭的人民公社里，就是一个全劳力，要吃饱饭都很费力，况且是她呢。

另外，作为一个富农子女，又是劳改释放犯，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她所受到的歧视和迫害可想而知。

她身体越来越差，在饥寒交迫中挣扎……

在濒临绝望甚至死亡的边缘时，她偶然听说了国家在搞“落实政策”的工作。这让她看到了一线希望——她觉得劳教所的房子至少还遮风避雨，更主要的是，吃得比她现在饱。因此，她从农村赶来，看党现的政策是否能关照她，把她重新送进劳教所。

这位女人后来的结局怎样我不得而知。母亲给我讲时还没有结局，而且她只负责接待登记，不参与处理。更主要的是，当时主要是改正右派的问题，像她这样的情况不在“处理”范围，因此，我想她不会实现她的愿望。

此时，我也不知她是否还在人世（健在的可能性极小），但是，我一直没忘记她，她深深印在我脑海里。

二，“偷”一支钢笔，“判”十八年劳教

——记右派子弟、小劳教犯张正宏

2013年11月8日，“大堡小劳教”幸存者之一张正宏先生因病在重庆去世，终年67岁。

当年在四川峨边沙坪劳改营的小劳教们纷纷前来为他们敬爱的难友送行，这群当年最小只有九岁的劳教人员，眼含热泪，秉烛燃香，一个个依次在灵柩前深深鞠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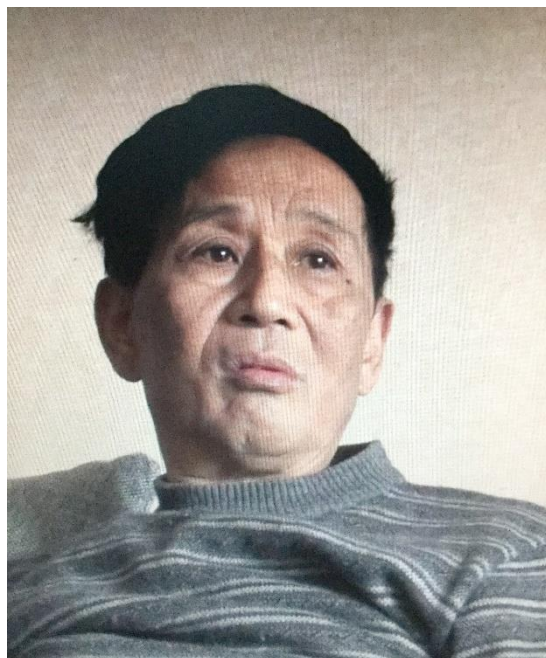
躺在灵柩中的张正宏，是当年数千小劳教犯之一，也是那场劫难之后数百幸存者之一。

张正宏 1946 年 6 月 23 日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张愈当年曾是南京大学的高材生。1957 年，张愈在四川温江地区一所中学教书时被打成右派，并被押送劳改队劳改。1962 年，张愈饿死在劳改队，当时没人通知他的家属。

但是，灾难，却一丝不苟地殃及到他的家属。

1958 年，12 岁的张正宏正在读小学。一天，班上一位同学钢笔不见了，老师认定是张正宏偷了。张正宏不承认，老师张口骂道：“你一个右派狗崽子，不是你偷的是谁？！”张正宏一气之下同老师顶撞起来。

这种顶撞要付出什么代价，当年 12 岁的张正宏是读不懂的。（现在和将来的人类文明可能也很难读懂。）



张正宏，2013 年 4 月

他在接受谭松采访后 6 个半月去世

12 岁的少年儿童张正宏因此被学校送到公安派出所，关押了几天后，派出所说：“我们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

这个“吃饭的地方”是千里之外的川西小凉山，在那山高林密蛮荒之地，当局建有大大小小的劳改和劳教营。

没有人告知他的母亲（后母）张正宏到哪去了。一个右派分子的妻子，已经是最底层的贱民，她若呼喊，不仅没人理睬，而且还可能惹火烧身。于是，一个鲜活的、“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少年儿童，就这样从社会主义学校里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张正宏被解押上路，12 岁的他，完全不知道前面的岁月是什么，有多长。

“我到过不少劳改、劳教营地。”张正宏生前告诉我。“记得最大的是川西普格县的莽窝监狱农场，对外叫 72 号信箱。那里面关押了至少十万人，主要是解放大西南时抓的国民党兵等历史反革命。我在那儿给管教干部当小佣人，给他们背娃儿、拿信、拿报纸等等。”

后来，张正宏来到川西小凉山深处的一个右派劳改营，加入了一个由五千余名十余岁孩童组成的劳教大军。

峨边彝族自治县位于四川省西部小凉山地带，那儿海拔近 2000 米，地广人稀。当年当局在这儿精心选了一个“口袋形”的“宝地”作为关押右派分子的劳改营。劳改营前是滔滔大渡河，后是莽莽原始森林，成千上万的右派们被解押到此地，开始他们漫长而血腥的劳改之旅。

在这个被叫作“沙坪农场”的劳改营地里，有一个作业区叫大堡，如张正宏这样的少年劳教犯们被集中在这儿“脱胎换骨”。

少年劳教，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发明创造。一如引进苏联劳改制度一样，中共当局也引进了少年劳教。到 1958 年，全国建了多少少年劳教营地我不得而知，大堡当年关押了多少少年劳教犯眼下也没有确切数字。林宪君先生是四川省团校的右派，当年他被派到大堡担任了一个管理少年劳教的大组长，据他估算，当年那儿有五千多名十余岁的小

劳教。

这些哭叫着“妈妈，我要回家！”的少年儿童，在这荒寒之地，一头撞上了“新中国”的三年大饥荒！

死神，毫不手软地把这些十余岁的少年，一个接一个、一批接一批地解押上路，终止了他们“要回家”、“要吃饭”的童声呼喊。

“死得多！一批接一批的死！几个山头都埋满了小劳教。”张正宏去世前几个月接受我采访时说。

林宪君告诉我，从1959年下半年他就开始埋饿死的孩子，到1960年，小劳教们大批死亡，天天死，天天埋，一直埋到1961年底，他亲手就埋了100多个孩子。他还记得有一个叫萧复新的孩子，饿得奄奄一息，管教干部叫他把萧背到十几里外的医务室去。在路上，孩子告诉他，他三岁就没有了父亲，母亲靠捡垃圾养他。他因为饥饿偷了农民的几块红苕，就被送来劳教。他说，他这辈子唯一的愿望就是再见妈妈一眼……这几句话，是这个孩子在世上最后的声音，不一会，他就在林宪君的背上永远闭上了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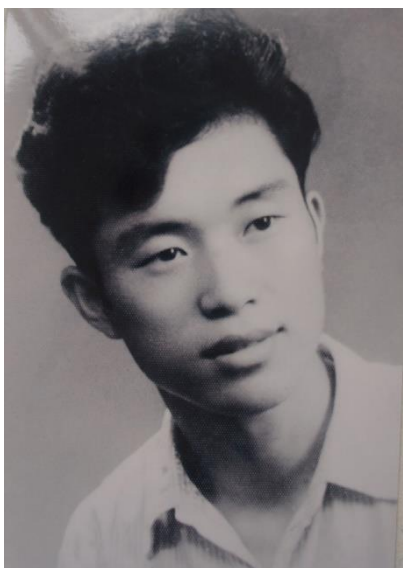
2013年12月，林宪君接受谭松采访

同那些大批饿死的小劳教相比，张正宏是幸运的。这种幸运来自他聪明伶俐的头脑，眉清目秀的相貌和热心助人的侠义。在劳教地，张正宏手脚勤，嘴巴甜，他帮人买东西，为人送书（口）信……博得了上上下下的喜爱，他被送到四川德阳少管所读书两年，幸运地躲过了大批死人的1960年，他也因此成为了1961年几百个幸存的小劳教之一。

（注：因沙坪劳改农场死人太多，场长被判刑。）

没饿死的张正宏后来一直在劳改农场干活，他心灵手巧，加上勤劳肯干，因此获得过不少劳改地的奖状，还被评为“学雷锋标兵”。

1976年，张正宏从劳改农场回到重庆，这一年，他30岁，距他被送去劳教，过了整整1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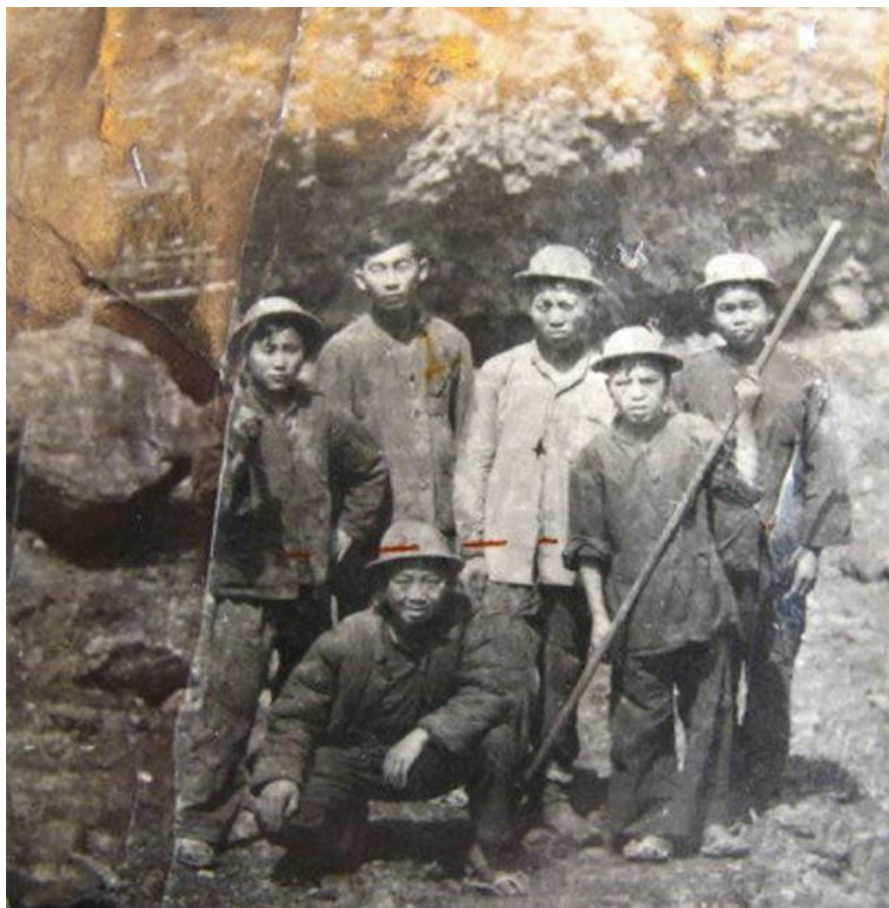
回到家乡后，由于当局对他们这批小劳教的歧视，他们都找不到工作，没有任何收入和社会福利，他们只得四处去下苦力。张正宏又是凭着他的心灵手巧和勤劳肯干，在几年后当了个体老板，成为他们那批难友中经济上的佼佼者。

晚年的张正宏不仅常常在经济上帮助当年的难友，为他们争取社保养老上下奔波，而且积极协助拍摄关于小劳教的记录片，为废除万恶的劳教制度尽了自己最后的贡献。

从 1958 年被押送劳教，到 1976 年被释放回渝，张正宏被“判”了十八年劳教，罪名是“偷”了一支钢笔。

年轻时的张正宏

记于张正宏去世后一个月



1962 年“小劳教”杨泽云（上图前排）被解救后，被安置在中川铁厂工作。（谢贻卉供图）

注：关于这几千小劳教犯的情况，可看谢贻卉制作的纪录片“大堡小劳教”。

2010年11月随笔

我写下这些杂乱的文字，祝我55岁“生日快乐”。

一

11月，对我是一个特殊的月份。那一年的11月，我来到这个世界。

据说，我诞生在一个千年不遇的盛世——黑暗的旧社会一去不复返，一轮崭新的太阳正冉冉升起，照耀着通往天堂之路。于是，父母给我取名“宗旭”。宗，是家族字辈，旭，是旭日东升。

我诞生那一年属农历的羊，11月底出生的羊，时辰不佳，一出生就面临冬风日紧粮草短缺。11月底出生的人又属西方的射手座，据说，射手座的人天性浪漫，尤其是，特别崇尚自由。

红太阳、11月的羊、崇尚自由的星座，预示着一个卑微灵肉怎样的人生和命运？

果然是出生时辰的错？我刚呀呀学语立足未稳时，一场暴风雪呼啸而至。家，顷刻破碎，父亲被刮到一个劳改农场为“言者无罪”赎罪。外婆和妹妹在英明领袖“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的担忧和笑谈中永远闭上了饥饿的眼睛。浮肿的母亲拖着骨瘦的我在地狱入口徘徊。年幼的我自然读不懂家破人亡的社会成因，多年后《墓碑》中的一句话才让我深刻理解了什么叫“千年不遇”。

“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二

11月又到了。那是1967年的11月。

墙上，残留着砸烂父亲狗头的墨汁，外面，飘扬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红幅。枪声，不时划破两岸灰蒙蒙的天空，父母，早已逃匿得无影无踪。

我在日以继夜的惊恐和不时尿床的羞愧中忘记了我的11月。

奶奶一大早就望着我，时而紧蹙双眉，而时低声长叹。

我不敢看她，怕她责骂——昨夜睡梦中我又尿床了。

奶奶生长在农村，有一双非常勤劳的手和一双断骨突兀的小脚。她没有文化，但一辈子吃苦耐劳的生涯培养了她面对苦难的超强坚韧。1958年儿子的劳改、1960年亲人的死亡，她都坚定地稳稳站立——用她那双中国传统女人的小脚。

一声惊雷，文革来了！太阳红辣，风暴狂烈，家，又一次残破。一向坚韧的奶奶眼中也出现了惊恐——几年前大饥荒的死亡气息从坟墓中飘出来，在残破的家中弥漫。

奶奶晾晒好被我尿湿的床被，没有责骂。我羞愧难当，像做错了事的小狗，蜷缩在墙角。

奶奶又盯着我看了一会，突然解开她的裤腰带。

我紧盯着她的手。

一个小小的灰布袋缝在裤腰带的下面。奶奶解开系在布袋上的红绳，从里面掏出一

个油纸包。她一层一层打开油纸，再剥去一层一层薄纸，露出了一张两毛的人民币。

“来，拿去。”

“干啥？”

“去买两根油条。”

“真的？！”我跳起来，又惊又喜。

“你一个人吃一根，另一根拿来下一碗面，让姐姐弟弟都沾点油。”

“我一个人吃一根，为啥？”

“你今天生日呀。”

我这才想起，那天是11月26日。

“记住，不准在外面吃，要拿回来中午大家一块吃。还有，两根油条一角二分，还剩八分，一定要还回来！月底还有几天，只剩下这八分钱了。”

中午，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摆在桌子当中，面中有切成几小段的油条，面汤里飘浮着几颗几个月都没见过的油星。

我独自嚼着又香又脆的油条，嗅着满屋的香气，享受着姐姐弟弟羡慕的目光，幸福得有些昏眩。昏眩中，耳边恍然响起老师们沉醉的描述：“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最幸福。”

“共产主义是天堂。”在喉咙被油条滋润得十分油滑的那一刻，我终于对此描述有了切身的实感。

更重要的是，那根油条和那飘浮着油星的面汤，让奶奶一个星期没有晾晒被我尿湿的被褥。

三

华莹山的11月底，寒风呼啸。已燃烧了九年半的文革烈火，焚尽了满山的苍翠与青绿。几株枯黄的衰草，在裸露的黄土黑石间瑟瑟发抖。四间歪歪倒倒的土屋，孤零零地兀立在荒寒的半山。

一条细长的小路，曲曲折折，死蛇般伸向那孤寒的小山村。

我沿着小路向上攀爬，走进一间八平方米的棚屋——我即将渡过20岁生日的地方。

弟弟迎上来，冻得青紫的脸上绽放出极其幸福和激动的笑容。“呀，接到信，我天天在盼！你先歇会，我马上烧点柴烤火。”

这不是一间屋，而是生产队当初为遮盖一个红苕窑而搭建的一个竹棚。棚屋四壁到屋顶之间，留有约两尺宽的空缺，冬风可以自由欢快地在棚屋里进进出出。墙是用竹条编成，弟弟进住前，生产队找了些旧报纸——《人民日报》（当时再穷每个队都必须订阅的党报）——把竹条墙贴了一层。可惜，几个缺乏娱乐的农村娃，为享受手指戳破报纸的噗噗声，把纸墙戳得千孔百疮。

光线，从四壁斑斑点点地透入，棚屋里一片光明。

“你下乡都半年了，怎么还没给你盖房？”

“生产队没钱。”

“每个知青不都拨得有盖房款？”

“队里太穷，把那笔钱拿去救急了。”

柴火在屋中央那块压盖苕窑的大石板上燃起，火焰欢快地扭动身躯，向人间传递着温暖与爱。

“哥，你生日，我一点肉都没弄到。”弟弟垂着眼，盯着火光。“我本想去偷只鸡，但这儿的农民太穷，不忍心下手。再说，鸡偷来也没法煮，香味一飘出去……”

当晚，一瓦罐香甜的红苕饭后，布满烟尘的蚊帐垂下，吱吱作响的木床上，手足之情的青春温暖，抵御了华莹山的浩荡寒风。

一位女郎，一位非常美丽的女郎，飘然而至。（多年后，当我在大学的殿堂里饱览古希腊文化艺术后，才读懂她属于丰腴而优雅的古希腊美女型。）

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一个意外的副产品，还是冥冥中神灵的巧安排？总之，那一天，1975年11月26日，她天使般降临到这荒寒山村的棚屋里。

她眼含秋水，默默而深情地送来令人迷醉和慌乱的青春热情。

“眼波流，半带羞，花样的娇艳柳样的柔，轻轻一笑忘我愁……”

歌声在夜色里恍然如迷幻的梦境，但布满烟尘的蚊帐悄然而闭却是不争的现实。

在冷寒、孤寂、贫瘠的广阔天地里，悠然浮现一座芳草茵茵的小岛，这是微小的天堂的后花园，还是引人堕落的伊甸园？

我不敢接受这太沉重的生日礼物，一个右派分子的儿子和一个资本家的女儿，阴阳碰撞之后会诞生怎样的“爱情的结晶”？

一阵猛烈的寒风，在竹墙撕裂的报纸上发出呜呜怪响，柴火挣扎的残光，照见壁纸上几个粗黑的大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她悄然而逝了，像风一样来，又像风一样去。

然而，那凄美的夜的歌声、那沾着泪痕的唇香、那彻夜低吟呜咽的山风、那黯然消失在荒寒天地间的背影，永远烙印在我心头。多年后，我写下四千多字的记实文字“怀念你，飘逝的山风”和中篇小说“飘逝的山风”，是为我永恒的怀念。

剩下弟弟孤身为我送行了。

凌晨五点弟弟就起床，为我煮了满满一挎包红苕。“你要走一整天的山路。”他忧心忡忡地说。

从弟弟落户的生产队到我下乡的生产队，要翻几匹大山，中途很多地方都没有人烟。本来也可以到山下的公路上乘汽车，可是那得到县城转车。当时车很少，到了县城没证明无法住宿，更重要的是，没有钱。

我们走出棚屋，整个山乡还在沉睡，弟弟带我向棚屋后的山上攀去。他一言不发，沉寂里只有攀爬的喘息声。

下乡才半年，弟弟性情已大变，以前那个活蹦乱跳喜欢唱歌的弟弟消失了。头天夜里他默默面对盆火，目光呆滞，十八岁的面孔里仿佛有八十岁的木讷。

“哥，再住几天吧。”他望着盆火说。

我沉默不语，我已经“再住了几天了”。

“夜里听得见山下远远传来汽车的喇叭声，每次听见喇叭声我就很难过，也不管汽车是不是往家乡方向开……”

我喉头蓦地有些哽咽，四周笼罩着坟场般的寂静。

爬上山峰，天，蒙蒙亮了。弟弟望着对面的大山，再一次叮嘱我要走的路线。

山顶上冬风刺骨，山谷里晨雾弥漫。

分手的时候到了。

“你回去吧。”说完我掉头匆匆而去，消失在晨雾中。

爬上对面的大山，天已大亮。我伫足回头望去。

远远地，一个孤零零的身影，背映着苍茫天空，雕像般伫立在我们分手的山头。

我想举起手臂，然而倏地泪水盈眶……

四

死寂，惊天动地的熔岩喷发之后天地间一片死寂。

枪声，早已停息；刀光，暂时消隐；血色，已经抹去；“稳定”威然到来。

“你赶快走，出去躲避一下！”在最紧张的时候，妈妈焦急万分地说。

市团校一位教师因讲台上的一句“悲愤”而锒铛入狱（他获刑两年）。相比之下，我“罪孽”更为深重。

但我没逃，而是低眉顺眼写了三份检讨。在腥风血雨的“秋后算账”中，我不仅奇迹般地免尝了铁窗风味，而且还保住了教师饭碗。（20年后我才得知，这主要归功于当时还身居要职的父亲的“以权谋私”。）

然而，“稳定”之后的萧杀，比刀光血色的暴烈更加摧折男儿血性。“我们竟然失败了！”多年后我听到一个逃亡作家锥心啼血的这句话时，20年后似乎愈合的伤口猛然一震，往日的悲愤和今日的渴求交织奔涌，泪水倏地夺眶而出。

死寂，笼罩着 960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天地间只剩下一个声音——“胜利者”强奸民主女神的高潮淫叫。

这叫声加重了死寂带来的绝望。

我在这绝望里走进了又一个 11 月——1989 年 11 月。

热血与呐喊、狂野与悲愤，全部挤压封藏在心底深处。那个在讲台上慷慨悲歌大义凛然的老师不见了，那个带领学生振臂高呼奔走街头的师长退缩了，他罩着一张顺民的皮囊，行尸走肉般进出于教室，木偶机器般地照本宣科。

11 月的一天，在教研室的一次学习会上，我无意中提到“自由”两个字，话音未落，竟引得满室惊恐，仿佛我提到了一个即将招来杀身之祸的妖魔鬼怪。惊恐的目光中，有不少是曾同我并肩街头的同事。

我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绝望，我被这绝望击倒了。

我觉得我病了，胸部挤压，隐隐作痛。身体开始消瘦，目光变得呆滞。

11 月 26 日按照它既定的步伐一成不变地到来。两个朋友前来相庆。一见面，他们大惊：“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脸泛青光，目光像狼！”

那一瞬间，我猛然惊觉，我必须拯救自己。倘若无法在沉默中爆发，又不甘心在沉默中灭亡，只有自己拯救自己。

我首先想到“投敌叛国”。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尼泊尔，只要能脱离这“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国就行；洗碗、扫地、种田、下苦力、当长工，只要能生存下去就行。其次我想到“浪迹天涯”。我曾给学生讲过一篇文章“Nothing to Sell and Nothing to Buy”，里面谈到 Beggar 那种无拘无束、独立不羁，虽有艰辛但更有自由的生存方式。我原本属射手座，渴慕自由是我超强的天性。因此，我把那篇课文讲得五彩缤纷：拜伦的诗句、吉普赛人的歌……讲完后，学生竟全体鼓掌。

我该如此这般拯救我自己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脑海里被“离家出走”几个字撑得满满的。出走，仿佛成了我摆脱窒息的出路，求得新生的希望。

我住在学校分配的一间平房，房间里摆放着一大一小两张床，大的由妻子带着女儿睡，小的归我。每天夜里，我脑子里翻江倒海，想象着出走后的雪雨风花，然而，当

目光落在大床上熟睡的妻女脸上时，一种肝肠寸断的忧伤又弥漫心头。我每月只有 97 元工资（当时大学的讲师工资），妻子收入同我一样，女儿才三岁，正上幼儿园。每月家里经济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我一出走，妻女怎么生活？

“To be or not be”？我焦躁万分，彻夜失眠，人进一步消瘦。（后来妻子告诉我，她夜半醒来，看到灯下我的脸色和眼光，她感到害怕。）

在又一个通宵失眠之后，我下定了决心。

女儿六点钟突然醒了（她通常不会这么早醒来），外面仍一片漆黑。她的第一句话是：“爸爸要走了。”

我正在想出走时带的衣服和留言条的内容，女儿的话如五雷轰顶，惊得我目瞪口呆！她怎么知道的呢？

“爸爸没走，爸爸在这儿呀。”妻子温存地说。

我呆呆地盯着女儿，刹那间，她的种种可爱排山倒海涌上心头：50 天时，她睁着晶晶闪闪的眼睛，第一次冲着我笑；换了保姆后她哭得惊天动地，但一到我怀中就破涕为笑；我出差分别时她在车站嘤嘤地哭……

我不是要拯救苍生的神灵般的王子悉达多，我“离家出走”的巨大汽球，是凡夫俗子的个人之计。女儿稚嫩的声音轻轻一碰，我日夜吹胀的汽球便轰然破裂。

多年来，我都无法解释那天凌晨是怎么回事，党文化的狼奶已经成功地培育了又一个无神论者。

我从未对女儿提到此事——直到 2008 年元月。

那天晚上，我从基督教家庭教会回到家，把已读大三的女儿叫到身边，告诉了她 19 年前的那一个早晨。

女儿听得泪光闪烁，我播放起远志明《神州》中的主题曲：“母亲啊，您不要再哭泣”。

1989 年那个生日之后，我拿起笔开始了文学写作——它成功地将我从绝望的深渊中拯救出来。

当然，我也没想到，十多年后，它又为我挣来一副冰冷的手铐，让我补偿了 1989 年错失了的铁窗风味。

五

2010 年的冬天到来得很早，11 月下旬已是寒气袭人。报上说，南方大部霜冻千里，重庆山头雨雪飞扬。

校外那家农贸市场正在宰杀活羊。屠夫一边点着钞票一边叫卖；看客一边还价一边观赏。

一只半大的黑羊四蹄被捆得结结实实，躺在同类的血泊里等待被宰杀。

突然，黑羊发出一声绵长的哀鸣，我悚然一惊，陡然想起我的属性——羊，11 月的羊。

我本能地想阻止那宰得欢快的屠刀，可眼前的一切天经地义：操刀的屠夫与无助的羔羊、贪婪的食客与待宰的生命构成了天经地义的法则。

我在心底发出一声绵长的哀鸣，走进校园。

重返校园已经两年半了，当初把“离家出走”改成了“逃离校园”，没料到，人生转了一个大圈后又回到原点。不过，这一圈，圈走了一个男人最饱满的 20 年年华。

我抖抖索索走上讲台，翻开那本散发着浓郁党文化气息的教材——《新闻采访与写作》。

“你在课堂上说话要小心。”亲友们反复叮嘱。“现在的学生和学校已不是当年。”其实，我早已目睹了“八九六四”之后的天翻地覆。

当年“官倒”的点点星火，早已熊熊燎原，烧遍了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当年权贵的巧取豪夺，早已变本加厉，赤裸裸强奸了大好河山的每一寸土地；当年民族尚存的气节良知，已经在刀光和金光的双重绞勒下气若游丝……

那么校园呢？那么我们这个历史悠久文化丰灿大国的教育呢？

重返校园，我看到这20年来我们民族最重的伤痛。

“你们学新闻的，要多上网关注国内国外新闻事件。”

“老师，我们上网太贵。学校不准我们包月上网，只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购买流量。因为这样能多赚钱。”

“这本教材里有很多不实之处……”

“老师，这本教材算好的……”

……

金钱的贪腐、谎言的暴烈，双管齐下，齐心协力“培养”着祖国的未来。

我望着班上那一个个青春的面孔，仿佛看见农贸市场上一只只待宰的羔羊。

钱财被掠夺，忍了，算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土地被强占，认了，算是“为了GDP超英赶美”。

可是，教育腐烂了、下一代被摧残了呢？我们还有什么希望，会有怎样的未来？

一天，我遇到一位贫困生，顺便问起他的助学金。他回答，钱倒是发下来了，但是辅导员没给他。“为啥？”我问。“辅导员用我的名字申请助学金，但把钱给了他的一位老乡学生。”他气愤地说。

有这种事！我大怒。“是哪个辅导员？我去找他！”

“老师，千万别去，他答应下次一定给我。”他慌忙阻拦。

我转身离去之后，他还追上来，惶惶不安地再一次叮嘱。

我仰天长叹：20年前喋血街头的学生们，你们沸腾的热血已是最后的风景？

我该怎么做呢？面对一个个交纳了高昂学费，耗费了宝贵青春的学子，面对一双双被妖雾迷障，渴望真相的眼睛，我如何做到“在课堂上说话要小心”？

新闻课堂，大异于英语讲台，真是一个横刀跃马的好战场。于是，从民国时报人的“四不主义”到新社会媒体的“党的喉舌”、从反右运动的阴毒阳谋到文化革命的暴烈血腥，从国民党抗战的历史真相到眼前社会的现实分析……我在讲台上滚滚滔滔，一泄千里。

暴政之所以威烈浩荡是因为我们一个个都成了“沉默的羔羊”。

不幸，在无数历史的旧账还沉甸甸地压在心头时，现实的新案又雨后春笋般地上演。“李刚案”、“害羞死”、“自焚女”、“被自杀”……

我突然感到很累了。面对无数巨大的、钢铁般的风车，我仿佛是在发起唐吉科德似的冲锋，也好像是在上演“最后的绝唱”。

我决定放弃了，在这个寒冷的11月下旬，在我生日的前夕。

新闻教研室主任李光教授答应下学期接替我的新闻课，我则渴望躲到“中国民俗文化”的象牙塔里去喘一口气。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逃避吗？就像22年前要离家出走？

虽然，我知道我绝不会成为沉默的羔羊。

六

11月的天空阴云密布，没有草的羊儿冷得发抖。

自由的焰火还会燃烧吗？拯救的希望在哪儿？

这块承载着众多生灵的大地被上帝遗弃了？它还要堕落到什么地步？

“黑暗从地底升起，遮蔽了明亮的天空。”在这个寒冷的11月，我品尝着比22年前更深的绝望。

友人送来一张光碟，上面，300多名神的仆人跪拜在太平洋岸边。他们面朝大洋，为彼岸遥远的故土，向苍天举起双臂。

寒风扑面，热泪涌流。

我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被怦然触动，目光，情不自禁从绝望的大地转向希望的苍穹。

冥冥中的天父，您帮我翻过了1989那沉重的一页，您会帮助这块苦难的土地和民族翻过这苦难的一页？

歌声响起来，风中回荡着悲切与热烈的渴盼。我分明听到，茫茫荒野里，流浪孤儿急切的呼喊。

“为着世界黑暗的角落我在这里，为那不曾被安慰的灵魂。”

一种难以言说的感伤和感动如太平洋万倾波涛，汹涌澎湃漫过我孤寒的心灵。

我陡然浑身颤抖，泪水倏地涌出来。

“我在这里，Ni-Ne-Ni……”

您听到这啼血的呼唤和祈祷吗？

突然，阴沉灰暗的海面上，在神州大地所在的方向，有阳光穿透乌云，一道神圣的光辉，在天地间奔涌……

2010年11月

清明节忆父亲

他曾向我谈到他当年为什么走上革命道路。他说，在他学生时代，摆在他面前有三条路：一、科学救国；二、追随国民党；三、跟共产党走。

他选择了最后一条路……

在守灵的最后夜里，我独自走到父亲的灵柩前，久久地注视着他宁静的沉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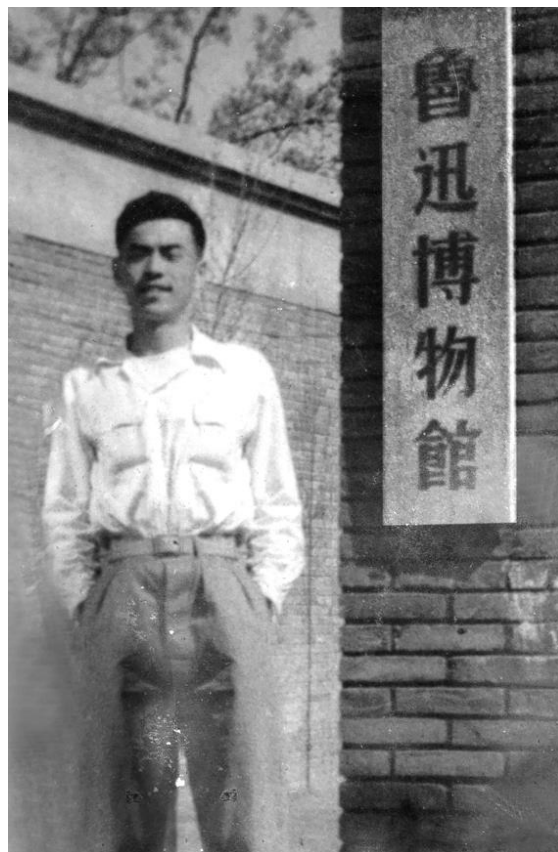
眼前是我太熟习的面容，也是我太熟习的沉睡——我真的觉得他是在沉睡，他还会醒来，就像他曾千百次地醒来，又扬着他长长的眉毛，目光烁烁地同我侃侃而谈。

他曾向我谈到他当年为什么走上革命道路。他说，在他学生时代，摆在他面前有三条路：一、科学救国；二、追随国民党；三、跟共产党走。他选择了最后一条路，这在当时是最艰辛最危险的一条路。为什么？很简单，为了民主和自由。他说，同那个时代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他非常爱国，一心渴盼祖国富强。他读到《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读到新华日报的文章，共产党呼喊的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正是他的追求。

他还向我谈到他在地下斗争和在长寿湖劳改时一次又一次的死里逃生。

我还记得他对我的一次厉声责骂。当他得知我离开学校到了一家公司时，非常不满。他说，为什么要放弃教书育人而下海去挣钱。接着他厉声说：“谭松，你要记住，我们谭家从来没有钻到钱眼里！”

我还记得他离休后分得了一套福利房，个人需交两万五千元。他把我找去，希望我们几个子女帮助他，因为他的全部存款只有几千元。



1957年5月，父亲在北京出席共青团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留影

在他的所有子女中，没一个借助他的臂膀升官、发财、出国（他的几个子女都在国内）。他没有给我们留下豪车宝马、万贯家财，但是，他传给了我们一种珍贵的财富，这就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品质。

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我给他买了一台电脑，从此，他每天上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网看国际国内新闻。我每次回家同他交谈的主要内容便是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衰……

我更记得在他离休后的晚年里，他多次同我谈到他年轻时的追求——渴望祖国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这也是他一生的渴望和追求。

越到后来，我越觉得我们不仅是父子，而且是朋友，甚至是战友。

昨晚，有位朋友匆匆赶来，在所献花圈上写下这么两句话：“一身正气浩气长在，平生坎坷求索不已”。这同我前天夜里写给父亲的挽联“长路坎坷守浩然正气，一生曲折怀磊落胸襟”刚好一致。我想，这绝不是对亡人的溢美之辞，而是对父亲一生的公正评价。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先后采访了四、五百人，其中包括我父亲。在我记录他的口述中，结尾是这么一句话：“我坚信中国一定要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我年轻时的追求一定会实现。只是我可能看不到了。”

在守灵的最后一夜里，我掀开复盖在灵柩上的绸布，将脸贴在玻璃上注视着他。我离他这么近，中间只有薄薄的玻璃相隔。我突然觉得，我仿佛能唤醒他，他也能听到我的呼唤。

但是，这抬手可及的距离却是永恒的阴阳相阻。

我似乎不能接受这命定的但却无情的现实，我无法想象眼前这个给予了我生命的躯体将在几个小时后化作袅袅青烟。

从此，有形的父亲将永远消失；

从此，我能看见的，只是长江南岸莲花山上一块冷冷的碑石。

用什么来化解我内心绵长的忧伤？

用什么来抚慰父亲天上渴盼的灵魂？

我愿有一天，我狂奔到父亲的墓前，举手向天，泣血顿首——

——“爸爸，您一生的渴望和追求终于实现了！”

五年前今日，父亲下葬

五年前的今天，南岸区莲花山公墓里一块墓地石板被打开，一个褐红色的骨灰盒安放墓中，那是我父亲；

五年后的今天，卫生间镜子前的一盏小灯被打开，一张睡意迷离无所事事的老脸出现在玻镜中，那是我。

六十年前（1957年），父亲正潇洒英气，雄赳赳，赴北京出席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四川代表会上，他气昂昂地说：这次会缺乏民主……

六十年后（2017年），我已英雄暮年，胆怯怯，在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左顾右盼，阴悄悄地说：历史需要还原它的真相……

六十年前，父亲为他的“气昂昂”一跟斗从官椅上栽下来，走上了22年“改造”之路；

六十年后，我为我的“阴悄悄”一跟斗从课堂上栽下来，告别了我22年的大学讲台。

六十年，人生有几个六十年？！

五年前邀老友马云龙（前大河报主编）来校演讲时，他的一句话给我深刻印象：生下来时是乾隆皇帝，六十年后还是乾隆皇帝，一个人六十年看不到一点变化是多么绝望！

……

突然觉得话又要说偏了（偏离“正确航线”）！那个中间是个白色惊叹号的鲜红太阳又会冷不丁地劈天而降，像《西游记》中的擎天巨神，一掌把我这种妖孽扫得片甲不留，白茫茫大地上只回荡着一个大义凛然兼真理在握的声音：由用户投诉并经平台……

于是，只得将五年前写的那篇文章重新贴出来，炒一碗冷饭，表达对亡灵热切的思念。

金桂香里，魂归故里

——在莲花山公墓前

重庆南岸区莲花山公墓。

天，有些阴沉，偶尔，洒落几滴稀疏细雨。正是金桂花开时节，墓地里，千株金桂齐放，秋风习习，芳香阵阵。

下午三点半，一块墓地的石板被打开，一个褐红色的骨灰盒安放墓中。

没有爆竹、没有乐音，只有三束鲜花、两枚徽章、一排红烛。

泥土徐徐洒落，香烟袅袅飘升……

亲友们逐一在墓前默哀、鞠躬。

逝者当年的校友和战友尹凌女士捧上几枚缝在一块绸布上的徽章，一枚是他们当年（1949年前）的南开校徽，一枚是他们当年（1949年前）参加革命时地下社的徽章。徽章被放置在骨灰盒上，伴亡灵永存。

逝者地下社的战友、生前知己，重庆大学教授罗信群女士在女儿的搀扶下，面对墓碑泣不成声，站立不稳。

墓碑前，她与尹凌女士敬献的丝绸挽联在秋风中微微飘动。

82岁的廖带方先生专程从巴南赶来，独自徒步爬上莲花山，在老友墓前深深鞠躬。

……

唯一的官方人士是南岸区统战部部长。他坚持前来的原因之一是逝者曾经为南岸区作出过“革命贡献”。

南岸，重庆市长江南岸，一块充填了亡灵主要人生岁月的土地。

激情、豪情、友情、爱情、亲情；

告密、批斗、惊恐、屈辱、悲愤。

1949年底，21岁的他受党的指派，怀着建立“新中国”的万丈豪情，踏上了这块土地。

参加工作队餐风宿露，创建团区委上下奔波……

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天空仿佛是那么明亮；一个青年的未来前景仿佛是那么宽广！

燃烧的革命激情，甜美的青春情爱……

然而，1957年，一场来自北京的六月寒雪、一封发自南岸区委的告密信件，点金为土，终结了虚幻的明朗天空和真实的青年梦想。

29岁的他，踏上了劳改之路，家虽未破，人却将亡（1960年和1962年）。南岸，成了他在流放之地一个爱恨交织兼朝思暮想的地方。

四年半后，他终于又回到故地。但是，迎候他的，早已不是燃烧着激情的天空，而是江边一个破烂的菜棚。

山城夏天毒辣的酷热、长江冬天刺骨的寒风，交替打磨坐在菜摊前的帅气“菜贩”。

三天两头的“认罪交待”、长年累月的“政治运动”，比夏天的酷热、冬季的寒风更加摧折男儿身心。

从家门伸延到大街的“打倒”标语、从湖岸到江边的亡命逃亡……

还有一——

大约是1970年，一个傍晚，卖菜归来的他偶然从一张《参考消息》上读到一条消息——台湾政府委派一位海军武官到美国接收一条军舰。他读到那位武官的名字——他当年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当年，那位同学参加了三青团，跟国民党走了；他，加入了地下社，跟共产党走了。

当天晚上，他喝下半斤烧酒，然后捧着叶子烟抽得昏天黑地。

从33岁（前四年29—33在长寿湖劳改）到50岁，一个男人最宝贵的年华，在南岸江边那个破烂菜棚里化作苍烟流泉。

他等到了他冤屈的“改正”，这是他有生之年的大幸；他没盼到他当年追求的实现，

这是他死不瞑目的大憾。

墓地的石板合上了，他从此长眠在这块他曾燃烧激情也曾饱受屈辱的土地。

这是一块让人魂牵梦萦的土地！

墓地山头的后面，便是那著名的黄山。抗战八年，陪都重庆，从领袖到民众，铁血壮志，浩气凌云！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足踏长江嘉陵，出生入死，慷慨悲歌……他长眠此地，也是一种安慰和幸运。

墓碑旁的桂花，秋风里暗暗吐出缕缕幽香。

碑石上的遗像，默默注视着脚下滚滚长江。

那目光，深沉而忧郁，仿佛含蕴着深切的期盼……



他从此长眠在这块他曾燃烧激情也曾饱受屈辱的土地

写于2012年9月20日

“一票否决”

这篇文章写于半年前（2017年3月），当时，还不想被“一票否决”，因此一直深藏闺房。可惜，四个多月后，还是没逃脱“一票否决”！

现在把它发出来，是为了对过去说声告别，并决定从今后起，好好过吃了睡、睡了吃、不思不想，并发出猪一样鼾声的下岗生活。

“……课堂上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各位老师要把握分寸……我们不能吃党的饭砸党的锅……”书记在会上传达上面指示时说。

“吃饭，砸锅”论早已听过和读过，但当面被耳提面命严重告诫还是第一次，而在座聆听教诲的大多都是教授，副教授和讲师。

告诫会开后我直奔嘉陵江，扑通一声投江而去，让三月冷冷的江水洗去身心的热燥。

刚从水里出来就接到一位老教授的电话，说想找到饭馆喝几杯。

心中正有些块垒，想借酒消解，于是我两在一家“串串香”里把酒对饮。

“学生要监控汇报教师。教师要监控汇报学生，这成什么了？！”该教授几口烧酒下肚，脸色大红粗气扑面。

告诫会后，我想到自己以往一贯没注意“什么话不该说”，有关记录上一向劣迹斑斑，因此打定主意这学期一定听党的话，乌龟缩头。

可惜，烧酒乱性，再加上对饮者煽风点火，我又开始心旌摇荡。我说，我重返讲台九年了，上了十余门不同的课，每月挣的都是自己的“站台、卖身(声)、吃粉(笔灰)”的血汗钱。这学期就上了五门不同的课，其中两门新课，为此，我常常备课到深夜。我一直认为我是靠自己辛苦劳动挣的饭吃，怎么成了吃党的饭呢？

酒喝完了，走出“串串香”分手时，老教授依然郁闷，我依然困惑。

冷冷的夜风，从江边吹来。头脑依然热呼呼的一片乱麻，思索而又不解真乃人生一大痛苦。

几十年前，我在文革时的课堂上饱受学校的教育：“我们每说一句话都要看是否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每做一件事都要看是否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每走一步都要看是否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班主任老师强调，这是成为一个革命接班人的必备条件。

十岁的我很想成为革命接班人，决心照此办理。可是，我很快发现我智力不足，无法判断这一件事、那一句话是否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比如，我很想去找一个庙里的和尚练武术——为了打架，因为我经常受人欺负；又如我说过：某某燕子好可爱——她是我们班上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



十多岁的我很想成为革命接班人

几十年过去了，中国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我怎么又陷入了十多岁时的困惑？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呢？是我白长了几十岁还是社会又回到了几十年前？眼下我上五门不同的课，一个月五十多节课要说多少话呢？万一不小心又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呢？这可不是件小事，领导在告诫会上强调：“出了意识形态的问题，一票否决！”

我理解，这“一票否决”，轻则丢掉吃饭的饭碗，重则要请去吃另一种饭了。

冷冷的夜风从江边吹来，突然一道灵光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闪亮在我愚顽不化的心头。

是啊！我是吃的党的饭呀！我怎么老是想到饭是自己挣的，怎么没想到饭碗是谁给的呢？以前你不是认真读过周小平同志“没有祖国，你什么都不是”的大作吗？爱国爱党是一体的呀，没有党你又是干什么呢？党可以让你拥有这碗饭，也可以砸掉你的这碗饭。北京大学的焦国标老师不是说了不该说的话丢掉饭碗，没饭吃了吗？吉林艺术学院的卢雪松老师不是被学生举报没走在党的路线上而被掀下讲台差点去吃“另一种饭”了吗？

……

由此可见，这碗饭的确是党给的。因此，推论下来，我吃的的确是党的饭！

想通了这个道理，我一下子快乐起来，并为自己以前“吃饭，砸锅”的恩将仇报行为深感羞耻。

……

我哼着从小就熟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回到家。

老婆看见我久违的笑脸，很是惊讶。我心宽体胖地告诉她：“好了好了，我不再胡思乱想了，今后党叫干啥就干啥！好了好了！”

当天晚上我睡得十分香甜，无忧、无虑、无思、无梦，一觉睡到大天亮。

第二天老婆说：“你昨晚的鼾声好独特啊，像猪圈里熟睡的肥猪。”

2017年3月10日

哀悼“Lili”

一

凌晨一点，我从电脑前站起身，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为孔令平《血纪》的修改和插图工作总算结束了。可是，那被暴政虐杀的生命却一个个在我眼前鲜活地晃动，让我心灵气喘吁吁。

张锡琨、陈力、孙明权、刘顺森、皮天明……

我走到客厅，Lili 趴在地上，她抬起头，睁着那双无比美丽的一蓝一黄的鸳鸯眼，温柔地望着我，细声细气“喵”地叫了一声。

我心中淤积的那些沉重、那些悲愤、那些郁闷，在她轻轻的一声迎候中焕然冰释——一如 10 年来她对我的那种神奇抚慰。

可我没料到，这竟是她对我最后的一声致意，或者说，是她用她的生命在向我告别。

我转身走到漆黑的阳台上，准备舒展一下久坐的筋骨。我没注意到，Lili 无声无息地跟着我走出来，并钻出了铁栏。

漆黑的夜里，传来了一声叫喊——她坠在半空硬梁上发出的呼声，紧接着是下坠的声响。夜半的寂静里，声响很大，但转眼，世界又复归死一般的寂静……

二

2000年初冬的一天，我同妻女来到巴南区山上的一个农舍。农舍是一个守水库老农的破旧土房。突然，一只雪白的小猫从窗台跳进来，眼巴巴地望着我们手中的食物。



“呀，这只猫的眼睛好漂亮！一只象清纯的蓝色天空，另一只则像华贵的黄色翡翠。”这绝非是当地农村土猫的后代。果然，农民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城里人带到山上，遗弃在这儿的。

如此高贵的血统，不得不以破烂土屋为家，守水库的老农一周来几次，悲天悯人地留给她一碗红苕饭。

“高贵血统”此时已是瘦骨嶙嶙，饥饿使她冒险走到陌生人前，急切地望着我们，声声呼唤。

我们给她一块卤肉，她一口咬住，飞快夺门而去。

下午我们离去时，发现她正伸展四肢，躺在水库旁的草地上，雪白的柔毛舒展在绿色的草丛中，娇弱的脸上荡漾着吃了一肚子肉后的心满意足。冬日的阳光暖暖地洒下，她微闭着那对美丽的鸳鸯眼，仿佛法国贵族小姐，伸展玉肌胴体，沐浴在游泳池边的娇阳中。

三

一个多月后，记得那天是2000年12月3号，不知为什么原因，我突然感到一种冲动，想再去那间土屋。

当即携妻女前往。

呀！哪儿钻出一只丑陋的灰猫？它鼻孔覆盖着一大块黑污，全身布满灰垢，毛发一股一股地粘在一起，胡须全无，尤其是那根尾巴，除了靠近屁股一寸左右的地方还有一点肉感，其余部分竟变成一根细细长长的“枯藤”。再看眼睛，昏浊呆涩，如垂死的老妇。

“这是哪家的猫？怎么这副模样？”

“就是你们上次来喂过肉的那只呀，鸳鸯眼。”

“是她？！”

原来，鸳鸯眼近来连红苕饭也得不到保障。也许是由于出身原因，她野外生存本领不强，尤其不善偷盗，所以，一个多月下来，饿得半死。更要命的是，山上冷寒，她没有窝，夜里为了取暖，只得钻入农民熄火后的柴灶。结果，除了胡须被全部烤光，还华彩褪尽，变成了一只灰猫。

“你们怎么不拿点旧衣服给她铺个窝？”妻子问。

“它是个畜生，死了就死了。”农民笑嘻嘻地说。

“我们把她带回去吧。”我对妻子说。

“家里已经有只猫了。”妻子犹豫不决。

“灰猫”吃力地撕咬着我们给她的肉，显然没有了往日的力气。

“你们喂点肉也不管用，它最多还能活 10 来天。那个尾巴一旦干枯到屁股，它就没命了。”

农民的这句话促使我下了决心。

四

我和女儿小心翼翼地给她洗澡。水一打湿皮毛，眼前便呈现出一付惨不忍睹的“皮包骨”。她的背脊，已变成一个个凸起的“小山峰”。

整整洗了三盆黑水，才勉强让她恢复了本色。记得中途热水器突然熄火，她竟毫不挣扎地站立在冰冷的水中，默默忍受。

接下来，我们用 800 瓦的烤火炉，温暖了她整整三天三夜。

那些天，虽然挣扎在死亡边缘，但她每次都坚持偏偏倒倒走到卫生间大小便——真是高贵血统！

接下来的半年里，吃，成了她最关注最敏感的事。她也许知道自己是外来的流浪儿，不是“嫡系”，因此，成天很知趣地呆在某个角落，从不与那只“嫡系”猫争宠。但是，只要一听见开冰箱拿猫粮的声音，她一定会从角落里箭一般地冲出。家里那只一向养尊处优的“嫡系”，则虎踞龙盘傲居高处，一脸不屑地望着这个“饿捞鬼”狼吞虎咽。

看着她那种贪渴和急迫，不禁想起杰克·伦敦《热爱生命》中的那个幸存者。只有在饥饿死亡边缘挣扎过的人，才会对食物有刻骨铭心的感受。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经过毛泽东饥荒年代的人，无比珍惜粮食的原因。

“嫡系”有一个美丽的名字——“Mary”。那么，她呢？

目睹她瘦弱细小的形象，我想到“little”这个英文单词。当年我女儿很“细小”时，我也叫她“little”。妻女对此名都表示赞同，于是，鸳鸯眼有了正式的称呼。后来，我们觉得“little”还不够响亮和亲切，便以原音结尾的“li”重复使用。

从此，我们叫了她 10 年“Lili”。

五

2003 年 7 月的一个清晨，Mary 失足从九楼坠下，我们找到他时，他曲蜷着身子，像沉睡一样静静地躺在地上，嘴角流出一丝腥红的鲜血。

在埋葬他的山坡上，我失声痛哭。女儿受不了，冒着山城的酷暑，独自到猫市场上乱转……

但是，我们还有 Lili，她“喵喵”的叫声抚慰着我们“失子”后的悲伤。我们则把全部的爱倾注在她身上。

也许是她曾几乎被冻死，Lili 一生都特别怕冷，因此，天气稍凉，她便要上床钻入被窝，同人一样，她头枕在枕头上，身子盖得严严的，一副同床共枕的快乐。

我则喜欢双手捧住她的头，将脸紧紧贴在她脸上，不停地叫着：“Lili”，“Lili”。她细细地叫两声，举起前爪轻轻地触碰我的手，每这当这时，一种单纯的快乐和内心的宁静便细细密密盈满心头。

每次从外面归来，打开门，第一个念头就是 Lili 在哪儿。她往往迎到门边，往地上一倒，左翻、右滚，以此表达她的迎候和欣喜。

早晨，她一感觉到我房间的动静，便跑到我房门外等候，我一开门，她便“喵”地给我一声新一天开始的问候，然后，往地上一倒，左翻、右滚……

这样，我新一天开始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她抱起来，一边叫着“Lili”、“Lili”，一边爱怜地拍打她的身子。

六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Lili 步入了猫的暮年，然而，尽管年龄增长，她仍永远是儿童时的单纯，永远是毫无心计的简单。她永远不会变得心机诡诈老谋深算。那对一蓝一黄的鸳鸯眼，依然那么美丽、那么清澈、那么和善。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捧读老子的《道德经》，有时，我目光从书本上抬起，看见蹲在一旁的 Lili，突然想到，Lili 身上不是蕴含有老子的“自然之道”吗？她知足长乐，吃几口猫粮便再无如人类那无边无际的贪欲；她简单纯朴，不长心计，绝不“智慧出，有大伪”；她宁静淡泊，见素抱朴，与世无争……

记得有一天，我焦头烂额从外面回来，眼中，燃烧着被朋友“大智慧”欺骗的愤怒，心中，堵满了对这个“异化”社会的绝望。

“喵”地一声，传来 Lili 的迎候，她立在音箱上，美丽的鸳鸯眼晶晶闪闪。我在捧起她头的那一霎间，仿佛一股甘冽的清泉，浸过我布满尘埃的心灵。Lili 用她猫世界里的单纯美丽，神奇地洗去了我人世间“柴灰堆”的肮脏丑陋。

朋友王康在《咏而归》中写道，有一天他同他父亲路过石桥铺火葬场，他父亲说，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最后归宿。接着他语气沉重地说：“人是最坏的动物。”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细细地描写了“与禽兽为邻”的快乐。

拜伦在诗歌中写道：“我不是不爱人类，我更爱自然。”

我想起多年前我喂养过的一只叫“拐尾巴”的小猫。

“拐尾巴”非常亲近人，依赖人，信任人，对人毫无防备心。一个冬天的早晨，我打开门，发现她蜷缩在门边，呼呼噜噜地喘气。我捧起一看，大吃一惊！她的头部被烧得面目全非！

两只眼睛被烧瞎了，鼻子烧得塌陷，已无法呼吸，嘴唇黑糊糊地，牙齿暴露在外面，前爪也被人折断……

她再也吞不下食物，痛苦地渡过了她短暂生命中的最后两天。

后来得知，有一家人缸里的鲫鱼不知被哪只猫偷了几条，那家人一心报复，很快，

轻而易举地抓住了最亲近人、对人毫无防备的“拐尾巴”。

“拐尾巴”被按压在红红的碳火盆上……

惨叫声声，焦烟四起！

这事给我极大的刺激，后来，我写了《猫与人》一文，发表在《重庆日报》上。

在人的世界里，我们有特里萨修女、有圣保罗二世、有圣雄甘地……可我们更有希特勒、斯大林、XXX……还有千千万万个“义和团”和他们的一代代传人。

在 Lili 的世界里，自然没有感人泪下的高尚，没有甜美的情爱，但一定没有杀人千万的“希特勒猫”、“斯大林猫”、“XXX 猫”。

七

夜，一片漆黑，一片寂静。

在三楼的平台，Lili 静静地躺卧。

泪水倏地夺眶而出，我呆呆伫立，望着她一动不动的沉睡。

“快去把她抱起来看看！”妻子说。

我知道她不会再醒来了，从 25 楼坠下，不会有奇迹发生。

我心扑扑乱跳，轻轻把她抱起。她头耷拉着，眼睛半睁半闭，身子异常柔软。

我把她放到外面的地上，抚摸着她头一天刚梳剪过的毛发。泪水又一次滚滚而下，我站起来，转过身。

……

我没有把她抱回家，不愿让与她相依为命 8 年的狗儿看见她的遗体。在浓浓的夜色中，我和妻子抱着她来到桃花溪边的一块草地旁。

刚下过大雨，泥土十分湿润。我埋头挖坑，妻子将手放在 Lili 身上。

突然她说：“好像她还有心跳！”

我慌忙伸手过去。良久，发现这只是妻子一厢情愿的渴盼。

挖好坑，我最后一次抱起她，将她蜷曲着放入坑中。

她像她生前那样静静地睡着，我呆呆地凝视她一会，然后为她盖上永恒的被盖——褐色的泥土。

泥土冷寒潮湿，Lili 生前最怕寒冷，可此时，她不得不永远睡在冷寒的地下了。这样一想，巨大的悲伤又排山倒海涌上心头，滚烫的眼泪，滴落在冷冷的“坟”上。

八

回到再也没有 Lili 的家中，已是凌晨两点。

“不要告诉在学校读书的女儿。”我和妻子不约而同地说。女儿爱猫如命，她的网名就叫“雨中的猫”，那标志头像就是“一蓝一黄的鸳鸯眼”。

妻子一声不吭走进她的房间，不再出来。我独自又走到刚才 Lili 掉落的阳台上，将头伏在铁栏上，凝视着她坠下去的漆黑“深谷”。

她摔在半空的横梁时发出了最后一声呼叫，那叫声既不尖利也不凄厉，仿佛是一声无奈的叹息。这使我想起最后这一个月来，Lili 的一些反常举动。一是她突然变得特别能吃，成天老缠着人要吃的，一听冰箱响就跑来，就像她 10 年前刚来时的情景。二

是她特别依恋人，她常常坐在书架上或趴在地上，眼巴巴地望着人，我们一从她面前走过，她便细声细气“喵”地向我们问候，让人忍不住停下来抚摸她或抱抱她。

冥冥中在预示什么吗？

Lili 感到了她不可抗拒的命定？

Lili，你为什么要在夜半陪我走到漆黑的阳台上？

为什么？！

你是怕我孤独，还是知道我心中又堆积了太多化解不开的情绪？

10 年前，你刚走入我的生活，我便开始了长达 10 余年的悲苦之旅：从“长寿湖”的泪光到土改的悲愤，从“5.12”的惨烈到《血纪》的沉重……不过，10 年来，你一声声“喵喵”的抚慰，我们一次次脸对脸的亲昵，减轻了多少我淤积在心头的悲苦。

可是，你为什么要用生命的“血纪”为《血纪》划上一个句号呢？你是希望我告别这长达 10 余年的沉重，还是企盼在人的世界里从此有一种轻松和快乐？

天宇无声，夜风悲凉。

Lili 的肉身睡在溪边的泥土里，她的灵魂呢？猫有灵魂吗？我希望有。与贪婪、奸诈、残暴、虚伪、自私、冷漠的人类相比，禽兽们的灵魂都应上天堂。

如果有一天，我能去天堂，我一定要寻找 Lili。我会捧住她的头，将脸紧紧贴在她的头上，然后深情地呼叫——

——“Lili！”“Lili！”

1967 年，我，和奶奶

“起来！快起来！”我被一把从床上拎起来，赤脚站立在地上。

窗外，夜，黑沉沉；眼前，一张苍老的脸，满面惊恐。

“快！快到后面的过道里去！”奶奶急促地说。

“砰，砰，砰——哒，哒，哒——”外面枪声爆响。姐姐和弟弟也被拎起来推到房间后面的过道里。

过道一片漆黑。

奶奶双手合一，嘴里喃喃诵念：“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枪弹会穿过那层篱笆泥墙打中我吗？七十多岁的奶奶能保护我吗？我手脚冰凉，身子在山城八月的酷夏里瑟瑟发抖。

那一年，1967 年，文化大革命火热的一年。

当年的 2 月，一群“天兵天将”劈天而降，封锁各个路口，将父亲一把擒拿，解押而去。（后来得知，他又被押去了他五年前劳改的那个地方。）

又只有妈妈了。

妈妈虽然也成天惊恐不安，但总比年迈的奶奶有依靠感和安全感。

几个月后的一天半夜，一个男人幽灵般溜进家门。我从睡梦中惊醒，定睛一看，哇，是他，父亲！

父亲满脸疲惫，一身肮脏。

我还来不及惊喜，他就冲我做了一个手势，叫我别出声。

我从小生长在这个家庭和那种社会，早已练就了如当年在日本鬼子恐怖下“小八路”的那种机警。

我知趣地一声不吭，佯装又睡去。

父亲和母亲压着嗓子窃窃私语，连电灯都不开，一付“解放前”地下工作者在白色恐怖下单线联系的模样。

喜剧的是：他俩真是“解放前”党的地下工作者。

父母那一夜谈了什么？我不知道，知道的是，第二天醒来发现父亲又幽灵般地消失了。多年后我才得知，他在一个半夜里从那个劳改农场逃跑了。他运用他当年在重庆地下斗争时练就的大智大勇，躲开看守，翻山越岭，曲线逃亡，辗转几个县逃回了重庆。（后来我把他这段惊心动魄的逃亡经历记录在《长寿湖》一书中）。

又只有妈妈庇护我们了。可是，我很快发现妈妈越来越紧张，一声门响，她便浑身一震。

她没有对我们说她惊恐的原因。我们几姊妹都还小，想必无法理解和分担。

一天，她突然对我们说她也要走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要我们听奶奶的话。

我顿时有些失魂落魄。

后来我想，一个母亲抛开几个年幼的子女离家出走，一定是到了不得已的地步。

奶奶要我送妈妈到江边，嘱咐我看着她登上渡江的船后才回来。

那时重庆已经非常混乱。势不两立的两派（“8.15”派和“反到底”派）正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誓死保卫毛主席和他的革命路线——而打得死去活来。

龙门浩的渡船已经停开了——因为处在黄山“反到底”的大炮火力内。海棠溪的渡船时开时停。我陪妈妈赶到时，天哪，码头上人山人海！江面还上不时有炮弹落水时溅起的水柱。多年后，当我接触到抗战时的难民潮和重庆大轰炸的历史时，脑海中竟浮现出1967年的那一幕。

山城的六月烈日高照，吆喝，尖叫，哭喊……

我没有看到妈妈登船便回家了，因为妈妈看我又热又渴又饿。

当天晚上，妈妈没回来，想必她最终渡江而去。

接下来的日子，是继大饥荒后，又一段非常艰难的岁月。家里的大人只有奶奶了。奶奶是我外婆在大饥荒去世后从老家万县来的。她生长在农村，有一双非常勤劳的手和一双断骨突兀的小脚。她没有文化，但一辈子吃苦耐劳的生涯培养了她面对苦难的超强坚韧。

她的几个子女和他们的家庭，在“新中国”里，没有一个是幸运或完整的。她的大儿，1936年参加革命，曾同那个著名的“江姐”一块为“新中国”出生入死。但是，1957年，一顶右派帽子，让他全家20多年死去活来；她女儿的丈夫，一个会计，50年代死于一场运动，她女儿从此独身；她的二儿，我的父亲，1957年中箭落马，发配劳改；她的么女媳，右派，劳改20年。

一个母亲，面对子女们这般的遭遇，会是什么感受呢？

但是，奶奶没有倒下，她坚稳地站立——用她那双中国传统女人的小脚。在1967年父母双双逃亡之后，她又拼尽全力，支撑了这个破碎的家。

枪声，炮声的“武斗”，自然是奶奶三天两头的惊恐，但一日三餐的粮草，却是她日日夜夜的焦虑。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一切生活用品都要凭票，大到粮米、布皮、煤炭、猪肉，小到肥皂、灯泡、火柴、豆腐，统统凭票供应。在我记忆中，好像只有自来水不凭票，只要钱，一分钱一桶。

文盲的奶奶，每每面对一大堆印有伟大领袖毛主席语录的票证，只有求助于拥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我和五年级文化的姐姐。然而，每每让她发愁的不是不认得那一大堆“眼花缭乱”，而是——这些票证需要另一种票证才有价值和意义，那就是人民币！

家里最缺的就是这种“票证”，因为父母逃亡后断了经济来源。

一向坚韧的奶奶眼中也出现了惊恐——几年前大饥荒的死亡气息从坟墓中飘出，在残破的家中弥漫。

每个月，奶奶只有东拼西凑把该月的米和煤买回来后才能安心入睡。她说，有了这两样，至少不会饿死了。至于油、肉等，那已经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了。

由于缺乏起码的营养，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已经十一岁的我，开始像婴儿一样，夜里尿床了。

那天，奶奶一大早就望着我，时而紧蹙双眉，而时低声长叹。

我不敢看她，怕她责骂——昨夜睡梦中我又尿床了。

奶奶晾晒好被我尿湿的床被，没有责骂。我羞愧难当，像做错了事的小狗，蜷缩在墙角。

奶奶又盯着我看了一会，突然解开她的裤腰带。

我紧盯着她的手。

一个小小的灰布袋缝在裤腰带的下面。奶奶解开系在布袋上的红绳，从里面掏出一个油纸包。她一层一层打开油纸，再剥去一层一层薄纸，露出了一张两毛的人民币。

“来，拿去。”

“干啥？”

“去买两根油条。”

“真的？！”我跳起来，又惊又喜。

“你一个人吃一根，另一根拿来下一碗面，让姐姐弟弟都沾点油。”

“我一个人吃一根，为啥？”

“你今天生日呀。”

我这才想起，那天是我的生日。

“记住，不准在外面吃，要拿回来中午大家一块吃。还有，两根油条一角二分，还剩八分，一定要还回来！月底还有几天，只剩下这八分钱了。”



13岁的我

中午，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摆在桌子当中，面中有切成几小段的油条，面汤里飘浮着几颗我们几个月都没见过的油星。

我独自嚼着属于我的那根又香又脆的油条，嗅着满屋的香气，享受着姐姐弟弟垂涎欲滴的目光，幸福得有些昏眩。记得老师曾多次说过：“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儿童最幸福。”我一直对此缺乏感受，但是，那天，那根油条让我真真切切有了体会。

（我永远记得那幸福的昏眩感，后来，我把这种刻骨铭心的感受写在小说《三颗子弹与一个皮球》中。）

1966年6月到1968年8月，中国出现了一个旷世奇观——全国大中小学全部停课。这据说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停课闹革命”。于是，在拥有六、七亿人口的大国中，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学生流向了社会。大一点的，参加革命投身武斗，相互厮杀得死去活来。我们千千万万无法参加“革命”的小学生，则无所事事，万般无聊。

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更没有互联网，更要命的是，所有书籍，除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大作和新华字典外，统统被作为“封资修”的毒草被焚烧或囚禁了。

时代给我们少年儿童留下的只有长江了。

于是，从春天3、4月份到深秋11月，长江，成了我们唯一的“乐园”。那几年，重庆长江两岸有一道“闪亮”的景观。一群群一丝不挂的光屁股男孩儿在江边和水中嬉闹、呼叫、翻滚。

但是，这却是一个危险的“乐园”：三天两头就有光屁股男孩一去不回——滚滚的江水，把他们带向了另一个世界。

可是，死亡的危险和家人的恐吓，并没有阻止江边的热闹。妈妈在时我还畏惧几分，现在只有奶奶了，我便天天肆无忌惮直奔“乐园”。奶奶又急又气，成天提心吊胆。

我只顾自己玩得开心，从来没想过奶奶的感受。有一天，我很晚才从江边回来，远远地，看见奶奶站在外面的台阶上，痴痴地望着我归来的路，夕阳最后一抹血红的余晖洒在她皱纹密布的脸上。

我心头突然一热：奶奶！

“乐园”里最快乐也是最激动人心的场景是江面上漂来“浮财”：一根竹竿、一个木桶、一捆木柴等等。每遇这种“天降馅饼”，“乐园”里便呈现如奥运游泳赛的竞争——无数“光屁股”，一个个争先恐后，劈波斩浪，直扑“浮财”！那真是一个壮观的场面。

“乐园”里最常见也是最恐怖的景象是江面上漂来一具具浮尸。那几年，同胞相残，杀声震天，长江，成了一个理想的抛尸场。

我们游泳的地方是一个回水沱。江水冲来，在回水沱里回旋。几乎每天，尤其是在1967年的6、7、8、9几个月，我们都要看到几具、十几具，甚至几十具的尸体。浮尸在水中回旋，夏日的阳光照见“黑夜”的残暴。有的被挖掉眼睛、有的被割去乳房、有的被铁丝洞穿锁骨、有的被剜去阴茎，两腿间一个森森的血洞……还有的被挂在驳船的铁锚上，几天几夜，以其狰狞的面孔，撕裂的肉体，无声地展示那个年代的革命“辉煌”。

见多了，我，同其他光屁股，慢慢不再大惊失色，待浮尸漂走后，又前仆后继地跳入“乐园”。

一天黄昏，我已经穿好裤子准备回家，突然看见江面上漂来“浮财”——好像是一个木桶。我左右一瞥，江边还有其他几个竞争对手，可他们尚未发现。我飞快脱去裤子，跃入水中。

夕阳正对着我射来，江面上波光闪闪。“木桶”在夕阳的光辉中随波起伏，马上就将成为我的果实。

突然，我闻到一股臭味！我一怔，转眼，“木桶”被水冲到面前。

一对男女！一对被纤绳捆在一起的血肉模糊的男女！

女的背对着，只见长长的头发，男的浮胀、变形的脸上鼻子被割掉……

我大叫一声，转身拼命往回游，一口水呛来，天昏地暗，我觉得到了世界的末日……

当天晚上，我吃不下饭，在山城酷夏的炎热里瑟瑟发抖，奶奶以为我病了，要给我

“刮痧”。我抓着她的手说：“奶奶，今晚我同你睡好吗？”

奶奶诧异的望着我，一向野性十足的我竟变成了绵羊？

我满头大汗的裹在床单里，紧紧抱住奶奶的小脚，那双被裹得骨断筋裂的小脚，是那个漆黑夜里我全部的依靠和安慰。

时光轻盈地流逝，历史，翻过了 1967 那血红的一页。

几年后，我同千万个同龄人，又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奔赴农村广阔天地。

奶奶没有送我到江边，她站在外面的台阶上，用苍老的手臂和江风拂起的满头白发，向我道别……



我的奶奶陈云献

“没有她们，便没有世界”

母亲已经老了，眼角的皱纹，头上的白发。

从尘封的影集里，发现母亲曾经那样年轻、那样秀美。可惜，当她非常年轻非常秀美时，那一个“引蛇出洞”的“阳谋”就把同样年轻的父亲送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

不知母亲是怎样挺过那场突来的灾变。她 19 岁就参加革命，同父亲一样，她对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充满向往，对党、对领袖、对社会主义祖国怀着山泉般清纯与质朴的情感。一夜间，自己的丈夫兼革命战友成了“阶级敌人”，这个“界线”如何划清？还有，独自拖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幼儿，如何面对每日的油盐柴米？很多家庭因此而玉殒香消，但我家大难未灭。只是听说，母亲抱着刚出世的弟弟，喂给

他的奶汁中有一半泪水。

在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日子里，母亲的小女夭折了，紧接着外婆也衰弱到了尽头。“我，我想吃一片扣肉”，外婆吃力地说，母亲发疯般地奔出门去，四处觅求。但是，外婆未能吃到肉便悄然去了另一个世界。没有人安慰她一声“化悲痛为力量”，母亲只有独自用瘦弱的肩膀，拼命支撑起破碎的家。差一点，已全身水肿的母亲，就步了外婆的后尘。

日子刚好一点，母亲便紧抓我们的学习，哪怕劳累到深夜，也要一页页地检查批改我们的作业。然而，正当母亲认认真真按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培养教育我们时，“文化大革命”汹涌而来。刚回城几年的父亲又被押去了那个“惩罚其肉体以拯救其灵魂”的地方。住家的四壁上，浓黑的墨汁写满了“打倒”。

抄家那天早上，鲜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灼目的阳光照耀着砸碎的窗台。我偷偷瞥了母亲一眼，心中骤然一紧，仿佛在那沉重的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鲜血滴落。但母亲坚定地站起来，为我们整理好书包，平静地说：“到学榜去，不要担心家里。”

母亲呵护着我们走过那一段标语血红的路……

我下乡落户的前一夜，母亲在灯下久久守候，朦胧泪光中依稀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千古诗情。

“你出身不好，一切靠你自己努力奋斗了。”母亲又一次殷殷叮嘱。

多年后我重返故乡时母亲已离休，父亲也已回到“党的怀抱。”日子终于轻松多了。母亲加入了老年大学，琴棋书画操练不已。“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美术、音乐、诗歌”，母亲用她那操劳了一辈子的粗糙双手，捧起她的“艺术作品”（作业），若有所失地说。

我蓦地有些感伤：失去的，还能再找回来？夕阳也许无限美好，近黄昏却是黯然的命定。

然而，从未听母亲抱怨，更没见她哀叹。她一如既往地认认真真做事，真真诚诚待人。

母亲老了，眼角的皱纹，头上的白发。

我越来越渴望拥抱着她，对她说：“妈妈我爱你。”当然，我知道她不习惯这西方味的表达，我便一直想送给她我在《MY MOTHER》的英文作文中所引用的高尔基的名言——

“让我们赞美她们——母亲！赞美她们的力量，赞美她们的 LOVE。她们用丰润的乳房，甘甜的奶汁，哺育了全人类。没有她们，便没有世界！”

魂牵梦萦塔公高原

那一片神奇的土地在召唤着我！

仿佛多年梦中情人，西风夕照中长发飘散，无言而深情地透射出一种苍凉的期盼。走！徒步走向她的怀抱——那令人魂牵梦萦的青藏高原。



一、走向野人海

野人海，海拔 3800 米，静卧在折多山白雪之下，林莽与芳草之中，为川西第一大湖。也是我此行的第一站。

黄昏时分，到达康定城外二道桥温泉。这儿本不准住宿，但那位面慈心善的女经理听说我是徒步进山，特地恩准了我一个房间。

女经理介绍说，这儿原是川西军阀刘文辉的温泉别墅，现对游人开放。我望着飞檐画栋、蒸腾热泉，心想，任凭你伟烈英豪、万岁龙颜，终究是天地间匆匆过客，唯有这山川永恒、泉水长流。

整层楼仅我一人居住，山风扑来，窗纸哗响，恍然忆起武侠小说中蒙面大侠，夜半刺客，月黑星稀之时，飞檐走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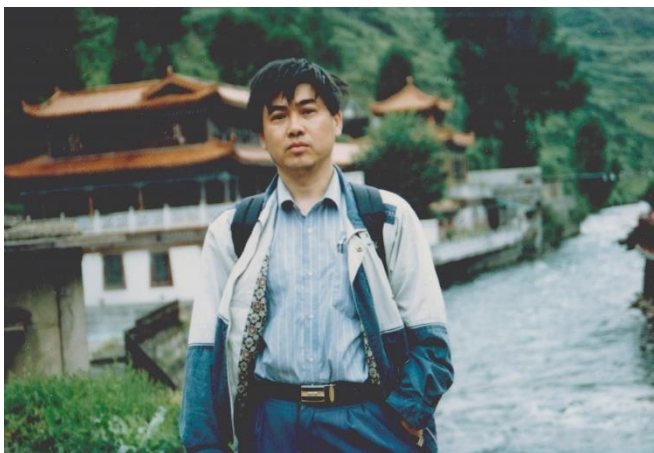
次晨 8 点，我背上行囊，整装出发。我把我的一本“大作”送给经理，一是报答她好意，二是减轻重量。

步出温泉，发现天低云暗，冷风阵阵。我回首向远方云雾缭绕的跑马山投去一瞥，昂然朝西北的群山迈开了大步。

山风携着冰凉的雨点扑面打来。

“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诗句陡然涌上心头。我一咬牙，提起壮士出征的兴奋与豪情。都说独自进山危险，但我仍坚信自己是条好汉。走！去追寻那未被文明和“骄傲无知的现代人”所污染的天地！

偶尔途经一个村寨，引得山民翘首观望，渺小的我在苍茫的天地间似乎变得伟岸起来。



1997 年 8 月在康定二道桥出发徒步进山时

中午时分，就着溪水吃了点干粮之后又赶紧上路。山势陡然升高。进入经理警告我的“无人区”。背囊变得越来越沉重，“伟岸”的感受让位于吁吁的气喘。

斜刺里突然杀出一条黑汉，几步便窜到我身后。我大惊，定神一看，但见一位长发垂肩，身挂腰刀，面如古猿的藏族汉子雄纠纠地立于面前。

“干啥？”我喝问，做出一付雄壮相。

他咧嘴一笑，用半通不通的汉语说，这一带没人，要和我结伴而行。我慌忙拒绝。“阶级斗争”弦我一向绷得很紧，何况是在这“无人区”。

黑汉见我不动，便径自如古猿般窜入山林，攀山而去。我松了口气，抹去一头虚汗。不料，待我沿大路慢慢转上山时，发现黑汉正端坐路中“守株待兔”。

这一惊非同小可！他干嘛非要缠着我？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汉子冲我和蔼一笑，非常吃力地用生硬的汉语说，大路远，钻小路是捷径。我直盯着他，发现汉子虽然相貌黑黝、长发蓬乱，那双眼睛却是善良和真诚的。以他的文化修养，绝装不出这份真善。我望了望那长长的曲折山路，内心激烈斗争了几秒钟，决定跟他走。

钻入山林，汉子嗖嗖几下便没了踪影。我慌忙从地上拾起一块利石，以防他埋伏在前面密匝的灌木丛中来个“猛虎扑食”。山路陡峭，心中紧张，更加上气不接下气，终于出现了我一直担心的高原反应。我卸下背囊，扔掉利石，往地上一滚，心想，此刻纵有利刀，又怎是汉子的对手？远处传来山泉的叮咚与鸟儿的啁啾。头顶上，山风柔柔地吹拂，树枝轻轻摇晃。心中不禁暗想，若在此长眠，倒是一块风水宝地。

汉子在大路上等我，见我终于钻出，他释然一笑，示意我休息。我低头一看，十指已经乌紫，没想到才海拔 3400 米，就如此缺氧。我不敢再钻山林、攀陡坡。汉子便殷殷陪我踉跄而行，还不时盛来泉水，双手捧到我面前。望着他那虽然黑黝却淳朴的面孔，我蓦地觉得自己荒唐可笑。为什么自己疑心如此之重，“觉悟”如此之高？是都市里人际间有太多的“未敢翻身已碰头”，还是深受“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的影响？其实，汉子不过是想在这荒山野岭帮帮我这个异乡客而已。看来，都市里那扭曲的心态，不适于这洁净的“无人区”：野人海也许尚有几分未开化的“野味”，但却未受“发达”的污染。

近黄昏时，来到野人海脚下的七色海招待所。我再也走不动了，头痛胸闷，虚汗直流。看来，今天预计抵达的野人海是走不到了。

汉子与我挥手作别，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心头涌起一阵甜甜的温暖。

在木头搭建的招待所里，我倒头便睡，连伸手去包中取药都觉得困难。高原空气如此清新，怎么氧气这么稀少！

二、寂静野人海

晚上下楼吃饭时，遇到几位重庆老乡，西南师范大学的郑建欧老师夫妇和他的哥哥嫂嫂。他们听说我徒步进山，十分佩服，盛情邀我一块吃饭。

饭桌上，他们不断往我碗里夹菜，问我孤身徒步进山是为了什么。我说，除了与生俱来的对自然的原始渴求之外，主要是对现代都市文明的一种厌倦，对纯朴民情的一种追求。

他们认为我独自进山很危险，不必要冒险。竭力劝我明天同他们回去。

第二天清晨，郑老师亲自煮了一碗青菜，热了一个罐头，又请我吃饭。饭后，他们就要下山。郑的哥哥因高原反应已是急不可待地要往下走。吃饭时，他们不断让我多吃。

“你再往前走可能吃不上热饭菜了。特别是蔬菜。”他们将青菜和肉几乎全让给我，切切深情仿佛父母送出远门的孩子。我非常感动，一时不知如何谢好。

上午8点多钟，接他们的车来了。我们背映林莽苍天，合影留念。握手分别时，郑老师十分不安地说：“你独自上路，多加小心。我们帮不上你了，到成都后我给你夫人打电话，告诉她你至少到现在是平安健康的。”望着他们善良真诚的面孔，我找到了那份久违了的、人与人的温暖。



分别时留影

车，消失在林中，我背起行囊，掉头朝山上走去。

一路上林木葱郁，山溪清冽。在一块风景如画的开阔地上，分布着两个水温达70度和90度的热泉。泉边立一石碑，上书，70度热泉可治眼疾，90度热泉可治胃病。一位山姑模样的少女正将一篮鸡蛋放入90度热泉中煮沸。我接了，一杯90度热泉水，凉了半天才能入口。据少女讲，以前这儿的热泉水量很大，不知为何现在水小了。这使我想起逐年下降的九寨沟溪水，想来也是滥伐林木，破坏植被，不懂得保护生态带来的恶果。

中午时分，紫外线强，太阳照得脸上火辣辣的。我把毛巾浸湿后顶在头上，喘着粗气翻上一个小垭口，野人海陡然显现在眼前。



它静静躺卧在折多山旁，湖水冰清玉洁，倒映着碧蓝如洗的天空和西边绵延的雪山。风从湖面吹来，柔和清新。湖畔葱郁苍翠、杳无人迹。空阔寂静里，仿佛只有天籁之音在野人海上空神秘地飘荡。

住宿处位于山坡上，离湖面还有约30米的海拔高度。这区区30米高度，竟让我倒在地上死鱼般地喘了两次才走到。此时此刻，我才切身体会到为什么登山勇士往往受困于几米之遥的高度。

住宅处称作“野人海宾馆”，是一幢两层楼的木板房，一起步，全“宾馆”都能听到隆隆的脚步声。“宾馆”只有一个20岁的看门小伙，几间客房的全部陈设是几张旧床和

一张木桌。不过，推窗望去，却能饱览湖光山色。我放下行囊，倒头睡去，到夕阳西沉时起床下楼，才发现整个湖区仅我一个游客，整个“宾馆”也只我一个人住宿。

“宾馆”的“全权大使”小张正同几名藏族青年包糌粑包子，听说我要徒步穿越塔公草原，他惊奇地望着我。几名藏族汉子在小张翻译了我的意图之后表示愿意提供有偿带路，并负责路上的食宿。

晚上没有电，我索性吹灭蜡烛，步出“宾馆”，下到湖边。

四周寂静得有些森然，夜风却吹拂得十分温柔。山岩沉默凝香，湖水微泛白光。淡淡的月色从厚厚的云层中探出，世界弥漫着一种凄清的美。凝目月色下的湖光山色，倏地想起古罗马神话中月亮女神狄安娜飘临拉特莫斯山，亲吻牧羊少年翁迪密恩的故事。心中细细密密荡起柔美涟漪，一层层铺展开去。

我沿着湖畔漫步，只有朦胧的身影相随。野人海，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是不是远古时此处有野人栖生？此时，我不担心黑林中窜出长毛野人，亦不害怕湖水中跃起狰狞水怪，只遗憾夜风起处，不见金钗蟋蟀，狐狸成精……

我长叹一声，自觉好笑。原本立意孤身来此净界觅寻生命的另一种境界，另一种感悟，可潜意识里，又时刻在渴求《仲夏夜之梦》的浪漫风情。看来，我这辈子终难超凡脱俗，炼成正果。

第二天一早醒来，觉得头胀胸闷，四肢无力。挣扎坐起，便觉心跳气喘，一摸额头，有些发烫，心中十分着慌。想起七色海招待员说过，半月前有游人因高原反应魂断野人海，我于是慌忙伸手去行囊中摸药。

几粒药下肚后，信心仍在摇晃。前方山上，云雾缭绕，是我今天预计要去的塔公高原，那几天荒地远，游人踪绝；身后大路，坦坦荡荡，通向文明社会，意味着安全、舒适。进，还是退？

昨天约好的几位藏族牧民牵马来了。我头重脚轻翻身上马，一阵清凉山风吹来，莽苍的群山在旋转。

“宾馆”唯一的招待员小张送我出门，挥手叫着“得莫”（当地藏语“再见”）。我在马背上回首，挥手間似乎割断了与“文明社会”的最后一丝联系，唯一会说汉语的小张也“得莫”了。

山势渐高，野人海远远退到身下。眼前并无路迹，举目皆是乱石荒草，我下马步行。几位藏族汉子挥刀舞袖，攀越蹦跳，叽里咕噜说着我听不懂的“外语”。我蓦地生出一种单枪匹马孤身独闯“印第安”部落的兴奋与惶然。

当年王昭君怀抱琵琶，告别十里长亭，面迎西北寒风时，心十有何感受？塞外风雪，乡关万里，一个孤零零的弱女子，唯有几根琴弦，伴一颗芳心，英勇还是悲壮？

科学的进步，文明的发展，使人类变得越来越依赖技术与物质，自身适应大自然的能力则越来越弱，生理上如此，心理上亦然。纵然在电视机旁渴慕关山风月，大漠孤烟，但又离不开汽车空调，忍不得饥寒寂寞。当年昭君若回首，会不会瞧不起我等头脑复杂，四肢软弱的现代人？

夕阳从厚厚的云层挣出，余晖将雪峰染成灿烂金黄，远处半山腰上，遥遥一缕黄昏的炊烟，从一朵雪白的帐包中袅袅升起。哦！诱人的塔公草原！

三、自然的臣民

一只硕大的卷毛狮子狗倏地从灌木丛中杀出，猛虎下山般朝我扑来。我大惊失色，这厮估计从未见过我这身装扮的“老外”，自然凶狠万分。危急中，帐包里奔出一位少

女，连声吆喝，并稳准狠地掷去一块石头。狮子狗汪汪几声掩尾而去，算是让美女救了英雄。



我定神一看，夕阳金辉中的少女，披一身霞光，映荒裸山峰，立于碧草蓝天之间，浑身透射出青春的勃勃生机，好一道绝美的风景！

钻入帐包，一行人席地而坐，少女将碗一一分发，给我时，特地用袖子擦了一下，算是对我“讲文明、爱卫生”的城里人的尊重。酥油茶我一饮而尽，但将青稞面倾入油茶中边捏边舔我却有些嘀咕。我这双手爬山越岭早已变得五彩缤纷，实在不忍直接舔食。带路的

几条汉子以身作则，一双双黑手舔咂得十分香甜。男女老幼均拿眼盯着我，我一咬牙，如法炮制。四周爆发出大自然中最自然的笑容。

听说要照像，少女和另一位姑娘慌忙翻寻出一堆五颜六色的佩饰，细细地往身上束挂，然后压抑不住兴奋与羞涩站到镜头前。我细细调焦，暗暗叫绝。川康藏族姑娘，无需浓施粉黛，细描朱唇，略一装扮，芳草蓝天里，便是一抹绚丽亮色。可她们怎么知道一定能看到自己的玉照呢？我可能不寄或根本无法邮寄。她们忙碌一通，完全有可能是为我的影集作嫁衣裳。

牦牛归来，夜幕低垂。高原夜风刮来阵阵寒气。举目不见半点灯火，旷野笼罩着无边寂静。几位藏民（包括一位少年）握刀提枪匆匆朝山上走去。我半天才弄懂，原来是丢了几头牦牛，要连夜去寻找。我望了一眼那无边无际的黑暗，打了一个寒噤，我的天！若是我，如此暗夜，不摔个粉身碎骨定是跌得鼻青脸肿。看来，大自然中，我已萎缩退化，他们，才是立于天地间的臣民。高原夜寒，因此帐篷里一半辟作小牦牛的卧室，另一半则是男女混杂的住处。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牛粪与酥油的混合气味。他们将几个马鞍一一排开，再搬来几块石头，上面铺上两条毡子，算是为我这个客人搭了张床。他们则直接睡在铺了毡子的草地上。我合衣躺在“床”上，身旁杂草丛丛，牛粪点点。身下自然是凸凹不平，不知半夜翻身，是否会滚下“床”去，碰醒少女少男香甜幽梦。

油灯吹灭，地暗天昏，壮男少女共居一室。不过此处山高，“皇帝”遥远，不用担心“制服”夜半巡查，“文明”义愤填膺。少女在咫尺间自如地呼吸，夜风在帐包外肆意地挑逗。我丝丝吐出纷杂的思绪，压下“梦里挑灯看剑”的渴望，一任马鞍上的身躯，梦乡里驰骋万里。



四、和谐的大家庭

今天，随牧民搬家。所谓“家”，无非是一顶帐篷、一个大平锅、几个碗、两包衣服和一个小木柜。高原游牧民，随水草而迁，不可能有一个我们汉人概念中的家。

家虽简单，搬迁却艰辛。名曰草原的塔公地区实则山多石乱，不少地方十分陡斜。自由散漫惯了的牦牛一路上不听吆喝，四处乱跑。其中一头壮牛甚至发疯般地朝一个山沟狂奔，几位牧民花了一个多小时，累得满头大汗才将它拦回。这期间，剩下我一个人和那卷毛狮子狗照看大队牦牛。爬上山坡，我翻身下马，在马背



上望着行进中浩浩荡荡的牛群和辽阔起伏的草原，心中涌起一种豪壮奔放的激情和自由浪漫的喜悦——既是如拿破仑率领千军万马翻越阿尔卑斯山的伟岸豪壮又是挣脱了钢筋水泥的压迫后，在大自然中自由吐纳的喜悦。

经过大半天的爬山涉水，我们来到一块水草繁盛的坡地。这儿紧靠折多山峰，海拔4000多米，皑皑白雪与荒裸岩石历历在目。可足下的草地却野花烂漫，色彩绚丽。山风吹来，花草摇曳，令人心旷神怡。

几位牧民围追堵截，将牦牛赶到一块，从其背上卸下帐篷行囊。不料，帐篷尚未支好，老天已然翻脸，黄豆大小的冰雹劈头打来。茫茫天地间，找不到任何避护处，我只得赶紧将外衣脱下罩在头上。在噼里啪啦的砸打声中，体验到一种听天由命的无奈。

几位牧民却全然不顾，齐心协力支搭帐篷。那鲜艳的少女也同男子汉一样战天斗地，全无惧色。我落汤鸡般蹲到地上，大口吸着稀薄的氧气。此时此刻，什么丰富的思想，高深的文化，都被冰雹砸打得干干净净，只觉得相形之下，自己是个低能的弱者。



帐包支好后，一位年长的牧民首先将那唯一的小木柜平平稳稳地置在“屋”上方，再恭恭敬敬地放上活佛像、一条哈达和几个点油灯的金杯。他那虔诚使我很感动，在这远离人群的高山原野，他们的心灵慰藉和精神支柱也许就全在那个小小的木柜中。

少女在“屋”中央切割下一块带着半尺泥土的草皮，移到上方算是桌子，剩下的坑便是煮饭的灶。几个小碗搁到“桌”上，顷即半淹于茂盛的青草之中。吃的仍然是糌

粑。我很想洗个手，也将旅行了一天的碗洗一下，但溪沟较远，我不好意思单独跑出去

“文明”，便只好入乡随俗，同他们一道将手和碗舔得干干净净。

晚上，也许是见我几天里糌粑吃得“斯文”，主人便特地下了一锅大米。炊烟升腾，烟灰弥漫。在这远离城镇的高原深处，我知道大米的价值。

菜是绝无的。主人用手抠出一块酥油压在饭中当菜。那酥油经过一天的旅行，浑身上下早已粘满各种物质，这景观我白天已看得明白，此刻，昏暗灯下我只当不知。碗，是上顿舔得干干净净的，也无需洗，只是我不知我捧的这个碗，是不是我中饭时舔的那只。

一位小伙顺手从地上折断一灌木枝插入我饭中作筷子。少女见那“筷子”不太圆直，就另选了一根优秀一点的替换。米饭是夹生的，这本是高原特色，对此我早有思想准备，只是那冷冷的酥油在热热的米饭半融不融使我一时难以下咽。待我慢慢吃完一碗酥油饭时，发现他们早已狼吞虎咽地吞了三四碗。我蓦地生出了万分感慨，从他们“战天斗地”的辛劳、“从一而终”的食物，想到我等出门车船的潇洒，色彩缤纷的佳肴……

我奉上这几天应付的费用，他们平均分配了，没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由于语言不通，我一直未能弄清他们彼此的关系，甚至连名字都记不准确。从分住不同帐篷，拥有各自牦牛来看，他们绝不是一家人。但他们干活不分你我，吃喝常常共享，彼此间不见丝毫争吵，仿佛又是一个亲密和相互庇护的大家庭。我禁不住想到：西藏在物质上确实是贫穷落后的地方，但它濒临灭绝的精神文明，却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最值得珍视和保护的一种。西藏文化中有许多传统的东西，原本是和当今最现代的文明理念不约而同地契合。例如西藏传统提倡的和平、慈悲、忍耐、知足的精神，以及“不杀生”的佛教教义，都和现代世界的和平理念、生态平衡、动物保护有惊人的相会相通。与弱肉强食的现代功利主义相比，它们都体现更符合天理、人性的本质。

饭后，我走出帐篷，骤见头顶上是星光万点，璀璨夺目。大大小小明明暗暗的星星密密麻麻地交织组合，拼成一幅绚丽灿烂的图画，幽远深邃而又似乎近在咫尺地在头顶上展开。原来我们还拥有如此美丽、如此博大、如此奇妙、如此和谐的星空！难怪发现了万有引力的牛顿和发现相对论的爱因斯坦最终也发出一声感叹：一定有一个上帝，将宇宙万物安排组合得如此美好而和谐！

我又惊又喜，索性返回帐篷里拖出一条毛毡，不顾高原夜寒，躺在草地上凝目那浩瀚的苍穹。凝神良久，突然觉得身下的地球非常渺小，非常孤独，在这茫茫宇宙、迢迢时空中，尽管这颗骄子因拥有了一群“万物之灵”而独行傲立，但它终究是宇宙亿万成员中微小的一粒。夜空中，亿万群星在各自的轨道和位置上熠熠闪烁，亲密、安详、又和谐。

五、卷毛狮子狗

清晨走出帐篷，一道霞光扑面而来，篷顶的冰霜折射出晶晶闪烁。几朵纤云，通体粉红，依依地绕着雪峰，显出柔情万种。同吃同住同行几天的牧民朋友在帐篷外一字排开，为我送行。

我说不出感激与告辞的语言(他们也听不懂)，便一一与他们拥抱辞别。那位少年的眼睛湿润了，大家默默无语。那一刻，纵然语言不通，却有一种质朴而浓郁的情感，在心灵之间交流。

向导是位 18 岁左右的藏族小伙，会说藏味十足的简单汉语，今天，我要跟他穿越剩下约 100 里的塔公高原。我们一路向西，爬山涉水，一气走出 20 多里，沿途不见半点人烟。向导不时放声歌唱，声音高昂奔放。此时，我突然领悟了藏民们为什么喜欢唱

歌，歌声为什么那么辽阔。在这天苍苍野茫茫难见人迹的土地上，歌声可以驱除孤寂、抚慰灵魂。我也试图唱首汉语歌，以伴他的声音。不料，刚一出口，便觉轻飘无力，不成曲调，那音符在这辽阔苍茫的原野里显得非常苍白。

突然向导大叫：“鬼罗了！鬼罗了！”我大惊，回头一看原来是狗来了。只见一条黑狗，在乱石草丛中奔跑跳跃，直奔我们而来。

是它，卷毛狮子狗！转眼间它跑到我脚下，喘着粗气盯着我，又圆又黑的眼睛满含兴奋与恳求！

“回去！”向导大声叱喝。今天要走 100 多里路，怎能要它跟着。我拍拍它的头，又指指来路。它蜷缩在地上，呜呜低叫，一副委屈孩子相，全无初见时那猛虎下山的雄威。

我们丢下它匆匆赶路，一气又走出了 10 多里，回头不见它的踪影，想已自己回去了。

爬上一个斜斜的高坡，来到一片宽阔的草原。极目四眺，野花繁盛，空气透明，一尘不染。一阵清凉的山风吹来，萋萋芳草柔柔地向天边波涌。突然，在那草天相连的地方，一个黑色的小不点如跳跃流动的音符，孤独而迅疾地闯入视线。在这寂静的世界中，苍茫的天穹下，那跃动的生命显得那样孤单弱小，但又那样活泼顽强。卷毛狮子狗，它到底又追来了！

由于与牧民语言不通而又闲暇无聊，这几天我不时跟它亲热，抚摸它，喂它饼渣。它长这么大可能还从未得到过这般陪伴与抚爱，就认定我值得信赖。

这也许就是，它不惜爬山涉水、忍饥受累跟我走的原因。

可它却再不来到身旁，只远远地与我保持一、二公里距离。下午一点多钟，我掏出最后一把牛肉干，与向导就着溪水当午饭。我很想分给它几根，但四下不见踪影。

日头偏西，我们终于走到塔公镇。上公路时，我回头向身后的山上望去。在那儿！它高高地立在一块岩石上，背映一轮夕阳、满天晚霞。它一动不动俯视着我，雕成一幕塑像般的风景，风景般的塑像。我拼命挥手呼唤，它仍一动不动。向导解释说，这鬼（狗）不会下来，因为它未到过集镇，从未见过汽车。“那它怎么回去？100 多里路，会丢吗？”

“会丢的。”向导无所谓地说，狗不是他的。此刻他早已为商店里的五颜六色所吸引，正兴奋地盘算着享受“城市”的黄昏与夜晚。

汽车来了，向导催我快上车，我匆匆同他告别，跨上车向山下飞驰而去。出镇时，我向那山上投去最后一瞥，见那“塑像”仍在夕晖中痴痴呆呆立。我心中陡然一热，仿佛将初恋情人遗弃在荒原，任凭她长泪迎风。

当天夜里，当我躺在安全舒适的床上时，那黑色的跃动的音符和痴立的塑像幽灵般地缠绕着我。此时此刻，流浪在寒冷黑夜里的狮子狗一定想不通，曾给它这般温情和爱抚的两脚动物怎么像条“势利的狗”呢？需要时他顺毛抚摸，不需时甩手就走。我可是如此信赖他，忠心耿耿、忍饥挨饿地跟他走了 100 多里呀！

我披衣走到窗前，默然面对沉寂的高原群山。一轮孤冷寒月，正洒下惨白的光辉。



1962年，我的外婆

又是清明，年近80的妈妈带着我们来到外婆的坟前。

外婆的坟在长江南岸的一个山坡上，后面，就是八年抗战时蒋委员长住过的黄山。

妈妈摆上供果，点燃红烛，伫立垂首。

纸钱烧起来，红红的火光，黑黑的墓碑，青烟起处，山风回旋。

泪水，从妈妈眼里滚出来，她又想起那个年代。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家在长江边上一个叫马鞍山的半山坡上。出门，就是陡斜的石坡，长江，在脚下日日夜夜奔流。

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家家户户不准自己做饭，政府不供应煤，甚至连锅都被收缴了，每个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必须到“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去吃“集体伙食”。不去，不仅无法生存，而且还有“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风险。

外婆要去的那个公共食堂在山坡下的江边上，距那个著名的“龙门浩月”不远。

外婆是“旧社会”来的女人，小时裹过脚，“三寸金莲”行走起来原本不便，加上长期饿饭，走路就更显吃力。然而，一日三餐，她必须下到江边，领取二两饭，然后沿着那陡斜的石板山路一步步挪回家。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下着雨，看见妈支着一根竹竿，挎着个布包，布包里面是一个碗和一双筷子。妈妈颤颤巍巍，面黄肌瘦，很费力地往上挪动脚步。我一下子就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我妈妈说。

终于，公共食堂的人也看到外婆走不动了，于是他们说：“裴婆婆（我外公姓裴），反正你每天六两粮，我们给你做一个六两的馒头，你一次性领回去，这样每天你就只走一趟。”

也只有这样了，去食堂来回下坡上坡，不安全不说，仅运动量大，就不利于对那二两粮的珍惜。

可是，很快发现，这也不是好办法。一个六两的馒头切成三份，每份也只有拳头大，更要紧的是，说是六两，但份量明显不足。

外婆不吭一声，她是传统文化打造的温良恭俭型女人，一辈子谦和恭顺，从没同人红过脸，更没吵过架。何况，人家还是为她着想呢。

她的三个小孙儿，其中包括食欲极旺的我，每天从幼儿园回来，虽说已吃过晚饭，总渴望再从外婆那儿捞点吃的。外婆不忍面对三双贪渴的眼睛，每天，她都把馒头切下三片，平摊着放在盘子里，用碗盖上，等我们回来。

记得有一次，外婆拿出一个土豆，土豆很小，不便再分，于是外婆叫我们轮流把土豆含在嘴里吮吸，以延长“吃”的美妙过程。姐姐很守规矩地照章执行，吮吸之后吐给了我。我含在嘴里，实在忍不住，一口咬下去，旁边紧盯着我的弟弟，“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那时，六岁的我像一条饥饿的小狼，野性十足地搜寻食物，我把一个六岁儿童的全部智慧和精力，都来搜寻外婆可能收藏的食物。一次，家里来了一个亲戚，外婆竟然冲了一小碗炒面招待他。那个香味直浸润到我骨子里。可惜，任凭我痴痴地立在一旁双眼圆睁口水长流，亲戚铁石心肠，一匙接一匙地吃了个精光，连碗都没让我舔一舔。

要是外婆，绝不会这样！

我决心找到外婆秘密藏匿的炒面。我叫上小我一岁多的弟弟作帮手——帮我搭橙子、扶橙子——我估计炒面藏在高高柜子上面那一堆瓶瓶罐罐里。

爬上去，逐一查看，没有。我又来到卧室后面那间堆杂物的小黑屋。

在一个角落的架子上，我发现一个方形的冰铁筒，有点沉，里面有东西！我使劲撬开圆形铁盖，探手进去。空空的，只有几块拇指大小的块状物。我掏出一尝，哇，饼干！可惜，实在太小，小得大人们已经把它遗弃。我把几块“拇指”交给弟弟，不甘心地又将手伸进去。

里面有几张纸，掀开纸，下面是半罐面粉状的东西。

“炒面”！我大喜，抓起一把送进口里，迫不急待往下咽。

突然，我一阵巨烈咳嗽，哇哇直往外呕，吐得翻肠倒胃。

正美滋滋享受“战利品”的弟弟吓坏了，惊得叫起来。

外婆慌慌张张赶来。“老天爷，你哪个把石灰吃下去了？！”

“我……我……以为是……是炒面……”

“家里哪有炒面。那一碗？唉呀，那是我花五角钱向隔壁龚婆婆买的呀。”

我一边用外婆给我的水漱口，一边想，大人们为什么要把石灰和饼干放在一起呢？是为了防备我偷吃？

在我的记忆里，不管我做错什么事，外婆从来都没有骂过、更没打过我。我小时十分淘气，常常在外面滚一身泥，或者把衣裤扯烂。外婆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我洗补。家里穷，我们几姊妹的衣服都是外婆缝制。记得有一天半夜里醒来，看见外婆爬到桌子上，把针线凑到那盏昏黄的灯前，眯着眼，吃力地试图将线穿过针眼……

我却毫不懂得爱惜外婆夜里一针一线为我缝制的衣服，不懂得孝顺她，关心她、体贴她，甚至有一次，我把她珍藏在一个玻璃瓶里的十几粒糖偷来一口气吃了个精光……外婆只叹了口气，说：“你该分点给姐姐……”

左邻右舍都说，裴婆婆是个好人，是个贤良忠厚的人。

可是，那个年代，好人、正直本分的人生活空间很狭小。妈妈同外婆是同类型的人，善良老实。“当时我一切都听从政府的安排，不懂得想办法找关系给妈弄点吃的。”多年后，妈妈站在外婆的坟前对我们这样说。

那个年代，家里很艰难。爸爸几年前（1957年）中了“阳谋”，工资被扣掉大半，人也被发配到一个叫长寿湖的地方劳动改造。先是外公因病无钱医治倒下了（1958年），接着是最小的妹妹夭折（1961年），外婆挣扎到1962年，眼见得油灯如豆，朝不保夕。才34岁的妈妈也饿得满面浮肿，脸上一按一个指印。大我一岁的姐姐成天无精打采，已没有出去玩耍的力气。

坡下那家姓张的，外出寻觅一整天，傍晚挑回一担“粮食”——观音土（一种可以撑胀肚子但往往解不出大便的泥土）。然而，“饱饭”没吃两天，人先撑死一个……

天地间，像有一只巨大的猛禽，它的翅膀遮天蔽日，扇动处，阴风四起，扑面是死亡的气息。

外婆身体越来越虚弱，先是一解便就脱肛，直肠鲜鲜红红地垂落在肛门外。外婆呻吟着，用热毛巾捂住肠子，慢慢把它托回去。后来直肠频频脱落，外婆无法站立，终于卧床不起。上不起医院，请了个私人医生来打针，结果消毒不严，感染了，身子越肿越大，肿得连眼睛都睁不开。最后只得开刀。没想到割开容易，长合艰难，由于极度缺乏营养，那个刀伤一直拒绝愈合，它日日夜夜大张着口，向苍天无声地述说，直到外婆告

别人世，它都没有闭合。

那个年代，食物虽然极度匮乏，但“政治”却十分丰盛。妈妈几乎每晚都要参加“政治学习”，还不时要下乡去支援“抗击自然灾害”。通常，都是外婆照料我们。现在，外婆本人需要别人来照料了。她不愿给家人添麻烦，不忍心看到她女儿更加劳累，她觉得自己没用了，是个拖累，她萌生了去意。

公元 1962 年 7 月的一天，外婆嗫嗫嚅嚅地说：“我……我想吃……吃一片扣肉。”

“吃一片扣肉（即我们说的烧白）。”这实在是一个很小的渴求，小得就像一片无声飘落的树叶。

可是，妈妈在外婆人生的最后一个愿望前束手无策。

当时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全力发展核武器，要立足打一场核大战——那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伟大英明的领袖，考虑的是“超英赶美”的辉煌——那可是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伟业。至于长江边上有一个饥饿的女人，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渴求一片扣肉，实在太不值得这个国家和那个领袖关注了。

家里有一张老式木床，木床有一个挂蚊帐用的木架子。1962 年 7 月 28 日下午，外婆用一根绳子，一头系在木架的一根横杆上，一头系在她脖子上，悄无声息地走了。

妈妈抱着外婆悬挂的身子，泣不成声。

“她要是再坚持两个月，熬到 9 月份红苕出来就有救了。”妈妈在坟前对我们说。“三年大饥荒，她快熬到头了，在快结束时，她走了……我知道妈妈是怕拖累我……她一辈子都为别人着想……”

外婆能坚持到红苕出来吗？她怎么知道大饥荒什么时候结束？（到 1962 年 7 月，肆虐三年多的大饥荒在全国各地都基本结束，但四川省仍然严重，这“归功于极“左”的四川省省委书记李井泉，这是后话。）妈妈说，外婆死时体重只有 50 多斤，真的是皮包骨。那张木床，后来我们又用了多年，系绳子的那个横杆，细细的，并不结实，我用手一使劲它就会折断，外婆整个人吊上去它竟然完好无损，可想当时她的生命是何等“轻如鸿毛”。

外婆的丧事我已记不清了，也没有爸爸回来的印象。只记得来奔丧的表姐娣娜姐姐晚上陪着我睡，她对我说：“婆婆是个很好的人。”

还记得那几夜的淡淡的月光，幽幽冷冷，洒在窗台上，一片银辉。

外婆火化后，骨灰埋在屋前一个叫做花园坝的凹台里。那儿，正对着长江，对着江对岸楼房林立的市中区。八年抗战期间，市中区曾是日军狂轰滥炸的地方，在长达五年半的“无区别轰炸”（即不分民房、百姓全部炸）中，重庆人被炸死炸伤 3 万多人。外婆躲到了涪陵乡下，她靠给别人缝制衣服维持生活，她没有被炸死，也没有饿死，安然无恙地渡过了八年艰难岁月。

可是，在和平年代，在“奔向共产主义幸福天堂”的“康庄大道”上，外婆倒下了。

同她一同倒下的，有多少呢？

前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告诉我，他通过各种资料对比研究，得出的数字是：四川省在三年饥荒年间，至少饿死 1000 万。

他还说，当时，四川省省委书记李井泉认可的数字是 800 万。

800 万也好，1000 万也好，在李井泉眼中不过是个数字，他面对这个数字谈笑自若地说了一句“名言”：“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不饿死人？！”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就不提了，“四川出了个李井泉”却让人忍不住有些关切。从突然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1960 年 9 月），活生生地从饥民口中夺食，到动用暴力，把

所有不满的人、说出真相的人打入大牢，都是“超英赶美”类的毛式大手笔。在这些大手笔下，卑微如我外婆一样的草民，就只有拿生命祭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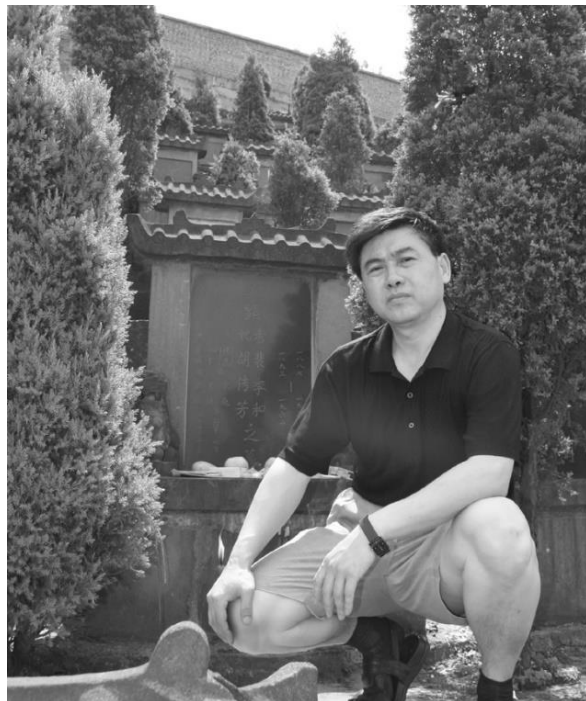
1000万，800万，的确不过是数字，但是，我眼前的这一个“1”不是数字，她是我外婆——一个鲜鲜活活的生命，一个一辈子温良贤淑慈善勤俭的生命，一个把最后一口粮食吐给她孙儿的生命。

昏灯下细细的针线、盘子里薄薄的馍片、床架上飘荡的身子……把这个简单的“1”撑得血肉丰盈。即便我也如他人一样得了健忘症，忘掉了历史上曾经有那么一个“自然灾害”，即使我不再争论1000万还是800万，但是，我会计较这一个“1”，我会年年在这一个真真实实、鲜鲜活活的“1”面前焚香致哀，垂首静思。

山风吹来，松柏摇曳，黑色的墓碑横亘在阴阳两界之间，阻隔了生与死的对话。但我相信，人有一个灵界，它超脱肉体而永存。我伫立在墓前，灵魂向外婆在天之灵跪拜。

青烟袅袅，烛火幽幽，充盈于心底的爱的灵光，穿越阴阳生死的疆界，将外婆紧紧拥抱；那沉寂了45年的迟来的心语，在墓地上空回响——

——外婆，我爱您！



我在外婆坟前

谭松于 2007年清明

灯下独语

我跌跌绊绊走在弯曲的人生路上，“没有了皮的毛”在衰草寒烟中轻飘飘地晃荡。我到处挖井，先是为命运所迫，含屈忍痛一锄锄挖完了青春，后是以为天生我才，领域宽广，大把大把抛洒光阴一试自以为是的锋芒，待汗流浹背干到日头偏西，才惶然发现，此生不知该守着哪口井喝水——因为浅浅的井中都是半罐子水。

……

我跌跌绊绊闯进“不惑”的门栏，困惑地发现四下一片茫然。“铁饭碗”早已被我豪情万丈地一锤砸烂，“泥饭碗”至今没有捧出一个形状。眼下虽然享受着“没有了皮的毛”那空前的闲暇与自由，但也隐隐有“无根可依”的迷惘与失落。

如果说“社会闲散（或曰“闲杂”）人员”一词是从旧时“游手好闲之徒”脱胎而来，那么“富余人员”、“待业人员”的词汇则是当今握权柄者绝对聪明的发明。它让你感到，“上帝”并未抛弃遭受不幸的子民，虽身在苦难中，却有“富”这褒义词的滋润，

更有“待”这表示希望的宽慰。

我在走到“不惑”门栏之前，正觉得“浑身充满了智慧和力量”时，恍恍惚惚地加入了“富余”（或“闲杂”）的队伍。

19世纪俄国文坛上的大师们，创造了奥列金、皮巧林、罗亭、拉夫列茨基一系列“多余人”形象，比较一下，我仿佛不是他们那种“多余”，也似乎不是周围“下岗人员”的“富余”，那么，我是什么呢？

在农村当知青时，常看农民放鸭。一大群鸭子密密麻麻挤在一起，放鸭人长杆轻轻一挥，成百上千的群鸭便随之转向，齐头共进。若有一只鸭子不小心离了群，便惊惶地嘎嘎叫着，拼命要往鸭群中钻。

人，是不是也有这种属性，要“与群众打成一片”才有归属和安全感？

然而，鸭群中倘若有一、两只鸭不愿在竹杆的驱赶下随大流浩荡而行，而渴慕荒野中那一片雾霭氤氲的沼泽，那一滩随风飘荡的芦苇时，它该怎么办呢？它要忍受、要付出些什么呢？

回眸身后走过的四十年，发现几乎全是命运的大手在搓捏推拔，强调“步调一致”的行为指令千百年来早已将外在的律令规范变作了个体内在的行为自觉。在我渡过青春的那个年代，有几个人能够或者敢于作出“服从于内心召唤”的选择？眼下，在疯狂追求物质利益的金波银浪中，我刚刚扯起“精神自由是最大的潇洒”的风帆，便接连撞上了“不切实际”、“过于浪漫”、“自作清高”的礁石。

可我总要执拗地想：何必非要投身一个“单位”、依托一个“组织”？如果已不为“笼中的小米”发愁，也不怕大漠中风沙扑面，何不摒弃世俗的诱惑和烦恼，割断“就业”的安慰和羁绊，而服从于内心深处的、那与生俱来的召唤？

十多年前曾学过一首英文歌，唱的是一位百万富翁的千金小姐被一群流浪的吉普赛人吸引，情不自禁地跟他们走向山川。她父亲急得追了三天三夜，最后在一条河边的草地上找到他的女儿。夜幕低垂，篝火熊熊，女儿轻声唱道：“亲爱的爸爸，他们(吉普赛人)不是贫穷的流浪汉，而是广袤大地的主人，我要跟随他们踏遍青山，直到我生命的终结……这时，吉普赛人齐声合唱，篝火在夜幕中吐出灿烂与鲜红……”

我被那齐唱深深感动！

十年后，读到哲学家赵鑫珊的随笔《倾听大自然母亲的心跳》。他认为，一阵清凉的风，掠过河边的山谷，吹动一大片枫树林中的叶，发出沙沙声，那就是大自然母亲的心跳；山溪流水，猿声鸟啼，也是她的心跳。他说，生存和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不过是最近几十年的事，而人在地球上大自然中进化的历史却长达几百万年，以几十年比几百万年，怎不觉得突然和陌生？迅猛发展的生存条件和环境几乎日夜拖着人性拚命向前奔跑。人性跟不上，骨子里适应不了变异的生存环境，因为那不是大自然母亲的心跳。

此外，何况还有不断挤压着人、曲扭着人的社会环境呢？

那么，我是什么呢？我既不全是俄国的“多余”，又不全是中国的“富余”，只是一只不愿随大流，在“竹杆”的驱赶下忽东忽西的鸭子——

——他渴慕荒野中那一片雾霭迷漾的枫林、秋风里那一滩随风起伏的芦苇；他愿意如俄国画家列维坦，被荒野中那一轮爬上树梢的孤独寒月，感动得热泪盈眶……

写于1995年底下岗半年之后

苍山脚下找金花

正当我情窦初开时，电影《五朵金花》开禁上演。在“八个样板戏”中度过了10年岁月的我，被那多彩的蝴蝶、悠扬的情歌撩拨得眼前金蛇狂舞。而那人品与嘴唇皆红，心灵与眼波都美的金花姑娘，更是令我多年魂牵梦萦！

去年，已入不惑之年的我，怀揣几两打工挣的银子，暗藏一段旧日的纯情，独自一人直奔苍山脚下蝴蝶泉边。

游船刚驶入洱海，便在一山脚靠岸。导游告知，这是一处景点，岸上有金花。我一个箭步跳上岸，直奔金花而去。

在一尊白族渔家姑娘的塑像下，一字儿排开十几个姑娘。她们每五人一组，个个打扮得如影片中的金花，想来她们也看过《五朵金花》，知道如何造型。

一位中年妇女笑咪咪地迎上来：“先生，来，快来和金花姑娘照相。”“这儿来！这儿来！”这一片热情呼唤使我顿生一种在重庆火锅店前，老板们争相拉客的感觉。离我最近的那朵“金花”直盯着我，又招手又扬眉地要我赶快投入她们的环围之中。

记得电影上的金花非常羞涩，非常含蓄，还非常难找呀。

“先生呐，您这么远来，不同我们漂亮的金花姑娘合张影，不可惜吗？快去吧，您看，金花姑娘都等不及了。”

“多少钱？”我一副“有心采花又怕刺”的窝囊相。

“很便宜啦，5元。快去吧，像机拿来，我帮您照，包您满意。”

我刚走到“五朵金花”前，金花们便如花瓣般张开，各就各位地围绕在我四周。两朵蹲在膝下，左右各立一朵，还有一朵在头上绽开。我左右一瞥，发现金花们早已摆出了笑容——一种面对镜头轻车熟路的职业性笑容。我正想做出很快乐很幸福的表情与之配合，那中年妇女已“咔嚓”一声大功告成。

很快，我的位置又被其他游客占据，金花们又忙着摆好姿势，做出笑容。

下午，到著名的蝴蝶泉。我一阵激动：电影上，金花与阿鹏在清泉边蝶影里情歌对唱秀发梳妆，朦朦胧胧卿卿我我，何等蜜意柔情！

一大群游客蜂拥而至，无数生意贩子争先恐后。我举目四望，不见半只蝴蝶翻飞，只有无数大小蝴蝶尸体，被压在标有价格的压膜中，任摊贩与游客讨价还价。

泉边也有“五朵金花”。导游小姐说，在蝴蝶泉边与金花姑娘合影意义非凡。我一听又来了诗意，当即“阿哥有心来相会”地站到了金花花丛中。

蝴蝶泉边的金花果然多情，一个将手搭在我肩头，一个将头贴到我胸前，导游小姐不失时机，玉指轻按，留下了这珍贵的历史性的一瞬。

回到故乡，我兴冲冲地将与金花幽会的玉照洗出。手捧玉照，我两眼翻白：一张玉照上五朵金花只剩三朵半！顶上那朵不见了，左边的残留半壁河山，连我的天灵盖也被削去，只剩下一对贼溜溜的眼睛。另一张虽是完整的“全家福”，但整个画面一派“月朦胧、花朦胧”。隐隐约约只见一朵金花贴在我胸前，我则张着大嘴，傻乎乎地冲着镜头笑。

老婆指着照片，鼻子里哼了一声：“好呀，人在花丛中，你不是喜欢唱‘蝴蝶飞来采花蜜，苍山脚下找金花’吗？这下可遂心愿了！”

第一次约会

读小学一年级时，我自认为自己是班上的杰出人才，聪明、勇敢而又多情。聪明，是我能用泥巴捏出各式手枪；勇敢，是我敢攀爬教室后面那又陡又险的石坡；多情，是我暗暗喜欢班上一名叫燕子的小女孩。燕子品学兼优还天生一对晶晶莹莹的大眼睛和两个时隐时现的小酒窝。总之，只要她一出现在我面前，我便不知不觉地变得举止高雅起来。

一天，我正式向她发出邀请，请她星期天到我家玩耍。她犹豫不决：“我找不到路，还有，我一个人……”“我来接你！”我骑士般豪迈地说。“你来看我做的手枪。我有 10 多本小人书，还有……”我将我的财产一一列出，竭力用物质和精神力量来打动她。

燕子终于同意了。

平生第一次与女孩单独约会的伟大时刻隆重来临。一大早，我换上了唯一的一件没打补丁的白布衬衣，坚决阻止了平时老往外淌的清鼻涕，认认真真洗了一次脸和手，然后雄赳赳地出发。可惜，由于那时我还没配手表，家里又没有钟，我着装打扮又多费了点时间，等我赶到时，燕子已在路边焦急地张望。

一看见我，她焦急不安的面孔马上变成灿烂的笑容，她一声欢呼，张开双臂，像燕子般欢快地向我奔来。于是，我兴高采烈地领着她，双双走向我的家——长江边上一个历史悠久的吊脚楼。

不料那天家中来了好几位客人，我家那 20 平方米客厅兼卧室兼书房的狭小天地里，坐满了叔叔和阿姨。我只好将燕子带到外面堆放破烂的竹棚里，拂去石块上的尘土，让燕子落座。我先将我的全部珍贵收藏兜底搬出，一一向她展示。其中包括一把竹制长剑，两把木头手枪，五枚彩色鹅卵石和一堆烟盒纸。接着是共读小人书。我还给她讲了一个“狼和小羊的故事”。最后，我慎重地掏出一粒水果糖送给她。她显然不安于接受这份厚礼，在推让一番之后，我将糖咬开，一人分享一半。

快吃午饭时，她要走。我想到家里要吃饭的客人太多，便没多留她。送她回去时，我很想请她坐一站公共汽车，但票价要 3 分钱，而我的全部存款只有 2 分。好在燕子压根儿没奢望坐汽车。

小学三年级时，我转学走了。此一别海角天涯。再见时，已是 30 多年之后。左边，立着她读高中的女儿；后面，站着她伟岸的丈夫。我提起小学一年级的约会，她微微一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

可我记得，记得那张开双臂、如燕子般奔来的欢悦；记得那一粒糖果咬开一半的香甜……

为“黄鼠狼”鸣不平

黄鼠狼偷鸡，名声很不好，它还给鸡拜年，更是阴险狡猾。总之，黄鼠狼是坏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我从小就是受的这种教育。

那一年下乡当知青，生产队里有一个“地主分子”姓黄。地主属于“阶级敌人”，也

就说是共和国的“坏人”，我们知青便顺理成章地叫他“黄鼠狼”。

不过“黄鼠狼”家里却没有鸡。他那歪歪倒倒的茅草屋里，只有一口大锅、两张木板床和几件简单农具。队里会计说，“黄鼠狼”解放前从他叔叔那儿继承了几亩地，解放后理所当然地划成了地主，成了“阶级敌人”。

既然是“阶级敌人”，那么，根据“革命群众开心之日便是阶级敌人难受之时”的伟大理论，“黄鼠狼”这个“阶级敌人”理所当然地要过难受的日子。我们当面叫他“黄鼠狼”他也不敢吭声，日子久了，他也习惯，还“哦”、“哦”地应答。

一天早上，知青二娃喂的鸡中少了一只，地上有血迹和鸡毛。队长来查看后说，这是黄鼠狼干的。

二娃顿时大怒，黄鼠狼果然偷鸡，这个坏兽，非将它们赶尽杀绝不可！

我与二娃设卡置笼，一心要抓捕黄鼠狼。几天过去了，连根黄鼠狼的毛都没捕着。气恼中，二娃一拍大腿：“走，我们去找‘黄鼠狼’赔只鸡！”

“黄鼠狼？”我困惑地望着二娃。

“就是那地主分子。”

“这与他无关嘛。”

“管他的，我们就说，队长都说是黄鼠狼干的。”

二娃当即拉着我气势汹汹地打上门去。

“黄鼠狼”早已被各种运动收拾成了温顺的“小白兔”，不过，遇上二娃这种泼皮般的要求他仍然想不通。

“黄鼠狼，你家伙这专门偷鸡……”二娃一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横蛮。

“黄鼠狼”脸胀红了：“黄鼠狼还抓老鼠哩！”

“什么？你居然敢说黄鼠狼抓老鼠？！”二娃抓起一块石头就要砸锅。

这时，地主老婆，面色惨白的“母黄鼠狼”泪流满面地叫道：“我们赔，我们赔。”

……

一晃 20 多年过去了。一天，我突然读到一篇“为黄鼠狼鸣不平”的文章。文章说，据上海师大盛和林教授 20 多年的科学研究，发现黄鼠狼一生主要吃老鼠，平均每只每年吃 400 多只鼠，从鼠口夺粮七、八百斤。因此，现在不少地区已开始放养黄鼠狼来与鼠战斗，为人民服务

原来黄鼠狼与麻雀一样，并不是坏兽！

我急将此文通报二娃。此君现在已是“优秀实业家”，不久前又在市郊买了几百亩地搞种植业，成了名副其实的地主。据他说，他现在大受当地政府和村民的欢迎，说他“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捧着这篇“鸣不平”的文章，二娃这个新地主长叹一声：“对不起，黄鼠狼！”

注：写下这篇文章几年后，我开始了为黄鼠狼“鸣不平”实质性行动……

给女儿

每在你生日这一天，总细细密密想起你不经意踩在我心田上，深深浅浅留下的那些充满温馨、充满亲情、充满欢愉的脚印。

想起你50天时，滴溜溜转动的眼眸，带给我那种前所未有的惊喜，那种骤然被唤醒的父爱；

想起你2岁时，站在路边等我，津津有味地吮吸手指；

想起你3岁时，在建专8幢，对着蛋糕拍着手唱“生日快乐”；

.....

一年又一年，匆匆复匆匆。

18年过去了，我早已失去了朝霞的色彩，火热的正午也已是过去的记忆。此刻，正一步步走向越来越厚重越来越殷红的西天的太阳。

而你，站在18岁的门栏，前面，是长长的、尚未开垦的属于你的人生。
我除了祝福还是祝福。

从看不见的血缘亲情的最深处，涌出的祝福——蘸满了爱的祝福。

每在你生日这一天，总有一个最真切的渴望，就是，希望你快乐。
其实，这哪儿是只在你生日这一天的渴望呢。

以此

献给女儿 18 岁生日



爸爸 2004 年 4 月在佛罗伦萨

跪倒在母亲河边

站在污水横流垃圾散乱的河岸，我迷惘的目光穿越时空——数千年前，在伟大人类汹涌繁殖并改天换地之前，这是一幅怎样的景象？

那时，身旁奔流的江水一定是清波碧浪，两岸一定是绵延起伏的苍翠森林。涓涓哗哗流入江的，是从厚厚苔藓中过滤而出的清泉。江面上，有成群的水鸟翻飞，夕照中，有对对野鹿在啜饮。当然，也有两脚动物手执木棍石块，在树丛中奔跑，在清波中捕捞。不过，那时他们与碧水青山飞鸟走兽是融为一体的。

后来，万物之灵势不可挡地繁衍发展起来。他们砍倒森林，剿灭众兽，一路铁血狼烟，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气吞万里如虎。

待“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战旗挥舞到 20 世纪末，文明的伟业丰功已在天地间雕刻出一幅幅史无前例的版画。钢筋水泥的灰白抹去了的绵延万里的苍翠，浑浊污黄的奔流取代了一泻千里的碧绿……

人类自然应为他超越于万物的伟大智慧骄傲，他气吞山河改造河山的能力早已让他免除了蛰居洞穴、弯弓射雕之苦。高楼、汽车、空调、炸弹、耗子药……没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

然而，为这文明的进步和胜利，大自然付出了什么代价？人类本身又失去了什么东西？

滇池，这颗具有 7000 万年历史的高原明珠，在短短二、三十年里就被彻底改变了模样：这里的水既不能泳，更不能饮！

太湖，从冰清玉洁的“少女”变成污臭遍体的“老妇”。

黄河，不再奔流到海，而是年断流 200 多天！

长江呢？

她日夜拼命奔流，想洗净每年倾倒给她的 150 亿吨污水毒垢，已经不堪重负，濒临绝塑！

山那边，“人定胜天”的大旗在呼啦啦迎风招展。一旦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300 亿立方米的水库经得起多少垃圾污垢的沉淀？！

刚刚读到消息，由于随意排污建设、生态恶变，渤海即将成为“死海”！还有，仍是由于上述原因，著名的东湖一天之内鱼虾死绝，在银白色的月光下，湖面覆盖着银白色的尸体！

我常常感到困惑，在人类改造河山、创造物质的能力登峰造极之时，他理解自然、认识自身、超越自我的进程却为什么如此缓慢。尤其不幸的是，面对已然的不幸，他仍要一意孤行。

长江，能不能换一种景象：届时的高峡平湖是万顷碧坡，库区四周是绿树掩映。泛舟湖面，是月朗风清，鸟鸣花香。假如是这样，我们将拥有多么巨大的旅游资源，将获取何等辉煌的长久效益。

当然，这需要长远的眼光，尤其需要牺牲部分眼前的利益。我们这一代人有没有“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甘愿吃苦奉献”的红岩精神？

长江，我跪倒在这从小就哺育了我、呵护了我的母亲河河岸，在污水与垃圾中向着那高楼林立，华灯如织的现代文明呼吁：救救她吧，伟大的人类，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刻，天堂和地狱的钥匙都捏在你的手中。

“劫后余生” 随笔

一向身强力壮活蹦乱跳的我，“一跟头”栽倒在病床上！此病来势汹汹，一起步就封喉，仅两三天就剥夺了我诉说痛苦的权利。我只得拿起铅笔，歪歪扭扭地写下我的要求、感觉、家务要注意的事项和我残破的思想，然后用鼻子哼一声，示意老婆拿去拜读。

本来我也许不至于隆重地住院，面临着被医生操刀刺剖的血腥，怪就怪那位年轻的博士医生低估了病魔，给我上了一种让我一时舒心畅气。事后倍加痛苦的妙药——地塞米松。

“现在的年轻医生，动辄就上激素药，这是掩盖病情。”当我一周后病入膏荒地住入医院时，那位耳鼻喉科主任皱着眉头说，“现在只有等它化脓熟透后开刀。”

“开刀，在咽喉上动刀？”我挣扎着哼出声。

“医生。可不可以输液消肿消炎不开刀？”老婆问。

“你都已经输了五天青霉素，也没见效。”医生说。

“还有没有更好的药？”

“有是有，但很贵。”

“啥药，多少钱？”

“普舒，60多元一瓶，一天得输4瓶。这还不包括其他辅助药。”

光输液一天就要近300元！我觉得一阵心痛，眼下，我已经又下岗了一年多……但是，喉痛迅速战胜了心痛，我咬了咬牙。示意老婆掏出那数字日愈减少的存折。

于是，我惶惶地躺在病床上，盼望奇迹出现。

药水顺着输液管一滴滴地进入我的血液。一小点白色粉末便掏去我60多元，真是狠毒如海洛因。

我痴痴地盯着那滴滴嗒嗒的药液，心想，每一滴大约都等于半斤瓢儿白，二两胡萝卜。这一想，心里便愤愤不平起来。眼下这药价也实在是吃人不吐骨，它专挑你最痛苦、最软弱、最不幸的时候下刀宰人。在这最无助的时刻，你一边在心底里苦苦喊冤，一边却拼命伸长脖子向那“铡刀”伸去，殷殷恳求着：“医生，请把最好的药用上吧，再多的钱我都付。”

我突然也为自己几年前在成都推销药品的“勾当”感到惭愧。当时，我和其他一些“中间人士”翻江倒海，一层层将一粒成本只有8分钱的药倒腾到最终的一元二角。我在喜滋滋地点着钞票时，也目睹患者捧着那每粒一元二角的药唉声叹气。如今，三十年河西，我也亲自享受了药品的最终价；这是一报还一报。

到第三天，“普舒”没有创造奇迹，我咽喉已经肿得吞不下开水。我忍痛使劲一吞，水竟绕道从鼻子潺潺而出，真是“一夫把关，万夫莫开”。

不幸的是，肠胃依然雄壮如虎，它们并不因为我咽喉出了故障而休假。

我旁边那位病友，正处在康复期，胃口惊人，每顿都在病床上一字排开好几盘色香味俱佳的美食。他的病床在靠窗的上风处，一股股美妙绝伦的香味径自直扑我健康敏感的鼻孔，引得我健康的肠胃一阵阵惊挛。更为可恶的是，他明知我三天没吃饭，竟将几个胖乎乎的白馒头，用塑料袋装了挂在我头顶右侧的墙上，像希腊神话中坦塔罗斯国王头上的红苹果，可望而不可及地展示着痛苦的诱惑。我闭上眼睛，回想着一块一块撕下那白色绵软的馒头放入嘴里咀嚼吞咽的美妙。我暗暗下决心，一旦咽喉畅通，我要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去买一堆胖乎乎的白馒头。

第四天上午，我呼吸开始出现困难，病痛从咽喉放射到全身。我像狗一样蜷曲在两张病床之间，痛得全身发抖，手情不自禁地狠狠抓拧自己的身子，据说吸毒者在毒瘾发作时拼命抓扯自己的头发，不顾一切地哀求注射。在痛极的那一刻，我似乎也体验到了吸毒者的疯狂。当时觉得，倘若毒品能减缓疼痛，我会恳求给我来一支海浓因。

中午时分；体内的病毒发起了总攻，自以为是赳赳男子汉的我彻底败下阵来。汗水从每一根毛发根部涌出，我面部肌肉歪扭，双手像难产的妇人一样抓扯着床单，最要命的是又全然发不出一声痛苦的叫喊，喉咙里只有如奄奄待毙的狗一般的呼噜声。老婆见状大惊，十万火急地找来已下班回家的耳鼻喉科主任。

主任赶来，撇开嘴一看，眉头一皱，马上下令动刀。

明晃晃的利刀直接伸进咽喉里划割，这恐怕超过渣滓洞竹签子扎入江姐的指甲。然而，我毫不犹豫地张大着嘴，不是因为具有“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的坚强，而是害怕生命消亡的懦弱。两者相比取其轻。宁愿挨他一刀。

“压住他双手。”主任下令。一边紧握利刀。

刀伸进来了，我带着下地狱般的心情等待那肉绽血喷的一霎。

一阵撕心裂肺的刺痛！我“哇”地一声，一大口浓血喷涌而出……

汗水湿透了全身，但我总算站在地狱的门口，泪光闪闪地看见了美妙的人间大地。

接下来的四天里，我继续输那 60 多元一瓶的“普舒”。此时，我已经不再心痛存折上那点可怜的数字，只祈祷这高价药真高效，能阻止我咽喉部位伤口感染。我痴痴地注视着那一滴一滴输入我体内的药液，对它们充满了依赖和感激，同时也感到一种安慰。每一滴，不再是半斤瓢儿白或二两胡萝卜，而是源源赶来保卫我生命的英勇斗士。我体内那看不见的凶恶敌人，将被它们英勇剿杀。

前后整整 10 天，输液的针头交替着从我的左手右手扎进拔出。我身着松松垮垮的肥大衣裤，一只手高举输液瓶，一只手僵硬平握，脸色苍白，眉头紧锁地穿过通道，走向厕所。此时此刻，什么仪表、气度，尊严，通通都踩在脚下，一心指望赶快结束这狼狈不堪的出游，返回病床。

从厕所的窗子望出去，是充满生机、充满活力的世界。三三两两的男男女女，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茵茵绿树下，一个汉子，正在起劲地叫卖鲜肉包子；还有几个“棒棒”，闲散地靠在杂货店的墙上。一辆货车嘎然而至，“棒棒”生龙活虎一跃而上。我突然对外面的这一切——我平时熟视无睹，甚至不屑一顾的一切——充满了由衷的羡慕和渴望。一个人，只有当他丧失了健康，倒卧病榻时，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什么是他最渴望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

在经历了撕心裂肺的痛苦和被束缚在病床上的 10 天之后，我开始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其中之一也许便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名言：幸福是什么？幸福便是肉体的无痛苦与灵魂的无纷扰。

在那一个秋阳明媚的上午，我怀揣着 3000 多元的费用单，匆匆逃离了这个当初我急不可待要进来，生怕没有床位的地方。

注：1999 年 6 月，我又下岗在家一年多，无聊中，与小学同学龚宗跃去了大凉山深处的一个彝寨。也许，就是在那环境很恶劣的地方感染了一种病毒，回来后便发作。于是平生第二次住医院（第一次是 13 岁时早上练功摔成脑震荡）。

于是，便写下了这篇文章。

拉纤，升华生命的伟岸与悲壮

我生长在长江南岸的一个小山丘上，从小看垂惯了往来的木船，听熟了纤夫的号子。

在我家正对的江面上，有一大片叫沙河坝的鹅卵石河滩，滩的外面，立着一长排怪模怪样的礁石，我们叫它“号梁”。湍激的江水直扑礁石，激起可怕的漩涡和千堆雪浪。

每天都有木船顺流而下，千钧一发地与礁石擦肩而过，倘若舵工船夫们把握不稳，便听见“轰”的一声，紧接着是一片惊恐的吼叫……

我常常情不自禁死死盯着木船，盯着那排礁石。看得见舵手全身僵硬，用双手和身子死死抵住舵柄，两排梢工哟嗬哟嗬声嘶力竭，一起一伏拼命搬橈，以血肉之躯的全部坚硬，对抗自然界的死亡凶险。

最让我感动，也最让我难忘的是逆水拉纤。

一群纤夫匍匐在礁石上，全身肌肉绷得像石雕，汗水一滴滴摔在石头上，喉咙深处，发出“吆嘿”“哟嗬”的呐喊。纤绳在礁石上一寸一寸地移动，石头上磨出一道一道的槽印。吃紧时，纤夫们面部曲扭，身如弯弓，寸步难移。

时间凝固了，生命凝固了，号子声也凝固了，几个渺小的“弯弓”与整个大江作拔力赛——一场不是输赢而是生死的拔力赛。

每当看到纤夫们死活不肯放弃时，我总感到一种悲伤、沉重和一种透彻心灵的感动。那纤绳联结的，是他们自身和妻儿老小的生活和生存。记得有一次，船毁之后，纤夫们赤身裸体一动不动坐在石头上，眼眸中，是令人不忍卒读的绝望。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在岸上走……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纤绳上荡悠悠……”这柔媚温软的颂唱绝非我在江边十几年对纤夫生活的目睹。

我爱听“伏尔加船夫曲”，那深沉忧郁而又饱含生命激昂的旋律，让我感到岁月、大地、生命、死亡，沉重而丰厚的巨大内涵。

木船、纤夫已悄然逝去了，千百年来，我们前辈祖先在峡谷危礁急流险滩上留给我们的血汗刻痕也即将永沉水底。高峡平湖水波荡漾的柔美里，再看不见一道道深深的纤痕，感受不到人类在与自然抗争中升华的生命伟岸与悲壮。

纤夫，是什么呢？看不见纤痕的子孙后代以为，那是一段浪漫的恋情：“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在岸上走……”

老梦

披一身尘土，热汗淋漓，四周拥挤而杂乱的房屋挤压着我。时而，嘈杂的喧嚣震耳欲聋，驱逐了心灵里最后一丝浪漫诗情；时而，坟场般的孤寂笼罩了天空和大地，身心在地狱般的荒寒里流浪颤栗。

尘土、汗水、喧嚣，拥挤、喘息、焦急，点点泪痕、斑斑血红……

我急切地要寻找一条出路。

在楼房阻隔的那边，有一泓苍翠掩映的湖水，风，自由地吹过。我似乎看到她清凉的水波，孩童们的欢笑。我渴望一跃而入的畅快，在清凉中一洗满身的尘埃，在畅快里舒展曲扭的灵肉。

一排建筑物横亘在面前，模样破旧丑陋肮脏，里面好像没有人住，阴森森死寂无声。

我走上前，推开一扇门，尖厉的声音让我汗毛倒竖。我一步跨进去，身子往下一沉，脚重重地踩到一堆杂乱的硬物，疼痛传遍全身。

房子里没有窗户，更没有通往湖水的出口，密不透风的黑暗沉闷给我一种窒息的感觉。我赶紧折身出门，重新寻找出口。

另一扇门也一推就敞开。门槛很高，我翻身过去，刚一迈入，脚就陷入不知是淤泥还是粪便的稀软之中。

一股恶臭扑鼻而来。

我定神四顾，发现这是一个废弃的猪圈。腐烂的木栅栏横七竖八呲牙裂齿，冷硬的石猪槽残渣臭水霉菌丛生。

依然没有窗户，更没有另外的出口。

我一阵恶心，慌忙又爬出门。

那儿似乎是一扇希望之门。它看上去不象前两扇门那样油漆剥落吱嘎破败。门楣上立着鲜红的旗帜，两边贴着温暖人心的标语，尤其是那绿油油的色彩，给人一种环境卫生和生命盎然的愉悦。

我急不可待地推门而入。

地面坚实，似乎也干净，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在面朝湖水的石壁上，凿有一个小小的洞口，洞外，透入稀微的光！

心，狂跳着，步履切切。

突然，不知是迎面撞上还是劈天而降，一张巨大的、看不见的、细细密密的蜘蛛网将我紧紧包裹！

无数虫子，或慢慢悠悠、或匆匆忙忙爬上我的身躯，令人毛骨悚然的刺痛，从四面八方袭来。我恐怖地大叫一声，一边手忙脚乱地拍打，撕扯那黏黏糊糊、柔软而坚韧的蛛网，一边夺门而逃。

我又回到热辣辣的太阳下。四周高楼仍然冷冷耸立。

尘土、喧嚣……

粪土、蛛网……

绝望，从地底深处火山喷发破石而出；泪水，如决堤的万倾库水激荡汹涌奔腾而下。仿佛是幼儿失去母亲无依无靠的呼喊，仿佛是老人面对坟场万般无奈的倾泄。

四周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我撕心裂肺的嚎啕。

它冲破一切外在的禁锢和一切自我的压抑，汹涌得肝肠寸断，奔腾得自由畅快。

只剩下这最后的倾泄了，乱石穿空，惊涛裂岸，一泄千里！

以此，来减轻重压，自我洗涤，为蜷曲的灵肉找到一个出口？

远处，隐约传来脚步声，一个女人的脚步声。

我知道她是谁，三十多年了，太熟悉。

可是，她熟悉我吗？

我渴盼她走来，我渴望她看到我肝肠寸断的流涕，让我倾盆的泪水和全身的抽搐告诉她：这才是你真实的丈夫，这才是他内心的状态。在他平静而坚强的外表下，是一个需要抚慰和疗治的病体。

可是，她一如既往的没有走来，也没有看到。

我在又一阵汹涌澎湃中悚然惊醒——一个重复过多次的老梦！

心，依然在狂跳；
枕边，却没有一滴泪痕。

写于 2010 年 5 月 4 日又一次梦后

母亲的面孔

——记网上看到“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面孔

仿佛一道灼热的阳光，噗地一声将我的血液点燃，灵魂骤然升华，飞向庄严圣洁之光。

惶恐、孤寂、担忧、软弱、功利、得失，悄然隐退，在脚底萎缩，化作一堆苍白。

那早已不是凝视儿子的血痕，洒一掬悲痛的母亲的泪。

不！从腥红的流淌里，升腾出最神圣最壮丽的母爱，她越过弹痕累累的遗体，隆隆滚向无边的黑夜。

那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面孔；那是“民不惧死何以死惧之”的面孔；那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面孔；那是“为了千万个儿子，拿去吧我的生命”的面孔。

凝重、悲绝、痛苦、凄伤；

刚毅、坚定、勇敢、蔑视。

敢面对这张面孔吗，你雷霆万钧的暴力，“伟大光荣”的谎言？

就一张面孔，一张弱小的孤单的衰老的失去爱子的母亲的面孔！

沉默，沉默不语。沉默里，是无边无际的大地的厚重大地深沉大地的悲愤大地的力量。

大地啊，母亲！

你承担着人类全部不幸和全部苦难，以哺育生命关爱生命呵护生命的天地自然宇宙之大道，直面罪恶，直面屠杀，直面巍然耸立的专制王宫。

让我跟你走吧，母亲！你沉默的目光注视着我，给我力量，给我感召，给我勇气，给我爱。

苍穹里有急切的呼唤，大地深处传来隐隐的雷声……

2004 年 6 月下长寿湖前夜

秋日感怀

秋日的阳光，暖暖洒在清澈的江面；有风，悄然入怀，撩动一颗日渐衰老但敏感依旧的男儿心。

我将那味同嚼蜡的“十一五教材”轰然一扔，昂首出门，直奔心仪已久的酥胸柔怀——渠江，阿哥有心来相会！

沿着江岸上下奔走，竟没找到一条通往清波荡漾的路。秋阳，在明净的高空中悄然西沉，尘土，在喧嚣的工地上漫天飞扬。举目不见一处河畔处女地，推土机、挖掘机、运土车吼声震天，一个个如强悍而饥渴的野性汉子，在守身千年的处子之身上往来奔突、恣肆祥狂。

寻梦？向青草更深处漫步？

出城，沿一条宽敞而车少人稀的水泥大道前行。大道在一片茂密的竹林和果林前嘎然而止。我跳下车，几步登上一个小土丘。

哇，“寻芳尽处得红梅，暗香浮动君沉醉。”——眼前的景色让我怦然心跳。



碧绿的渠江静卧在两岸青幽的怀抱中，稀落的农舍点缀在竹林和田园的苍翠里。一大片窄长的平地沿江伸展，在高高的河岸和清清的江水间织成一道“桃花源”的风景。我沿着卵石杂乱的竹林小道下行，来到“桃花源”河畔。

秋阳悄无声息洒下暖暖的光辉，江风清凉，吹去了英语单词的枯燥和新闻教材的烦乱。大自然的柔美和静谧殷殷地抚慰着浮躁的心灵与受伤的情感，仿佛母亲——
——哦，大地，母亲！

“喜欢这地方？”一位正收割红苕藤的老农见我痴迷，直起身问。

“是呀，很美，又宁静。”

“你们城里来的人都喜欢。有人还劝我搞个农家乐。”

“这是块宝地，你该搞，我就愿来。”

“不行了，沿江这一大片地已经被政府规划了，要开发。”

“规划了？”

“你没见公路都修到上面了？”

“那你们要搬迁？”

“当然。”

“你舍得？”

“我在这儿生活了 60 多年了，这地方好得很，干旱洪涝都不怕。”

“你不愿意搬？”

“这由不得我，愿意也罢，不愿也罢，都得搬。我们农民嘛，无权无势……当然，国家要发展，要征地，我们理解。我们不理解的是共产党内那些叛徒……”

“叛徒？”

即将被开发的河岸



老农接下来告诉我，这一片地刚一规划，就有人来抢着圈地。那些人把最好的地段以每亩 1750 元的价格租下来，等待即将到来的开发。一旦开发（他们清楚开发的时间表，正如他们清楚规划图。），他们就会获得高额赔偿。多高呢，老农说，据他了解的类似操作，每平方米赔偿 200 元。

一亩地 666 平方米，“那些人”将获得 133200 元。

1750 元的投入，133200 元的产出，一本万利！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有一段经典论述：“如果有 100% 的利润，资本家们会挺而走险；如果有 200% 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如果有 300% 的利润，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

“那些人”不需要挺而走险，只需要一个权力支点，有了这个支点，便可轻盈地撬动任何沉甸甸的土地；有了这个支点，便可以践踏世间的一切；有了这个支点，便可以轻取 1000% 的利润！

“政府规划了，就不能再让私人来圈地。那些人都是共产党的干部，他们拿共产党的钱，可尽干坑共产党的事。这不是叛徒是啥？”

“那些人”是哪些人呢？老农说，当然是有权有势的人，其中他知道的就有当地派出所的公安。

夕阳西沉，宿鸟疾飞。我拾阶而上，来到老农提到的“养猪场”。

一长排灰白而丑陋的棚屋死气沉沉地立在一片茂盛的果林中。从简易的铁栅门望进去，里面空空如也，一片死寂。

小路上，迎面而来一位荷锄归来的沧桑老农。

“大哥，这是哪个的养猪场？”

“哪个？那些有权势的人嘛。”

“怎么没有猪？”

“永远都不会有。你看这是喂猪的地方吗？咋个喂？粪往哪儿排？他们是在等征地时的赔偿。这地方已经规划了，要建商品房……”

商品房？我伫足四顾，发现这儿真是风水宝地。背后，是通往繁华都市的宽敞大道，前面，是一览无余的大好河山。在繁华都市与秀美自然的交汇点上，高价的“商品房”将拔地而起。

江景如画，秀色可餐；

权钱联姻，山河色变！

1750，点石成金，转眼变作
133200；

133200 又会如何滚翻，化作更大辉煌？

“叛徒们”日理万机，早已成竹在胸、胜卷在握。

远处，传来推土机隆隆轰鸣，“开发”的铁轮正汹汹逼近。

大地，您不能再以您的甘甜乳汁哺育两岸苍生，母亲，您不能再以您的玉肌胴体抚慰孤寒魂灵，您正被整体玉碎，在 GDP 节节攀升的官场辉灿中化作 RMB 暗暗流淌的猪场腐臭。



我在猪场外徘徊，尘世中的现实腐臭消解了秋日踏青的浪漫情怀。

心中，有一种焦躁的涌动。

在传媒中奔走多年尚未丧失的那几分记者良知、对大地母亲那份赤诚天然的赤子情怀、从祖辈传下来尚未冷绝的那一点男儿血性，让我从猪场的灰墙旁奋身而起——老农的访谈、现场的照片、背景的调查、网络的平台……

“你们为什么要选择新闻专业呢？”我望着课堂上 60 多个男女学生，不止一次地心中暗想。

这是一个好专业，大有用武之地？！

几年前，我曾造访美丽岛国 NEWZEALAND。那是一个太干净的社会，干净得“苍蝇”们无缝可叮，记者们闲得无聊。终于，有一天，一个议员在英国出差时用公款买了一条内裤。如此“叛徒”引得“苍蝇”们蜂拥而至！大报、小报、电台、电视台连篇累版，穷追不舍。新西兰政府的廉政指数因此而下降，那位毛利族议员则身败名裂。

当我在一尘不染的罗托鲁阿镇得知这一消息时，不禁对着南太平洋的天空仰天长叹——我能在 NEW CHINA 当记者真是幸福啊——到处是“有缝的鸡蛋”！

收获了整个白天的夕阳满面通红，沉甸甸地滑向沉甸甸的大地。在充盈着天地间的金黄光辉中，我恍然看到权力之花漫山遍野，一朵朵开得红艳如火、金灿灿目。

我在这无边无际的金灿中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无奈、软弱？

无力、麻木？

恐惧、绝望？

终于，一切归于平静，仿佛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没有发生。

当手中火热的笔屡屡挣来手中冰冷的手铐时，社会，便在另一个层面上归于“干净”与“和谐”。



我黄昏的心情

暮色苍茫，晚风带来淡淡的夜的寒凉。我向足下的涪江投去告别的凝望，那千古不绝的声音又回响在心头：大地，母亲；江河，母亲……

我抬起头，迷茫的目光投向苍天——

父亲，您在哪儿呢？

母亲快被卖完了！

2010年11月6日于合川

“人生股市”

“XXXX又跌了，这下你又要赔惨！”老婆气急败坏地嚷着。

我泰然一笑，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我早已在“人生股市”上赔惨了，相比之下，交易股市跌它几跌又算什么。

也许是生辰八字不好，当年我一出世，整个“大盘”就动荡不安。先是“反右”运动“牛气”冲天。全家输得家破人散；接着长身体时遇上“三年灾荒”的惨淡“熊市”，直接影响我身高突破1·7米的“基本点”；学文化时又与十年文革相遇，“教育板块”一路狂跌，害得我至今错别字连篇；后来“上山下乡”强行“配股”，抛又抛不掉，让又让不脱，只好拿火红的青春去赔。当那一年终于有点选择自由时，我又经不起诱惑，听人劝选了那个“好找工作”的专业。我一头钻进去“套牢”之后，才发现买错了“股”——该专业距我的爱好与长处相离太远！等我十多年后不顾一切地挣脱时，青春已是退市废票，永远不会再“反弹”。

也许是我没有早入股市操练，因此人生路上一向缺乏机会意识、选择意识、风险意识及中、长线意识。多少良机送到眼前我茫然不知；数次关键选择推到脚下我反应迟钝；更没有长远的分析、周密的判断，一任当时情感的驱使、眼前利益的诱惑，懵懵懂懂走着只有一次的人生之路，浑浑噩噩地决定了难以更改的“终身大事”。

那一年，南方来的风吹得猛烈，书斋中的青灯孤影耐不住窗外五彩的颜色，我头脑一热，一脚踢开了正干得火红的事业。买了份“下海”的“经商股”，豪情万丈地奋勇一跳……

不料，还没尝到波峰浪尖的风光，海水便哗哗退潮，我昏头昏脑地一下子被“套住”。待我丢盔弃甲地夺路逃出，发现已经赤条条地加入了“富余人员”的“待业”队伍。

在“不惑之年”的门槛上，我困惑地发现四下一片迷茫

“炒股嘛！你反正下岗，有的是‘富余’时间。”有朋友关切地前来为我指点迷津。我眼前一亮，好一条求生之路！

不幸，股市上我又屡犯人生路上的错误。该买的我失之交臂，不该买的又断然吃进；当抛时我优柔寡断，不该出手时又慷慨豪迈，害得老婆三天两头唉声叹气。不过我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与“人生股市”的输赢相比，交易股市的涨跌又算什么？股票跌了还会再涨，人生路上跌了个跟斗则遗恨终生。何况我还读过几本有关人生哲理与终极价值的小册子，思考过生命本源与宇宙时空的大问题，自觉有几分超然于尘世烦恼的浩然之气。于是，我便不把股市的一时得失沉甸甸地挂在心头。牛气冲天，我不手舞足蹈；一路狂跌，我不呼天抢地。据股市行家分析，具有此种心态心理，乃入市炒股之优良素质。我闻言大喜，悄悄又搜出老婆私房积淀中最后几两散碎银子，奋不顾身地往那热烘烘、闹麻麻的交易大厅里英勇一扔……

伤心的办公室

大学毕业，爹妈费了一番周折，将我塞进了那早已人满为患的经济开发区。我荣幸地在主任办公室的一角有了一个座位。我很兴奋，刚一起步，便与领导共居一室，看来我可能前程无量了。

主任50出头，胖胖的脸上毫无笑容。我刚坐定，他便老和尚吩咐小和尚般地给我交待了一大堆“革命工作”：办公室要每日清扫，客人来了要主动送茶，收发文件要一一登记，字迹要清楚，接电话要问明对方是谁……

我的心阴沉起来，没想到大学毕业后是“保姆”的干活。然而，面对主任那威风凛凛的“公公”脸，我只得如小媳妇般将头点得如鸡啄米。

一个月后。办公室又坐进来一位年轻人小李，我心中大喜，这下有人分担、甚至接替我的“革命工作”了。果然，此君一入庙门，便洒扫庭院，打水添茶，十分贤惠。此外，他嘴很甜，眼常笑，“主任”前、“主任”后地呼得香脆。办公室开始有了生气，主任那张阴沉沉的圆脸也有了多云转晴的时候。

我从“保姆”岗位上“退居二线”之后，开始把注意力转到隔壁打字室那位腰肢婀娜的小姐身上。这些日子，我总觉得婀娜小姐对我很有点意思。来而不往非礼也，何况。现在我已不是学生，正好在情场上展开手脚，把大学几年失去的“青春”弥补起来。于是，我一有空就溜进打字室，面对婀娜小姐那朝霞般的脸庞，一叙我心中九曲回肠。

小李毫无怨言地干着“保姆”工作，同时，不卑不亢地围着主任鞍前马后地忙碌。一日，我与小李正按主任吩咐，帮他清理一大堆名片，突闻婀娜小姐在门外呼外叫：“你们哪位来帮我扛一下打印纸？”我看了主任一眼，丢下手中的活，同婀娜小姐双双奔下楼去。

我开始感觉到主任对小李热乎乎的暖气，对我凉嗖嗖的冷眼。有什么主要活动，主任都是带上小李，而将我冷在一边。我暗暗有些着急。是不是得先同领导搞好关系，再去同美人联系感情？

终于，有一天主任当众宣布，将小李提为副科长，负责打字室、资料室、阅览室和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我酸溜溜地望着小李那谦虚的笑脸，竭力自我安慰地想：仕途失意，情场得意，婀娜小姐已亲自向我说了，她很喜欢我。对此，我坚信不疑，直到半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我无意中在街上看见小李挽着婀娜小姐的婀娜腰肢……

第二天，我黑着脸走进办公室，小李冲我友好地一笑，温和地说：“我想同你商量一下，我现在工作比较忙，今后是不是由你负责办公室的清洁、登记文件、购买茶叶……”

岁月

走到 52 岁的门栏前，窗外，天空阴阴冷冷。

又一次下岗一年多了，自 1995 年初次品尝这种滋味，这已是第六次。十二个春夏秋冬，我走走停停，左冲右闯，时而激情狂奔，悲歌长啸；时而孤灯独坐，寂冷终年。一个男人最成熟、最饱满、最丰盈、最金黄的岁月，转眼化作苍烟流泉。

我翻出尘封的老照片、旧文字，一一扫描、一一编排，原本是为了打发终日无所事事的孤寂，消解内心汹汹逼近的暮色。不料，那曾经鲜活的青春容颜、那永远逝去的人生悲欢、那已成墓碑的艳情炽爱、那阴阳永隔的亲友音貌，汇聚成感伤面迷惘的洪水，滚滚滔滔，涌上我日渐衰老虚弱的生命堤岸。

我节节败退，一路丢弃残存的希望。在 52 岁的门栏前，怅然回首，刻骨铭心地看见了，那组成了全部生命而又扼杀了全部生命的——岁月。

在冷寂而无垠的宇宙中，上帝创造了这颗独一无二的星球。阳光、风雨、雷电；河流、湖泊、森林；鲜花、草原、万物……一个多么美妙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人，是上帝的宠儿、万物的灵长。他万分珍爱自己的生命，无论是在自由民主的温润中，还是在专制暴政的淫威下，无论是在富裕舒适的田园里，还是在贫瘠荒寒的大漠中，活着，都是人们共同的心愿和追求。

随着呱呱的一声啼哭，生命开始了它的旅程；

随着呱呱的一声啼哭，岁月开始了它的倒记时。

童年，悲苦也罢，幸福也罢，都有整个未来在前面等候；

青春，美好也罢，黯然也罢，都是生命最饱满的时光；

爱恋，成功也罢，失败也罢，都是人生永远值得回味的浓酒。

唯有翻过沉甸甸的中年的山峰，看见天边晚霞如血，暮色似铅，才怅然若失地从心底发出“生命匆匆，岁月无情”的感叹。（在没有宗教信仰关怀的心灵中尤其如此）。

《泰坦力克号》中那位妙龄女郎，妩媚动人，艳光四射，然而，仅仅几十年岁月流逝，扑面而来一个干瘪的老妇，满面皱纹，衰弱不堪！

岁月，无情地将“神奇”化为“腐朽”。

这几年，我采访了 200 多位 70—80 多岁的老人，苍老的容颜，佝偻的身躯与他们当年风华正茂，帅气十足的照片形成巨大反差。我目光在历史与现实中转换，心底声声长叹：岁月，你如何匆匆将丰盈的生命推向凋残，推向死亡？！

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被逐出乐园。生命，从此不再永恒，它来于泥土，归于泥土。

万物中，最强烈最清晰地意识到死亡的便是亚当夏娃的后代了。生命短暂，死亡永恒，不可更改的命定让天地间的匆匆过客千古长叹：“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

从赤壁之夜万军统帅的仰天感怀，到新旧交替一代天骄的无奈嘱托，壮士豪杰，君王枭雄，纵然力拔山兮，气吞万里如虎，也逃不出命定的短暂与永恒。

而芸芸众生，凡夫小民，面对黄昏日暮，挥之不去的依然是岁月匆匆的感伤，生命

消亡的恐惧。

有太多尚未满足的心愿、欲望、渴求；有太多割舍不下的亲情、友情、爱情……

而岁月，坚定不移，冷峻无情，迈着它万古不变的步伐，让红颜一一凋谢，把坟墓逐次打开。

在宗教缺失的这片古老土地上，看透了时空与生命的关系，最超然、最洒脱面对两者的，也许便是明朝杨慎（1488~1559）那首千古绝唱：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然而，超然与洒脱终不能带来彻底的终极关怀。有限的人生，执拗地企盼无限的存在，短暂的生命，总是渴求不灭的永恒。

用什么来消解岁月流逝容颜衰老的感伤？

用什么来抵御黄昏日暮夜色降临的恐惧？

用什么来寄托生命不灭灵魂永存的渴求？

27年前，我初登大学讲台，在教授一套英国教材《Essential English》时遇上一组英文诗，其中一首是英国著名桂冠诗人洛德·丁尼生（LORD TENNYSON 1809-1892）的《渡过沙洲》（CROSSING THE BAR）。

诗人写道：

Sunset and evening star,
And one clear call for me!
And may there be no moaning of the bar,
When I put out to sea.

日落昏黄，晚星闪亮，
一声呼唤分明叫我启航！
沙洲上该没有悲哀呜咽吧
当我扬帆向海洋。

But such a tide as moving seems asleep,
Too full for sound and foam
When that which drew from out the boundless deep
Turns again home.

潮汐似动，水波不扬，
既不泛泡沫，也没有声响
那来自天边大洋的潮水，
掉头向归宿返航。

Twilight and evening bell,
And after that the dark!
And may there be no sadness of farewell,
When I embark.

薄暮朦胧，晚钟迴荡，
钟声之后，夜色苍茫！
该没有诀别的哀痛悲伤吧
当我登船远航。

For though from out the bourne of Time and Place
The flood may bear me far,
I hope to see my Pilot face to face
When I have crossed the bar.

跨越时空的疆界，
潮水载我驶向远方，
但愿能面晤我的舵手，
当我渡过沙洲向海洋。

我把此诗译成中文，对学生讲解道：《渡过沙洲》是诗人漫长一生中的最后一首。此诗构思奇巧，比喻绝妙。劈首一轮西沉夕阳，喻示着生命之河已奔流到尽头。面对着生与死的疆界——沙洲（江河入海处由泥沙淤积而成的陆地）——诗人分明听见死神叩门的那一声呼唤。对生命之河奔流到头似乎有几许感伤，对灵魂扬帆“海洋”又好像有

几许迷惘。诗人的心境如“似动非动”的潮汐，感慨万千而又悄无声响。生命之灵肉如同冥冥(“无边大洋”)之中涌来的潮水，又将掉头归于冥冥。虽说渡过“沙洲”预示着灵魂在更宽广的“大海”中扬帆远航，虽说还有希望面晤“舵手”——上帝——这一精神的支柱与灵魂的依托，但此时此刻，面临沙洲这一生死与时空的疆界，听晚钟在朦胧薄暮中沉沉低迴，看夜色在钟声之后悄然逼近，难免有几分惶感，几分感伤，几分悲而不痛的离情别绪。全诗景情交融，意韵深远，恍惚如见一垂暮老翁，位临沙洲，一边回首向生命之河依依作别，一边凝目向浩瀚迷茫的“大海”殷殷寄语。感伤中有渴望，祈求里有惶惑.....

当时，我自以为准确全面地向学生作了“赏析”，其实，年仅 25 岁的我如何能深刻领会大诗人 80 岁面对死亡那“潮汐似动，水波不扬”深广内涵？尤其是，毫无宗教感悟与背景的我怎么能真正体味一名教徒“渡过沙洲向海洋”的肉灵转折？

接下来又遇到英国著名作家史蒂文生 (R.L.STEVENSON 1850-1894) 的《安魂曲》(REQUIEM)。只活了 44 岁的作家死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孤岛上，死前他为自己写下了这首《安魂曲》：

Under the wide and starry sky,	在这辽阔灿烂的星空下，
Dig the grave and let me lie.	掘一个坟墓让我躺下。
Glad did I live and gladly die,	我愉快生活也笑对死亡，
And I laid me down with a will.	我心甘情愿永远睡去。
This be the verse you grave for me:	请为我刻上这几行诗句吧：
Here he lies where he longed to be ;	这儿是他渴慕的长眠之地；
Home is the sailor, home from sea,	正如海洋的水手上了岸，
And the hunter home from the hill.	正如山间的猎人回到了家。

当时，我十分赞叹这首诗的节奏和音韵，我感到遗憾的只是把它译过来时丧失了原作那妙不可言的音韵美感。在无神论教育中长大的青年，正享受美妙青春的我，怎么能深刻领会“水手上了岸，猎人回了家”那种“笑对死亡”的坦然与愉悦？

上了什么“岸”？回了什么“家”呢？

“人死如灯灭”，古老的圣贤一代代传下这“至理名言”。

“天上没有玉皇，海底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现代“大救星”彻底扫除了一切神灵，亿万国人的头顶上，只剩下一颗暴烈的“红太阳”。

我们再也看不到彼岸的光辉了，我们再也没有终极的关怀了。大恶，在无神的神州大地上纵横驰骋，贪婪，在唯物的物质世界里为所欲为。没有对地狱的恐惧，没有对天堂的向往。当人生的岁月走到终点，面对的，是夜黑的惶恐，留下的，是“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的“政绩”.....

仅有物质欲求的肉体同猪狗在深层结构上是同一结构；仅有精神境界的人生亦无法消除岁月流逝的惆怅感伤；生命，应当进入一个更高的层面——灵界！

抬起头来，仰望星空，那里，没有转眼即逝的人生岁月，没有对岁月流逝的惆怅感伤。

抬起头来，仰望星空，那里有永恒，那里有无限，那里有我们永远的岸，永远的家。

写于 2007 年 11 月 7 日，以此，纪念即将到来的 52 岁生日

童年的黄桷树

我的童年，生长在长江南岸，一棵古老的黄桷树下。

奶奶也说不上它的年岁，她讲给我一个她奶奶的奶奶的故事。

很久以前，岩石上站着一位姑娘，日日夜夜盼着远方的爱人。年复一年，姑娘变成一棵树，长长的根须紧紧抓住岩石，在岩石上生长。

它伸展着交错的枝臂，洒开茂密的绿荫，方佛织成一片绿色的天幕，罩住一块朦胧如梦的园地。

当江水荡去夕阳最后一抹血红，黄桷树就洒下它温馨的荫绿，粗大的树身前展开消夏热闹的晚会。

张家大伯吧嗒吧嗒咬着旱烟袋，吐出一圈圈神秘的传说，豪杰的山岗；王家大婶摇动大蒲扇，夜空中闪出牛郎织女，飘起月桂芬芳；每个小孩都争抢紧靠树身的位置，捏着两手冷汗，恳求赵家哥哥讲那古寺幽塔、狐狸成精。

蒙上双眼绕树捉迷藏是我们黄昏的游戏。一次，陈家的莹莹捉住了我，一双胖乎乎的小手急促地触摸我的头发，眼睛和颈脖，随着一声惊喜清脆的呼叫：“谭哥，是谭哥！”她一把扯下蒙眼的布条，于是，该我蒙上眼寻找。多少年来，我似乎一直都在寻找，绕着粗壮的树身，寻觅黑暗中那两颗晶晶亮亮的星星。

酷热的夏夜，我们常在它的怀抱中一梦到天明。茂密的树叶筛碎满天月色，洒成一地神秘的幽谧。有时夜半醒来，江风轻轻摇动枝叶，恍惚摇动了整个夜空和世界，朦朦胧胧灵魂随风穿过枝叶，飞向琼楼玉宇，那云飘雾渺的地方。

在黄桷树下我采集了多少美妙的向往，从此我眼中染上了一层诗画的嫩绿，心中怀揣着一轮皎洁渴望与人共享。

那一年的太阳又毒又辣，黄桷树拼命伸展，抵御着史无前例的风暴。

血红的战旗像神话中妖魔的旋风，呼啦一声将父母掠去了遥远的地方。我被从教室里赶出来，日日蜷缩在树下，像一只丧家的小狗，头埋在树根里哭了一个又一个黄昏。

李家二小子戴一圈红彤彤的布条回来，一刀削去一大块树皮，刻下几个歪歪扭扭的“打倒”。

枪炮声震动了古老的城市，黄桷树挡住了江上飞来的几颗流弹。我们默默地聚集在它粗壮身躯的后面，从彼此的存在中抵御心中的孤独和惊惶。

永远忘不了那个黑云凌空、金蛇狂舞的夜晚，莹莹的母亲，一位给我们讲过无数鲜红故事的教师，在黄桷树下吊断了人世全部的希望。

告别故乡的那一夜我依偎在它身旁，轻轻抚摸那凝固的乳白色泪水。它飒飒簌簌叙说我从小熟悉的语言，一阵苍凉的风过，飘落一地枯黄的忧伤。

去年我提着沉甸甸的回忆又向它匆匆奔来，当年芳草萋萋的山岗上长出一片“灰白的密林。”钢筋水泥挤碎了灿烂的银河，窄窄的夜空中不见牛郎，只有织女暗自垂伤。

哪儿是我那魂牵梦萦的黄桷树？！

旧地上耸立着一幢高大的楼房，四周是从楼上抛洒的一地肮脏。我栖栖惶惶敲了一单元又敲二单元，问了一楼又问二楼，一扇扇紧闭的铁门封死了童年热闹的晚会，一小块彩色的屏幕取代了黄桷树下的海阔天空。

最后，我终于在一单元四楼找到了我的旧邻。在漂亮的沙发上我们回想了童年吱吱作响的竹床凉椅，在眩目的灯光下我们谈起了黄桷树筛落的满天月色……

分别时他送我一个精美的黄桷树盆景，我把它紧紧贴在胸前，让那一株嫩绿的希望，

让那长长的根须，在我心头盘绕，在心头生长……

1986年，我曾写了一篇英文散文“The Summer Nights of My Childhood”，记述了我童年的黄桷树。1991年，我将它用中文写出。

小雨

我喜欢小雨，特别是秋日里那迷迷蒙蒙、沥沥潇潇的韵律。春天玫瑰般的梦幻已被一场腥红的风暴刮去，夏季的烦嚣与燥热已随燃烧的夕阳陨落，于是，悄悄飘来了，秋日小雨的轻柔、凄婉与寂静。

我喜欢小雨，特别是在黄昏的雨中孑孓独行。四周云气氤氲，雨意迷离，纷纷扬扬飘洒着一种真切与纯静。世界离我很远，自然离我很近。那隐匿在心底的处女地，拆弃了一切栅栏与罩具，在霏霏细雨中坦露出殷红与碧玉，合着她的灵韵，伴着我的步履，湿漉漉地诉说，自由自在地呼吸。

我喜欢小雨，特别是在没人的雨中苦苦寻觅。撞开细细斜斜的雨帘，又迷失于丝丝密密的雾里，看不见一珠泪滴，只闻悠远低回的叹息。四下里都是她温馨的气息，到处都捕捉不住她飘逸的精灵。偶尔，一阵风过，如烟、似雾，如诉、如泣。于是，她在我耳际讲起那个永恒而神秘的故事；于是，我便在雨中思寻着一个古老而长新的命题。从杜牧“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梦幻凄迷，到蒋捷“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的落寞孤寂，从易安居士“梧桐更兼细雨”的冷清悲戚，到雨巷诗人“独自撑着油纸伞”的哀怨彷徨，小雨中一定蕴润着一种湿淋淋的情感，一种沉甸甸的期冀。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我生命的延续——女儿——初睁她那洁净如玉的双眼，我便叫她“小雨”。

我喜欢小雨，特别是在夜半听那吧哒的雨滴。滴滴嗒嗒的雨声秋韵，弹奏出若即若离的惆怅，魂牵梦萦的忧郁。似断鸿声里，往事依稀如梦，又如九曲回肠，剪不断一段柔婉与岑寂。闭目凝神听到深处，迸出一声热切的呼喊，仿佛西风骏马的嘶鸣，风卷战旗的壮烈。正如“于无声处听惊雷，心事浩然连广宇”，难怪辛弃疾秋宵雨中梦觉，眼前江山万里。

哦，小雨，迷迷蒙蒙，淅淅沥沥。清晨洒一层期盼，黄昏淋一头忧郁，剪又剪不断，理又理不直，终日在我心头，点点滴滴。

注：此文写于1989年秋的极度苦闷压抑中

一座文字的纪念碑

五十三年前的今天——1957年6月8日——注定是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这一天，六月飞雪，乱箭如雨，一场规模空前手段卑劣的坑儒虐杀正式拉开战幕。数十万耿直之士、饱学之君中箭落马，堕入“阳谋”陷坑。

王开泰是数十万不幸者之一。

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铁窗、流放、苦役、斗打……

但是，他有幸穿过了死亡的幽谷，并在生命的暮年，将自己二十二年九死一生的斑斑血泪，将自己亲历的那个时代的美丑善恶，汇聚塑建成一座文字的纪念碑——《穿过死亡的幽谷》。

2003年，我初次读到他的记述，几年后，为他修改文稿时又细细品读了每一章节。虽然这些年我采访过上百名右派老人，饱览了那个时代和那一代人的奇冤大苦，但是，王开泰的文字仍然让我悚然心惊、沉思浩叹。

五一技校里“引蛇出洞”的千古奇冤；
水江镇郊外血红夕照下的夫妻永别；
中川劳改营里地狱般的恐怖情节；
乐山街头摄像般的历史展示；
二十二年大悲大苦中人性的曲扭、挣扎；
……

读完，我掩卷长叹：

这是一份详细记录那一段血红历史的珍贵史料；
这是一份真实描述那个时代奇异特征的生动文本。

《穿过死亡的幽谷》不是情节曲折的小说，不是文笔隽永的散文，不是立意高远的政论，它也许文字尚欠精炼优雅，思辨尚缺深邃透彻，但是，它是真相和真实——那个史无前例时代的真相和真实。

当谎言欺骗、假冒伪劣成了一个社会无处不在的特征时，我们太需要真相和真实。

《穿过死亡的幽谷》的内容，主要来自作者当年的日记——在那个片言子语便可招来杀身之祸的年代，王开泰一一记下了每天发生的事，并把日记保存下来，这在数十万右派囚徒中，实属罕见！

眼下，有人认为，反映五七右派的文字已经不少，如无一个更高层次的深入，则既无商业价值，也引不起读者兴奋。还有，在这片伤痕累累的土地上，我们早已“审恶疲劳”。况且，这原本还是一个拒绝触及悲剧，偏爱拥抱乐感的民族。

可是，我认为，在数十年层层堆积的“光荣”、“胜利”、“辉煌”、“伟大”之中，在新一代又被人成功地与历史真相隔离之时，如《穿过死亡的幽谷》的写作，实在不是“太多”。况且，同威烈肆虐几十年，纵横驰骋千万里的浩浩灾祸累累冤情相比，眼下，揭示苦难，反映真相的文字多了吗？

几年前，俄罗斯曾花费几十个小时，一一诵读五万多个死于斯大林暴政的不幸者的名字。

没有人觉得它太多太长。

林昭在狱中用血书写道：“每当想起那惨烈的1957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听到、看到、或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地感到巨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会一想起1957年，便感到巨痛？有多少人知道到“1957年”带给国家、民族、个人的巨大灾难？眼下，老的一代逐一“谢幕”，带走了一曲曲悲欢离合；而新的一代则满目金黄，看不见一段段千古奇冤。（笔者所教的大学本科生绝大多数不了解五七历史与五七真相。）

庆幸的是，我们有王开泰这样的右派老人，他忍着挖掘旧伤的痛楚，怀着警醒来者的使命，将自己二十二年的血泪经历一点一点吐出来，竖起一座文字的纪念碑，既昭示

后人，也让我们永远铭记那些消殒在“阳谋”祭坛上的无辜冤魂。

愿在通往“纪念碑”的路上，青草不再生长。

2010年6月8日

在罗丹《地狱之门》前

——访巴黎罗丹美术馆

在一个春风拂面的四月，我沿着塞纳河，边走边问，找到了渴慕已久的罗丹美术馆。

这位米开朗基洛之后欧洲最伟大的雕塑家，早已用《思想者》那“痛苦的力量”征服了我困惑的心灵，而《永恒之春》中迷狂的激情则唤起了内心一种忧伤的感动。思索的痛苦、热烈的情爱、灵肉的冲撞、连同凝固的艺术的魅力，交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磁性灵光，牵引着一颗敏感而矛盾的心，去作一次虔诚的朝拜。

走进大门，在扑面而来的妩媚春光葱郁茵绿中，赫然耸立着阴阴森森的《地狱之门》！

虽然早已在平面的书本上熟读了大师的巨作，然而，当面对耸立的立体实物，惊心动魄的震撼依然排山倒海涌上心头。

《地狱之门》的顶上，是人类始祖亚当和他的影子组成的“三个影子”；下方的门楣是地狱的入口，那著名的《思想者》俯首其中；下面的门分为两部分，一侧表现情爱的迷乱与狂欢，一侧展示地狱的悲惨和痛苦。200多个裸体人物，挣扎、纠缠、曲扭、呼喊、祈求、拥抱、迷乱、颠狂、颤栗……

在凝固的赤裸雕像中看到生命本源惊涛裂岸的汹涌；在寂静的地狱之门中我听到灵肉火光四射的挣扎。

《三个影子》体格虽然健壮，但精神和肉体的重压让他们身躯歪扭头颅低垂，亚当的犯罪，给人类带来了永恒的劫难。他们走到地狱的边缘，一边承受着苦难，一边注视着脚下的地狱。

《思想者》是《地狱之门》中最突出的雕像，也是罗丹倾注了巨大艺术力量创作的“个人艺术里程碑”。他双眉紧蹙，目光深沉，强有力的身躯痛苦地弯屈着，痉挛般的脚趾抓入泥土。他凝视着身下的悲苦与挣扎，陷入紧张而深沉的思索。他身上的每一条肌肉都在诉说内心的激荡，反映起伏澎湃的思潮。《思想者》最初被罗丹命名为《诗人》，意在象征但丁对地狱中罪恶的痛苦思考，它表达了作者与诗人但丁一致的人文情怀，对因犯罪而入地狱的人感到矛盾的痛苦，对人类的苦难表达了极大的悲怜和同情。



在现实五彩缤纷的欲望中，在女人妙不可言的胴体里，在情欲光焰炽烈的欢愉里，出身于基督教家庭，深受基督教浸润的罗丹，不可能不陷入矛盾的痛苦和灵肉的挣扎。人为什么要被打入地狱呢？因为他犯罪。人为什么会犯罪呢？因为人有不可抗拒的欲望：名誉、金钱、情欲……

由此，人的欲望就是罪恶的深渊，对欢乐的追求（尤其是对虽“不道德”但却能带来极大欢乐的情欲的追求）就是导向罪恶的途径。追求欢乐而又心怀恐惧，渴望人世的幸福而又担忧地狱的惩罚，不可抗拒的欲望与不可抗拒的命定，组成了从但丁《神曲》到罗丹《思想者》中一个共同的矛盾痛苦与灵肉苦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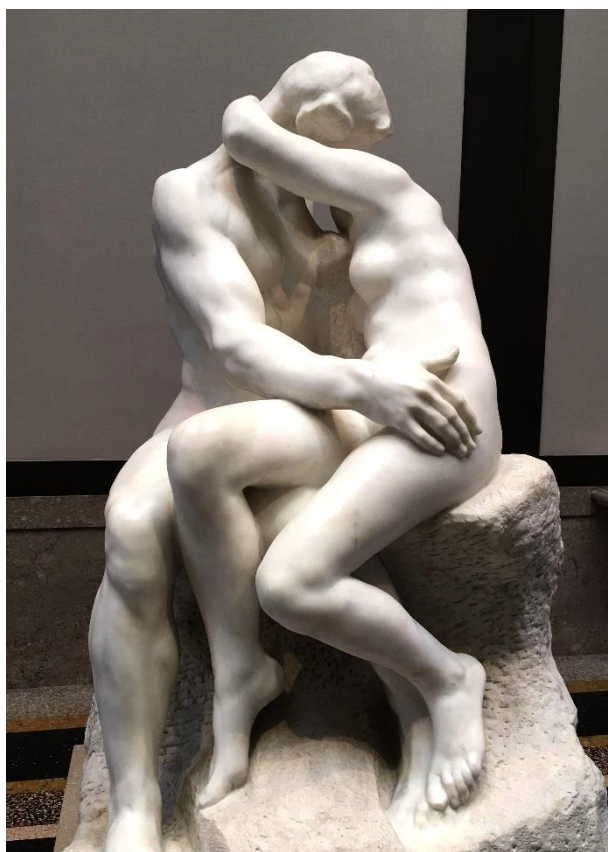
大理石雕像《吻》（1886年）是罗丹的一个杰作。它既是取材于《神曲》中保罗和弗朗采丝卡（Paolo and Francesca）爱情悲剧的作品，更是作者本人和卡密尔·克洛岱尔迷狂情爱的写照。

保罗和弗朗采丝卡是《神曲》中的一对恋人，他们婚外的恋情在中世纪是重罪，注定要下地狱。但丁在地狱的寒风狱中遇到了这对虽遭受惩罚但仍然相拥相依的情侣，同情、感动、矛盾、痛苦一起涌上心头，诗人不堪重负，竟昏倒在地。

克洛岱尔是一个鲜活而美丽的才女，她在19岁光彩夺目的年华里走进了43岁的罗丹的生活。在随后15年的“情人生活”里，她既是罗丹的模特、学生，更是罗丹的“灵感启示者”。罗丹艺术生涯里佳作迭出丰碑屡现的时期，便是他与“灵感启示者”相依相恋的这15年。

伫立在立体的雕像前，那赤裸裸燃烧的生命激情让我产生一种莫名的感动和悲伤。人世间热恋情侣热血沸腾的亲吻，一定是生命中美丽的焰火，在刹那间绽放的缤纷里，有一种圣洁、一种感动。可是，在时空的长河里，这种美丽如电光石火，除了雕像凝固的永恒，血肉的世界，谁能将这一分美丽保留为永恒？

永恒的是什么呢，是惩罚犯罪的地狱。也许，正因为如此，如此美妙欢愉的《吻》被放在了《地狱之门》中。也许，正因为如此，这对赤裸的肉体仿佛有种焦虑的战栗，好象预感到两个灵魂所希求的结合是无法实现的。“巧合”的是，那痛苦思索着的《思想者》也创作于1886年，他注视着足下地狱中的《吻》，会有怎样的感受？



1883年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克洛岱尔睁着她美丽动人的深蓝眼睛，一头撞上了罗丹闪烁着艺术之光的心灵。在随后的15年里，情爱与泪水、温润与狂热、欢乐与悲苦、灵肉与艺术、天堂与地狱……激情的火光、创作的灵感、艺术的辉煌，交映碰撞，组成了一段回肠荡气的千古绝唱。

火光黯淡之后，克洛岱尔透支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爱与幸福，罗丹则留下了以《永恒》为主题的一系列雕塑作品。

《永恒的青春》和《永恒的偶像》就是其中的两件代表作。



永恒的青春



永恒的偶像

《永恒的青春》（1884年）是《地狱之门》中的一组雕像。雕像造型非常夸张，动感十分强烈。两个洋溢着生命活力的男女热烈拥吻，青春在燃烧的情欲中透射出忘我的迷狂。凝视这组雕像，既有一种被艺术唤起的美妙，更有一种被青春点燃的感动。

如果说《永恒的青春》展示了两性间的迷狂激情，《永恒的偶像》（1890年）则传达了人类情爱的灵魂升华。雕像中的女人，像一尊圣洁的女神，男子背着双手跪在她脚下，轻轻地吻她的胸膛。这儿，已没有强烈的动感，忘我的迷狂，感受到的，是宁静中充满圣洁感的崇拜与沉醉。

《永恒的青春》是不是罗丹与克洛岱尔燃烧爱情的艺术凝固？《永恒的偶像》是不是对作为“灵感启示者”的一个永恒的纪念？我想，在短暂的生命旅程里，渴求永恒也许只有寄托于雕像的艺术，艺术的雕像了。

还有，地狱是永恒的。也许，这便是罗丹将《永恒的青春》和《永恒的偶像》放在《地狱之门》中的原因之一。

最后又想到克洛岱尔。这位本身就极具才华的雕塑家，在罗丹烁目的光焰里，模糊消隐了。她才华横溢的雕塑，被认为是罗丹大手笔“恩泽”下的作品；她真炽热烈的爱情，是没有“永恒”回报的悲剧。更令人感伤的是，在极度痛苦、孤寂、贫困中，她绝望地砸毁了自己的作品，精神走向了崩溃。1913年，克洛岱尔被扭送进了疯人院，从此再没出来。她与世隔绝地在那儿渡过了她生命中最后也是最漫长的30年。没人清楚她在那30年里的生存状况和心路历程。1943年，这位为世界贡献了美与艺术的女人，在莫德贝鲁克精神病院孤独地走完了一生。她没有任何遗产，在她僵硬的身体旁，只有一张冰冷的铁床和一只带着豁口的便壶。

后来，人们终于从她那些未被毁掉的、史诗般的作品中（如《沙恭达罗》、《中世纪》、

《成熟》等)，看到了这位蓝眼睛美女的绝世才华。在她去世37年之后，人们为她恢复了名誉，卡密尔·克洛岱尔这个名字连同其作品，被美术界载入了史册。

可是，这对克洛岱尔还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呢？

伫立在《地狱之门》前，注目这件烙上了克洛岱尔身影和生命的传世巨作，一丝困惑的冷风从“地狱之门”里徐徐吹来——

——罗丹和克洛岱尔会不会象保罗和弗朗采丝卡一样，在地狱的寒风中紧紧拥吻，走向永恒？

长青的芳草

十六、七岁，正值生命中的如花如玉，可惜，林与娟那一代人的如花如玉，正值共和国“阶级斗争”如火如荼。朦朦胧胧初开的情窦，在终日“斗私批修”的洗脑运动中，在数千年“男女之大防”的沉渣泛涌里，像一株邪恶的毒菌，一破土，就只能在心灵的深处，偷偷窥探。

可是，人性的自然，扭曲了也要生长。虽然男女同学互不讲话，课内课外形同路人，但每一根细微的神经，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和捕捉来自另一半的气息。

娟，便是林重点“感受和捕捉”的异性对象。娟性格温柔，为人朴实，每次做清洁或参加劳动都认真积极，林总觉得娟具有他母亲那种美德。还有，娟的眼睛非常明亮，而且很秀美。

一次，在参加修水库的劳动中，全班站成一长排传递石头。照例是男女分开，泾渭分明。不料，林阴差阳错排到了男生中的“龙尾”，而娟则阳错阴差地排到了女生中的“凤头”。林半是惊喜半是慌乱地将一块块石头传到娟手中。他不敢碰着她裸露而圆润的手臂。“文革”中，“男女授受不亲”的千年僵魂，被抹上一层鲜红的色彩，以一种圣洁的形式，侵蚀了他们雅嫩的心灵。不幸，沉重的石块却使人难以保持“革命的洁净”，每当他们肌肤无意触及时，林心中便是一阵砰砰乱跳——毕竟是“花季”中的初次。

他们彼此虽然一言不发，但林整个身心都感受到她青春的气息，感受到她因劳累的每一声喘息。

当天晚上，林翻来复去难以入眠，满胸满怀都是娟的身影、娟的气息。在那火红的禁欲年代，一滴细小的感情水珠，竟可滋润全身每一个细胞，溅起心醉神迷的层层涟漪。

当然，这还难以称之为爱恋。只是一种在生命的花季里散发出的清纯而朦胧的芬芳。

一天下午，林接到通知，晚自习后娟将找他谈话。

林浑身一震：单独同她谈话？！

可惜，那不是商讨班上的学习和工作，更不是课后花前月下的幽会，而是娟作为班上的团干部，代表组织向林——一个争取加入“组织”的“可教育好子女”——了解他父亲当年的“政治问题”以及他对此的“思想认识”。

第一次走到自己朦朦胧胧爱慕的姑娘面前，不是倾吐少年的温情，展示“骑士”的英勇，而是被迫揭开自己最难堪的家史，暴露自己最丑陋的疤痕，并且还要深挖细究，向“组织”交待自己“划清界线、彻底批判”的认识深度。

仿佛古印度首陀罗种姓在高等的婆罗门和刹帝利种姓前那苦痛不堪的卑微和低贱……

“家庭出身”，这一个林无法选择的祖宗遗产，让他一睁开婴童的眼睛，就背负着它阴沉的十字架，在“红旗下”步履沉重地生长。

此刻，林步履沉重地走到娟面前，作为“交待”的一方低眉顺眼地揭了家丑，谈了“认识”；娟则作为“组织”的一方正正规规地听了“交待”，作了指示。如今，“交待”和“指示”在林灵魂的屏幕中已是一片空白，只记得那天回寝室的路是那样漫长，山间的夜风是那样凄凉。他独自抱头坐在漆黑的竹林里，觉得自己像一只被拔光了毛的丑陋小鸭，在那圣洁高雅的天鹅面前，傻乎乎地伸长了细弱脖子……

直到毕业，他们再没有说过一句话。

毕业后，下农村前，他俩不约而同地到边疆游访，同住在一个小镇上。在遥远的异乡邂逅自己所喜爱的女同学，很令林兴奋，热带边陲活泼热烈的暖风淡化了内地学校阴森的隔膜，他们开始比较自由地交谈。

娟隐晦表示了独自初出远门的不安和孤寂，这本是林显示男子汉坚实肩膀的最佳时刻，更是他向娟表示他“血统”虽不洁净，情感却非常真纯的天赐良机，况且，他和娟都渴望出去游玩，去感受自然。然而，林一直不敢开口，多年的禁锢和压抑绝不会因南国的暖风一吹就雪融冰消。何况，那害了他一生的自卑感当时在血液中浸润正浓。

这样，上帝在冥冥之中(或者命运在阴差阳错之中)赐给他们的一个绝无仅有的良辰美景，被他们在惶惶的男女隔膜之中默默埋葬。

林孤孤单单地去游了两个小地方，然后带着亚热带苦涩的浪漫，边陲孤独的风情，怅然若失地回到故乡，奔赴“广阔天地”。

娟则寂寞地呆在朋友宿舍，不敢远走。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的故乡，只知道那次失之交臂之后是二十多个漫长春秋。

再见面时他们都已步入了人生的中年，在同学聚会的欢声笑语中娟告诉林她人生路上的一个大遗憾：当年在边疆时没有同他一块去游览大自然！

林用整个身心感受着她的声音，心底依稀泪光闪烁。

“我们这一代人的遗憾太多了！”林沉甸甸地说，“各种各样的遗憾填满了身后歪歪扭扭的足印”。

有位诗人说，令人遗憾的情感有一种永恒的凄美。也许如此。不过，当林回想起二十多年前的遗憾，却没有那种凄美的诗情。遗憾毕竟是一种苦涩，大遗憾是大苦涩，终身遗憾是终身苦涩。当苦涩的皱纹爬上了中年的眼角，回首青春的目光便是一种深深的惆怅和失落。

倘若当初一块出去了呢？两个十八、九岁的男女会不会在大自然清纯的山风中跨过森严的社会栅栏、腐臭的道德规范，从而碰撞出青春绚丽的火花？也许，人生的轨迹因此而改写，至少，那被“革命”的烈火烧得一片荒芜苍白的青春银屏上，会永远留下一片芬芳的绿茵。

“然而，什么都没有”，林说，“我们在无花、无雨、无风、无色的情感世界里，走完了我们最嫩绿的时光。如今，每当我看见现代少男少女亲密友爱的欢声笑语、看到他们在大自然中的无拘无束，我心中便被一种羡慕和妒忌的揉合所盈满。虽然太阳每天都升起，人生路上却没有第二个‘八、九点钟的太阳’”。

此刻，二十多年之后，他们又相对而语，彼此的情感世界里；已经横七竖八画满了枝枝桠桠；两个早已组建完善的家庭，神圣地耸立在彼此的身后。命运的风帆已然定位，牵拽着各自的航船驶向深秋黄叶……

只是，望着娟那依旧明亮、依旧秀美的眼眸，林禁不住又涌出当年山泉般的清纯与晶澈。它涓涓细细，润泽着他心灵深处，那一块芬芳草地，萋萋绿茵……

写于1996年4月

无题

周年的日子一步步走近，我听见它越来越重踩踏在心头的声音。
心头，有一道永不结痂的伤口，轻轻一触动，便渗出鲜红，和弥漫全身的痛楚。

—

临近的纪念日，分分秒秒给我一种威压，仿佛欠了一笔巨债，我背负着这份沉重，一天天走近最后的限期。

从隐藏的地点，取出早已打印出的纸页，“欠债”的内疚，“还债”的急迫，让我在寒冷的阴霾里，终日触摸一个个冷凝刺骨的名字。

二

滇西腾冲城边，有一个《国殇墓园》，园内埋葬着 9000 多名抗战时为国捐躯的国军士兵。 9000 多个刻着姓名和连队的石碑，排成队列，伸向如巨大坟茔的山顶，伸向雨后碧空如洗的长天。

我在沉寂的碑群里久久徘徊，迷蒙泪眼里，隐约是来凤山下倒卧的身躯，是《高黎贡山母亲》脸上凝固的凄美和哀伤。

眼前是 947 名在“5. 12”地震中不幸遇难的学生亡灵，我将他们一个个按学校和班级排列：

谭思宇	汉旺中心小学	四年级3班
杨岚枫	汉旺中心小学	四年级3班
薛依琳	汉旺中心小学	四年级3班
景明清	福新镇二小	五年级1班
刘子宇	福新镇二小	五年级1班
张晨霜	城北中学	2010级7班
陈映朋	城北中学	2009级1班
李东川	东汽中学	高二1班
唐佳琪	东汽中学	高二1班

……

他们的碑文和墓园在哪儿呢？

恍惚又看见《国殇墓园》内那碑石林立的巨大坟茔，我目光在沉寂的碑群里久久徘徊，迷蒙泪眼里，却一幕幕展现出我曾踩踏的千里废墟。

三

是天灾，也就罢了，偏偏你又刻骨铭心地看清了“豆腐渣”人祸。
仅有悲，也就罢了，偏偏你又一如既往地感到了“熟悉的”愤怒。
更无奈的是，纵然冤情昭然，悲风怒号，但沉寂的大地铁窗紧闭，禁令森然，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威然高悬！

既然无法建立一个“5.12”墓园，那就在他们的忌日里，秉烛焚香，诵读他们的名字吧。朋友小明身处自由国度，她悲悯的情怀，正义的胸襟和无与伦比的音喉，想必能遥祭这 947 个青春冤魂。

同时，亦慰你心头的伤痛，偿还你隐忍两年的“欠债”。
你这样想。



四

“新闻必须要有来源处……”小明说。
“来源？”你如何描述那一个赤日炎炎的下午？

隆隆军车，驶过尤如战火洗劫后的断壁残垣；阵阵热风，传来隐约的哭泣悲嚎。你在几栋排列如四合院的平房前伫立。

平房看上去完好无损，面色阴沉的军警把守着每一个出入口。这儿，便是这个重灾区的“战地指挥中心”。

在一位“中心”工作人员的引领下，你得以登堂入室。佩挂胸牌的男女在各个办公室进进出出；臂戴袖章的军警在过道走廊上来回巡视。电话铃声声作响，文件袋层层堆积……突然，在那张办公室的桌上，你看见你曾经一一走过的地方：XX 中学，XX 小

学……以及一个个排列的名字。

心中一阵狂跳！

没有任何人给你任何指令，但接下来的，便是电影上小说里上演的情节。

……

你强作镇静回答了疑问，得以全身而退。只是，汗水早已湿透衣衫。

来源？敢公然坦露那一个赤日炎炎的下午？

五

走了这么长的路，冒了这么大的风险，积了这么强烈的愿望，在临门一脚时，你又退缩了。

你有在军警林立的险境中按动快门的胆量，为什么没有在电台上捧出“来源”的勇气？你有在危楼欲倒的校舍里置生死于度外的英勇，为什么没有向公众坦然报出家门的凛然？

是那位谭姓“家门”的前车之覆让你退守后车之鉴，还是你原本就不是一条直面淋漓鲜血的好汉？

正义和良心，隐忍和懦弱。可以用“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生存哲学来调和内心的巨大冲突和巨大痛苦？

六

1989年6月5日上午，我在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的讲台上，痛陈北京的枪声和血色。悲痛、愤怒、绝望，排山倒海压来，我站立不稳，伏倒课桌上，失声痛哭。

2009年5月12日晚上，我在西南大学育才学院的讲台上，图文并茂地讲起一年前的惨烈。当读到“在东汽中学的废墟前我深深鞠躬”时，悲痛、愤怒、绝望，又一次排山倒海，我把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从1989年的涕泪滂沱，到2009年的哽咽失声，一个男人最饱满的20年过去了；从天安门莘莘学子喋血街头，到汶川嗷嗷雏童魂断危楼，两代人的生命和冤屈化作了苍烟流泉。

依然是鲜血，依然是泪水。

20年里，有多少如我这般的退缩、隐忍、懦弱？

七

那些看一眼便深深烙印在脑海里的面孔时时刻刻压迫着我。

朱悦 汉旺中心小学三年级4班遇难学生

樊玲 福新镇第二小学四年级1班遇难学生

李晓梅 东汽中学高二1班遇难学生

尹俊坪 东汽中学高二2班遇难学生

袁红梅 东汽中学高二4班遇难学生

.....

我拿着从废墟中收集的照片在死亡名单中寻找，惶恐、紧张，一如孩子失踪的家长。当照片上的名字、班级与名单上的一致时，心便一阵乱跳。

那鲜活的面孔永远消失了吗？我凝眸良久，想象他们生前在园里的生龙活虎。蓦地，又慌忙垂下头，似乎不敢对视他们的目光。

“花儿还没有开放就永远凋谢在这块土地上。”我在灾区街头的一张照片下读到这句话。那照片上，一排排躺着“永远凋谢”了的少男少女。

如我这般作为父亲、作为教师的成年人，如何面去对那一排排尚未开放就永远凋谢了的花儿？

六十年来，我们这些成年人，要嘛做看客，要嘛成帮凶，要嘛麻木冷漠明哲保身，要嘛 投机钻营唯利是图。

黑暗，便畅行无阻统治了整个天空。

于是，只有让学子孩童们前赴后继消殒在黑暗中了。

八

黄昏雾霭中，你独自伫立窗前，目光，投向迷蒙的天空。蓦地，一个念头像劈天而降的闪电，直透心灵的深处——冥冥中该有 你曾记录过的亡灵在注视你吧！

那一瞬间，这种感觉是那样真切那样强烈，以至你浑身一震。

他们一定满含悲愤，在指责、在哭诉、在企盼……

一定是的，否则，为什么快两年了，你还放不下，轻轻一触动，便渗出鲜红，和弥漫全身的痛楚。

九

可是，你此刻又能做什么呢？

上周，给学生讲英国哲学家伯特伦·罗素的散文“**What I Have Lived For**”（我为什么活着）。罗素在文中写道：“对人类苦难不堪忍受的怜悯……像阵阵巨风，一路吹我在极度痛苦的海洋上起伏翻滚，直把我刮到绝望的边缘。”“痛苦呼号的回声在我心里回荡……我渴望减轻灾难祸害，但是我力不从心，我自己也深受其苦。”

讲授时，眼前出现两年前那山崩地裂的一幕，但更深沉的，是力不从心地在“绝望的边缘”感受“对人类苦难不堪忍受的怜悯”。

“5. 12”两周年的纪念日即将到来，想祭祀又怕翻动那血红的一页，要呼喊又畏惧那高悬的刀剑。

无奈中，只得找出两年前写的文字，作为此时“无奈的结束”：

“行文至此，夜已深沉，孤灯寂静，月色凄寒。

眼前，又固执地浮现出那些孩子血肉模糊的面容，他们像鲜红的烙铁烙印在我心灵和记忆的深处，我摆脱不了反复去想废墟里黑暗中他们生命在最后坚守时的痛苦和绝望。

此时，他们早已走了，他们把痛苦和绝望留给了我。

他们还留给我了一种无声的嘱托吗？

我写下的这些文字对他们已经毫无意义了。

他们需要什么呢？

……

此时，软弱无力的我唯有点燃一支红烛，燃起一束细香。

双手合一，灵魂长跪——

——祭奠亡灵，哭望天涯。”

4月10日写于与小明通话之后
以此纪念“5.12”大地震两周年

竹林下的杂想

那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下岗失业无所事事，干脆逃离喧嚣的都市，到乡下的一个农家小院享受明月清风。

这儿，除了农忙时节，一年的日子都是缓缓的、静静的，没有城市的浮躁与嘈杂，也没有城市里找到工作的欣喜与下岗失业的惊惶。我拖一把竹椅，坐在翠竹围绕的院坝里，听风吹竹梢簌簌作响，看云起云落变幻无序。热情朴实的农家主人不知道我是城里最无地位的无业人员，把我当上宾捧着，端水递茶，恭敬有加，使我这个在都市里丢进人堆便不见踪影的布衣小民，顿时有了几分“贵族”感。

我怡然自得地斜靠在竹椅上，看竹林下一群鸡怡然自得地卧躺在泥沙里，它们时而舒舒服服地耸身抖出一坑泥沙，时而懒懒洋洋地用嘴在地上啄刨几下。一只公鸡鼓着翅膀在竹林下追逐爱情。想来鸡们最后都免不了被扭着头，遭横颈一刀的命运，不管是城里的鸡还是乡下的鸡都如此。不过，我若是鸡，我情愿做乡下的鸡，在竹林下自由求爱的鸡，而绝不做强城阳台上阳台上的鸡，更不做养鸡场笼子里的鸡。

可人却相反，一个个都想做城里的人，乡下的都急着往城市钻。我想，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人发明了把人分成两等的户口制度。

竹林旁有一个猪圈，里面两头白猪畅快淋漓地吃喝着，舒心荡气地酣睡着。一头无忧无虑兼心满意足，另一头心满意足兼无忧无虑。它们似乎都不去想，一旦自己长大成材后，结局是不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替它们想：如果它们意识到这一点，还会不会睡得这么香甜舒畅？

转眼想到自以为高贵优越的人，他们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也注定了同猪们一样，一步步走向死亡。这是上帝为一切生命安排的命运，人与猪都一样。在永恒的死亡面前，人与人是平等的，伟大的人与低下的猪也是平等的。况且，在不乏暴政、杀戮、残忍、酷刑、饥饿、贫困、病痛、天灾、人祸的人世间，许多人生命的终结，也许还不如猪们干脆畅快。不知道高贵的人意识到这一点，还会不会睡得这么香甜舒畅？

一头水牛被栓在一个钉在地里的木桩上。连接它鼻孔与木桩的那根绳子很短，它抬不起头，只能低垂着绕着木桩转。看着它那吃力的样子，我感到被束缚的沉重。我叫来主人，希望将绳子放长点，至少，能让它抬起头来。主人不肯，说绳子长了，它活动范围大，不好约束，还容易踏坏地坝。我望着紧勒着鼻孔的水牛，暗暗庆幸自己不是牛，可以自由自在地在竹林下漫步。

不料转眼又不知足地想到，人在某种程度上同牛其实是一样，他也被栓在一个木桩上，他也常常痛感到抬不起头，鼻孔与木桩的那根绳子太短。只允许他享有一点“生存权”的“主人”也怕他“活动范围大，踏坏了地坝”。

黄昏降临了。竹梢在晚风的怂恿下，肆意地拂弄满面羞红的夕阳，稻田里三两声蛙鸣，欢呼夜的降临。竹林下自由散漫了一天的鸡们，三三两两走向“卧室”。圈里的猪不再发出噜噜的呼声，双双相拥而眠。大水牛似乎也不觉得绳子太短，它随遇而安地侧卧在木桩前，平心静气地咀嚼着一堆青草，一边用牛尾懒洋洋地甩打着，不像无可奈何，倒像心满意足。

农家炊烟袅袅升起，田野清风阵阵吹来。厨房里飘出浓浓肉香，眼前晃动着淡淡竹影。

此时此景，渐渐梳洗了我白日胸中的胡思，灵魂变得宁静起来，仿佛心中充满了鸡的怡然、猪的悠闲和牛的平静。不去想下岗失业的落寞，不去想“未来的命运是什么”，且在农家小院的悠悠竹林下，在黄昏风中飘逸的菜香里，与鸡、与猪、与牛们，共享一个得过且过的夏日。

注：我 1995 年 7 月从重庆国际公司下岗，到 1996 年 7 月，已整整在家“待业”了一年，无聊中，于 7 月炎热的日子到了我当年下乡的长滩公社。在那儿，我写了这篇小文章。三年后，1999 年，我又在家“待业”一年多了，为了挣点稿费，我把这篇文章删删改改投给报社，于 1999 年 7 月 16 日发表在重庆日报上，挣了大约 80 元人民币。

走进米兰大教堂

玻璃里，隐约洒下一束来自天国的灵光，神秘、美妙而又神圣。抬起头，仰望苍天，一种温柔的触摸抚遍了整个灵魂和肉体。钟声响了，它穿透威烈浩荡的物质世界，召唤精神的家园和灵魂的皈依。



在一个雨意迷蒙的下午，我不经意地来到它的面前。

圣殿挺拔，塔尖如林，扑面赫赫是巍峨、庄严、肃穆、神圣、直上云霄的气势！

我一怔——米兰大教堂，著名的世界第三大教堂。（第一为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第二为西班牙塞维利亚大教堂）

早已从书本上熟读了它的显赫：始建于 1386 年，正式完工于 500 年后的 1897 年，典型的哥特式教堂，也是世界上雕像最多的哥特式教堂（其内外共有雕像 6000 多个）。教堂长约 168 米，宽约 59 米，大厅顶部最高处距地面有 45 米。外部全由白色大理石筑成，并有 135 座大理石塔尖，3000 多座大理石雕塑，教堂因此被称作“用大理石写成的一首诗”。主教堂正面有 6 组大方石柱和 5 座大铜门，方石柱上刻有几十幅大型浮雕和上百个人物像，铜门重达 37 吨，上面雕刻着教堂历史、神话与圣经故事。

我围着教堂缓缓而行，贪渴的目光抚过它的每一个神龛，每一尊雕像。不管从哪一个方向看，教堂呈现的壮丽风貌和丰富的历史内涵，都令人感动。可惜的是，教堂正面正在维修，难以细细观赏。不过，我仍在那儿久

久伫立，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上面丰富而生动的画面，体味里面深邃的艺术内涵和宗教情怀。随后，我从教堂左侧沿一条窄长的石阶攀爬到教堂顶。

我顿时迷失在直刺苍穹的如林的尖塔里，迷失在人类创造的神妙而精美的（宗教）艺术之光里。

135 座哥特式大理石尖塔，每一根都是精美的艺术品，上面细细密密布满了精细的雕刻。中央尖塔的顶上有一座 4 米多高的圣母玛利亚铜像，铜像身裹的金顶片闪闪发光。尖塔直立挺拔，给人以飞腾升华、超尘脱世之感。坚硬的大理石在这儿被雕塑成飘飘欲坠的垂帘罗幔，那柔韧细腻的装饰设计，极富艺术特色，难以想像出它们的石头本质。每一个塔顶，都伫立着一个真人大小的雕像。他们神情庄严、肃穆、虔诚，或背映苍天，默默无语，俯瞰足下的土地，或眺望远方的阿尔卑斯山，或仰望上帝的天国。

偌大的一座教堂，每一寸土地都被艺术细细耕耘过，没有一处空白和遗漏，这是何等艰辛浩繁的劳动创造。而这艺术不是一般的艺术，里面分明可以看到虔诚的心灵和献身的热情。

一抹夕阳金黄的光辉突然透过云层，洒在雨后的大地上，整个教堂顿时笼罩在一种深沉而静穆的庄严里。沐浴在这金黄的光焰中，心灵受到一种深层次的触动，仿佛一束远古神秘的生命之光，刹那间激荡全身，闪耀出意醉神迷的昏眩。

从塔林中下来，步入可容纳 4 万人的教堂。

幽幽闪闪的烛光，静穆高阔的穹隆，让步履和心灵不由自主地安静下来。隐隐有几分惶然，几分敬畏。

教堂里布满了雕刻、塑像、壁画，仿佛一座艺术的殿堂和展馆。然而，最触动人的是那色彩浓郁的玻璃窗棂。26 扇大玻璃窗，全部用五彩玻璃拼缀，窗画以耶稣故事为主题，窗棂高达 20 多米，窄窄长长向着天空提升。夕阳的光辉透过朱红、天蓝、橙黄、酒红、金黄、深绿的玻璃，在教堂内编织出一个斑斓而迷醉的光波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恍然看到基督鲜血的殷红、天空明朗的蔚蓝、秋叶忧伤的橙黄、牧场无际的碧绿……

管风琴响起来，乐音在大厅里回响，舒缓、深沉、优美、哀而不伤、悲而不痛，直透人灵魂深处最柔软、最幽秘的地方。

烛光摇曳，时空迷幻……玻璃窗里，隐约洒下一束来自天国的灵光，神秘、美妙而又神圣。

一种温柔的触摸抚遍了整个灵魂和肉体。在这触摸里，灵肉情不自禁地一阵震颤，前所未有地感到人的孤独、人的卑微、人的罪过和人的那种“泪流满面”的渴求。

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将人向上提升，整个人在一种美妙而圣洁的空间里随着乐音和光波起伏翻滚。身外的世界消失了，那些功名、那些利禄、那些得失，在永恒而无际的时空中显得苍白而微小。一种纯精神的美感，一种圣洁之光，一种灵魂终极的皈依，带来了巨大的、物质世界无法企及的抚慰和充实。而爱，则在变得柔软的心里焰光四射——向着天父所在的苍穹，向着生命充盈的大地。

走出教堂，夜黑已降临，受了一番“洗礼”的心灵进一步悟到：信徒

们的心里没有夜黑的恐惧，生命的终结不过是另一种永恒的开始。而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普爱众生、忏悔反省、敬天爱人、乐善好施，则是他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教堂的钟声响了，它穿透威烈浩荡的物质世界，召唤精神的家园和灵魂的皈依。

“我在寂寞的陪伴下虔诚地祷告
几近沙哑的祈祷，又一次地撕破寂静
你是否愿意落足，那名为苍凉的漩涡
祈祷文不断轻轻回响在这幽暗的空间
还要多久，你才会接到我捎去思维
没有人的米兰大教堂显得格外沉静
寂寞，又一下把我吞噬
曙光，在无穷的彩色玻璃窗下洒落
我在炫目之下，轻柔地听到那唯美诗篇，随着弦的轻弹
门锁在轻响下打开，是谁走入了这深邃幽微的空间……”

是哪一位诗人，写下这首哀而不伤的《我在苍凉的米兰大教堂，挥别了寂寞》？

黄金海岸的浪漫之夜

到达澳大利亚著名的黄金海岸，正值周末，前来度假的人不少。黄昏时分，沙滩上搭起了一个棚台，海滨的林荫道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彩灯，一问，原来是澳洲部分高中学生来此搞毕业聚会。我独自步出旅馆，溶入黄金海岸春夏之交的夜色中。

在海边沙滩上搭建的棚台里，射出来回扫荡的灯光，也传出节奏热烈的音乐，一大群男女学生，沐浴在灯火中，合着音乐狂热地扭动身躯，并不时高声地发出一阵阵回肠荡气的叫喊，每一段音乐结束后，都爆发出一阵欢呼，其间也点缀着一对对男女热烈的拥抱。

有几个男女学生正站在沙滩上自由自在地喝饮料，我走上前去请其中一个男孩帮我照张像。男孩接过像机，我端端正正地站好身子，突然，另一个男孩扑过来，抱住我，贴在我的身上，对着镜头叫了一声，旁边几位女孩开怀大笑。灯光一闪，照片上留下了我僵硬的面孔与他们无拘无束的笑容。

“你是日本人吗？”一位个头比我还高的女孩问。

“不，是中国人。”

“太羡慕你们了，”我真心地说，“男女同学这么融洽、这么欢快。我高中毕业时，我们国内正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男女同学交往……”

“什么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个同学问道。

我觉得一时说不清，便简单地告诉他们，那是我们国内一个很特别的时期，在那个时期，男女同学虽然天天在一起学习，朝夕相处，但彼此不说话，公开和私下里都不敢交往。

我告诉他们，我高中毕业时，班上的同学也搞了一个毕业聚会，但全部是男同学，

而且是关紧门悄悄在寝室举行。原因是学校不允许这种“非法聚会”。我们在寝室里为我们高中生活的终结默默举杯，然后大家抱头痛哭。当天夜里两点半钟，我们全体男同学象幽灵一样溜出宿舍，来到我们平时最爱去的一个休闲和读书的小亭子，为我们学生时代的终结默哀三分钟，当时四周是死一般的沉寂，寒冷夜空下同学们眼眸中闪烁着泪光。我们走过女同学的宿舍时，一个个都不约而同地朝那黑洞洞的窗口凝望。同学两年半，直到毕业离校，男女同学都从没私下在一起说话和聚会，更不要说拥抱亲吻。第二天我们就要分别了，从此天各一方，与女同学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

几位同学沉默不语，一个男孩问道：“现在不会再是这样了吧？”

“不是了，现在男女同学交往很自由，毕业聚会再也不会悄悄躲在寝室里，更不会只有男同学或是只有女同学单独举行。”

突然，那个胖胖的女孩走上来，拥住我的头，在我左颊上深深地吻了一下。“先生，给你一点补偿。”她目光晶晶闪闪地说。

“让我陪你散散步。”胖女孩挽起我的手。

我和女孩沿着沙滩漫步，海浪一排接一排地涌来，发出低沉的轰鸣，在白色海浪的后面，是南太平洋的万顷海水和墨蓝色的夜空。海风迎面吹来，带来淡淡的潮湿的凉意。女孩转过头，望着我问：“你高中毕业时多大了？”

“刚满 18 岁。”

“这么说你 18 岁之前从没和女孩约会过，也没有同女孩拥抱亲吻过？”

“告诉我你的故事。”她亲切地摇了一下我的手臂，又用那晶晶闪闪的眸子望着我。我觉得心中充满了一种甜蜜的感动，陡然感到自己也变年轻了，全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我情不自禁地伸手搂住她的腰，说：“在我 18 岁的那个年代，男女拥抱亲吻是很神圣而又很隐秘的。它只能发生在情侣夫妻之间，不像你们这儿，可以纯粹是一种友情或礼节的表达。还有，那时我们的拥吻，只能在阴暗处进行，绝不能在公开场所……”

“只能在阴暗处？人与人之间这么美好的接触为什么只能躲在阴暗处？”

我望着这位完全在另一种文明中成长的单纯姑娘，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我懂了，”女孩仿佛恍然大悟地说，“你们就像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是一种民族自身的文化习俗。”

“也不那样。”我望着迢迢的夜空和无边的大海，觉得两个国家离得太远，于是我转回到简单的话题。“我第一次同一个姑娘接吻时也是在一个初夏的夜晚，那是一个荒凉的山上，四周杳无人踪。那女孩也是从城里去的学生。她送我回到我住的山村，分手时，在那块洒满月光的草地上，她突然抱住我的头，激动地吻了我。”

“就像我刚才一样。”女孩笑盈盈地说。

“不对，她吻的是嘴唇，据说吻嘴唇是表示爱情，吻脸或额头只是表示友情和友好。”

“你一定还希望有人吻你嘴唇吧？不过，我倒是愿意吻你的眼睛，刚才我说过，我喜欢你的眼睛。”

我转过头，她轻轻在我眼睛上吻了一下，海风吹来，将她金色的头发拂在我脸上，一阵美好和沉醉的感觉漫过我全身。我突然觉得很想唱歌，内心有一种美妙而又感伤的旋律在回荡。我告诉她，我很喜欢一首忧郁的爱情歌曲，但我只能用中文唱。她拍了一下手，用手指做成一个 OK 的形状伸到我眼前。我眼睛望着远处黑沉沉的大海，轻声唱道：

“在这里，我听见过大海的歌唱 / 在这里，我闻到过杜鹃花香 / 在这美丽的南洋 / 曾遇见过一位马来亚的姑娘 / 我和她曾并肩靠着一棵树 / 我对她曾谈起我的故乡……”

不知不觉，夜已深沉，我们也走了好长一段路。女孩提议脱掉鞋子，赤着脚沿着沙滩跑回去。我欣然同意。于是，她在前，我在后，噼噼啪啪踩着漫上沙滩的海水，向着

那灯光辉煌的地方飞跑。我望着前面那充满了青春气息和青春活力的身影，蓦地感到自己也回到了 18 岁，回到了那自己不曾体验过的、本应当是如此友爱欢快和浪漫青春时代……



2000 年在黄金海岸

世纪末的钟声

我听见一种无声的钟鸣，在这世纪末的天空中、海洋里和大地上急促而沉重地回响。

这不是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万钟悲鸣的余音；不是西方教堂感悟上帝的晚祷敲击；不是东方寺庙隐逸出世的寒山暮鸣，而是整个大自然向人类敲响的危急警告，是已被灭绝和即将灭绝的物种联合向人类发出的凄厉呼喊。它虽然无声，却悲如杜鹃啼血，急如山洪奔涌。因为，大自然亿万年构建起的生物生态体系，已在人类的掠夺和破坏下变得千孔百疮，正面临彻底崩溃！

这钟声警示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在人类对自然这个巨大的假想敌人战斗了两个世纪之后，在对有限的资源和物种无限制地掠夺到本世纪末的时刻，大自然全面报复的日子已经来临。那来自天空、江河、海洋、沙漠的无声而可怕的围剿正汹汹逼近！

这钟声警示人类：近 200 年来，地球失去了 600 多万平方米的森林，眼下，那残存的、支离破碎的森林正以每分钟 21 公顷的速度消失！难道从森林中猿猴进化而来的人类很快就要与庇护了他几百万年的森林挥手作别？难道拥有了高楼大厦的庇护就可以肆意毁灭森林的遮盖？

这钟声警示人类：在 20 世纪末的今天，野生动物正以每天一个种类的速度灭绝；各类物种正以每天 10 多种的速度消失。而人，则每天以 25 万之众增加！

这钟声警示人类：本世纪虽是人类有史以来科技最发达、财富最丰厚、人丁最兴旺的世纪，但却是自然界飞禽走兽最为悲惨、面临灭顶之灾和地球上生态环境最为危急、走向全面崩溃的世纪！

这钟声警示人类：在本世纪的人类享受着空调、冰箱的舒适时，他那“人目寸光”的眼睛所看不见的臭氧层，已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舒适”越多，空洞越大，灾难越重！

这钟声警示人类：人虽然拥有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最终不会有“人定胜天”的美妙结局。

地球经过了漫长岁月，才从一个沉寂荒凉的星球逐步进化形成今日千姿百态的生

命之舟。千百万年以来，各种生物相互依存、相互制约，通过千丝万缕的食物链和营养金字塔的关系，求得共同生存，抵御各种灾难，使自然界的秩序逐渐和谐、合理。人类若不分青红皂白、“人定胜天”地破坏了这种大自然亿万年形成的和谐与合理，人类也就最终毁灭了自身的生存。

“不要过份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人与自然，是鱼和水。若拼命繁殖的鱼儿再拼命摄取和污染赖以生存的水，到最后，不会有“胜利的”鱼儿独立存在于这个地球上。

这钟声警示人类：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刻，天堂和地狱的钥匙都握在人的手中。如果人类再不改变近两百年来的活动模式，继续采取“为了接近天堂，不惜靠拢地狱”（即为了追求物质财富，不惜牺牲生存环境）的方式，那么，下一个世纪，拼命追求天堂的人类，一定飞快奔向地狱！

世纪末的钟声在当当鸣响，这不是辞旧迎新的欢庆之声，更不是“展望未来，豪情满怀”的胜利之音。骄傲而无知的“万物之灵”听不见这万物联合撞击的钟鸣。然而它分分秒秒在人类的四周轰响，比“鬼子进村扫荡”的钟声更为急促，比“敌机空袭投弹”的警报更为凄厉。站立于世纪之交的伟岸人类，埋头于追金逐银的芸芸众生，该抬起头来了！看一看头顶上的天空，看一看足下的江河，看一看身边的世界——

难道，还听不见这回响于天地间的急促悲音、凄厉长鸣？！

“在那遥远的地方”

报社征文，设一、二、三、等大奖。我一看顿觉满目金黄，一大早便抖擞精神，龙飞凤舞地写下标题“在那遥远的地方”，接着迅速进入风清日朗、野花烂漫的创作境界。

“……习习的凉风从一望无际的草原吹来，朵朵淡黄色的小花在风中轻轻摇曳，一条曲曲弯弯的小河……”

“牛二娃，搞啥名堂？！还不去把毛肚买回来！”楼下火锅馆老板骂咧咧的声音一向很大，不管她。

“天空非常湛蓝，一只苍鹰映托着朵朵白云，悠然而悄无声息地……”

“有破铜烂铁、旧书、旧报纸找来卖！”收破旧的吆喝声一下子使我想起老婆的唠叨，说那些旧书报把斗室弄得更加破旧。卖不卖？算了！

“……四周非常宁静，只有风在耳际低吟着一种永恒而神秘的曲调。漫步在芳草茵茵的草地上，心旷神怡……”

“卖青蛙，卖青蛙哟！”

卖青蛙？妈的！青蛙每天吃成百上千的害虫，这些人只顾赚钱，扭他到市管会去？！我愤愤不平了一阵，才又拿起笔。

“……站在青青的河岸上，凝望黄河第一弯的滔滔水流，心中被一种崇敬而巍峨的情感盈满。黄河，民族的摇篮，多么神奇而壮烈的……”

“哪些缺德的人又偷电？！”二楼骤然响起张妈的骂声，“这个月又多出 500 多度！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老娘是绝不再多摊的了哟！”

我心中一乱，顿时不见了“神奇而壮烈”的感觉，只好又运内功，提精气，气沉丹田。

“……我情不自禁地卧倒在这伟大母亲河流的身旁，轻声吟起拜伦的诗句‘在那渺无人迹的水天之间，有种乐音……’”

“修热水器!”楼下传来电喇叭筒的吼叫。“各位用户请注意，我们将免费为……”
免费?我心一动，有这般好事?管它的，请来试试。

两名“维修人员”三两下将我的热水器拆散，搬弄了几下后说“电脑打火坏了，要换!”

“热水器还有电脑?多少钱?”

“一百五。”

“算了，不换。”

“那就一百，收零件钱，怎样?”

“不换。”

“免费维修人员”甩手就走，任我热水器“身败名裂”地散在地上。不管它，继续写!

“……当我正陶醉于自然静谧而清幽的怀抱时，两名藏族姑娘踏着青草款款而来，她们艳丽的服饰在蓝天绿地间构成一道风景，那诚挚的笑容透露出一种纯朴与……”

“逮倒!逮倒!抢项链!”窗外有人尖声呼叫。

抢项链?光天化日之下!我一向自以为是条好汉，现在又是大白天，何不见义勇为?我夺门而出，追了一程，不见贼娃踪影，返身只见那位窈窕小姐，捂着脖子上血印，嚶嚶地哭。

回到书桌前，喘了一阵粗气，盯着稿子上那杂乱不堪的“优美”描写，突然觉得，“那个地方太遥远”。

还写不写呢?正犹豫间，又听得“凉粉、凉面”的叫卖声。我抬头一看，已12点过了，小女马上要回来吃饭。我匆匆将稿子一扔，抓起两个大碗，大步奔下楼去——
“卖凉面的，等倒!”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您看到了吗?带血的履带，在黑夜里发出野兽的咆哮，碾碎了您刚刚诞生的女儿——自由女神。

一只雪白、残破的手臂，浸透了同她一起倒下的、学生的鲜血;

您听到了吗?您优秀的儿女，在枪口下最后一声悲壮的呼叫;

您感到了吗?这一场民主与专制，自由与独裁，黑暗与光明在黎明前的殊死搏斗?!

您还没有震醒?还没有悲愤?还没有热泪?还没有呐喊?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您博大的心怀包容了贫穷、愚昧、落后、贪官、暴君，为什么却容不下一群爱国儿女对自由、民主等基本人权的呼求?

您慷慨的血液孕育了十一万万龙的传人，为什么却容不得他们引进这一尊小小的“自由女神”?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从鸦片战争的炮声以来，有多少仁人志士，金戈铁马，前仆后继。为使您千孔百疮

的躯体昂扬于世界之林，他们牢底坐穿，热血洒尽。

今天，您为什么仍然一任带血刺刀的暴虐，卑鄙谎言的强奸，专制魔爪的猖獗？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您的儿女倒在黎明前的枪声中，黑夜众魔在刺刀坦克簇围的血泊里狂跳着“胜利”之舞；在“清晨五点半”发出最后的叫嚣。

还有多久才会看到喷薄旭日？

还有多少鲜血会洒在黎明前的黑夜？

但是，天，终究要亮了，一个霞光四射的早晨必将到来！

在专制宫殿的废墟上，在热血浸透的广场中，必将诞生一个更高更美的自由女神，她高擎着民主自由的火炬，照亮您 960 万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

让我们在刀光血影中，在枪林弹雨里，为这一天的到来献出赤裸的胸膛，殷红的歌声。

祖国啊，“您用伤痕累累的乳房哺育了我”，用父兄同胞的鲜血唤醒了，请容许我将紧缩的头伸出来，轻轻地、深情地、悲壮地呼唤您一声：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匆匆写于 1989 年 6 月 5 日凌晨
(这一天，我在讲台上第一次失声痛哭)